

目录

Contents



◎ 西泠印社出版的部分珍贵手拓印谱

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专辑（下）

天下名社 历久弥新 / Tian Xia Ming She Li Jiu Mi Xin

-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贺词 02
庆贺西泠印社115年华诞各界电函 03

研究社史 钩沉探赜 / Yan Jiu She Shi Gou Chen Tan Ze

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西泠印社 08

- 我对西泠印社企业经营发展史的回顾 文/吕国璋 10
忆西泠印社文物收藏之点滴 文/丁茂鲁 15
西泠印社由私变公详探 文/王巨安 17
文物征集背后的历史情结 述/孙晓泉 26

1979—2003年 改革开放后至百年大庆的西泠印社 28

- 沙孟海社长关于西泠印社发展的学术主张 文/陈振谦 30
西泠印社文献概要（1904—1998） 文/朱妙根 32
西泠印社与台湾篆刻发展的关系 文/简英智 40
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述略 文/郭超英 48

2003—2018年 百年大庆后的西泠印社 52

- 历任社长对西泠印社现代转型的贡献 文/史长虹 54
国家民政部“特批”西泠印社追记 文/童禅福 60

特约访谈 / Te Yue Fang Tan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历任主任采访录 62

- 王玉明：百年西泠印社的世纪变革 62
魏皓奔：令人敬仰的西泠人文精神 64
杨志毅：学术立社 走向国际 文化名城中的百年名社 65
龚志南：传承·拓展·再出发 115年之际的西泠印社 69

大事铺陈 图史焕彩 / Da Shi Pu Chen Tu Shi Huan Cai

西泠印社115年大事记（1950—2018） 71

封三：贵寿神仙图 吴昌硕 1921年作 西泠印社藏
封底：西泠印社前山石坊 1923年建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
李岚清贺词



庆贺西泠印社 115 年华诞各界电函

西泠印社：

欣闻贵社即将迎来 115 年华诞，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西泠印社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团体之一，在金石篆刻、书画创作研习、文物收藏与研究、编辑出版、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成绩斐然。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泠印社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进一步规范社团建设、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品牌管理、加强文化交流，连续举办了篆刻作品评展、国际篆刻书法作品展等一系列大型专业赛事和国际性艺术选拔、创作、展览和研讨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衷心希望贵社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立足文艺事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领业界风尚，不断攀登文艺创作高峰，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展现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西泠印社：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欣闻贵社即将迎来 115 年华诞，特致贺函表示热烈的祝贺！

西泠印社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艺术团体，115 年以来，在金石篆刻、书画创作研习、文物收藏与研究、编辑出版、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卓有成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贵社连续举办篆刻作品评展、国际篆刻书法作品展等多个有影响力的大型专业赛事，近年来还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性艺术选拔和创作、展览、研讨活动，在海内外印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是新时期中华文化建设领域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值此庆贺西泠印社 115 年社庆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贵社在今后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并能与社会各界在促进书法文化事业中加强交流合作，一道为弘扬书法艺术、传承中华文化根脉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8 年 9 月 11 日



西泠印社：

欣悉贵社喜迎 115 年社庆，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贵社艺术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贵社创社百余年来，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金石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金石篆刻（西泠印社）”于 2006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篆刻艺术”于 2009 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希望贵社一如既往地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为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预祝贵社 115 年庆典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西泠印社：

喜闻西泠印社将迎来创立 115 年华诞，谨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预祝主题创作、艺术展览、研讨交流等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西泠印社自创立起，就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金石大家、书画名家的共同努力，西泠印社业已成为海内外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印学艺术社团。近年来，西泠印社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通过举办学术展览、专业研讨交流等活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整个文艺界都在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在此进程中，衷心希望西泠印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助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8 年 8 月 22 日

西泠印社：

喜闻贵社将于 11 月迎来建社 115 年华诞，这是全省乃至全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值此，我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社庆期间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西泠印社是海内外成立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也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篆刻艺术”项目的传承代表单位。创立百余年来，西泠印社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收藏、出版交流等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享有崇高的艺术声望。它是杭州文化的“金名片”，也是浙江文化建设的推进者。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衷心希望西泠印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建设文化浙江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2018 年 9 月 28 日



西泠印社：

欣闻贵社迎来创立 115 年华诞，谨致以诚挚的祝贺！西泠印社是享誉海内外的印学艺术社团，百余年来，为光大印学文化，培养印学人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当代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要标杆。希望贵社继续发扬西泠印社精神，为文化浙江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省文化厅

2018 年 9 月 18 日

西泠印社：

欣闻贵社即将迎来创立 115 年华诞，这是西泠印社的盛事，是浙江文艺界的盛事，更是海内外金石篆刻界的盛事。值此，谨向贵社表示诚挚的祝贺！

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艺术团体。贵社自成立以来，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图书出版、生产销售、展览交流、文物收藏和保护，集社团、事业、企业、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单位。特别是近五年来，面对文艺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西泠印社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在社团发展和文化事业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包容开放的环境吸引了海内外金石书画界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纷纷云集孤山切磋交流，为保存金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共同开启繁荣发展浙江文艺事业的新征程，为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贡献文艺的力量！

预祝社庆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8 年 9 月 18 日

西泠印社：

欣闻贵社迎来创立 115 年华诞，谨致以热烈的祝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几代人的努力，西泠印社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印学艺术社团，同时还收集、保管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建立了专业的印学展示场馆——中国印学博物馆，为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贵社继续发扬西泠印社精神，为推动我省文物保护事业发展，推进文化浙江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省文物局

2018 年 10 月 8 日

西泠印社：

值此贵社即将迎来建社 115 年华诞之际，谨向贵社全体成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西泠印社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影响广泛的国际性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自 1904 年创建至今，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开中国印人结社之先河，继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播先进思想，以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长期以来，西泠印社在社团发展和文化事业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衷心希望贵社充分发挥优势和特色，为当代文化艺术事业建设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预祝贵社建社 115 周年纪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大学

2018 年 9 月 29 日

西泠印社：

欣闻贵社即将迎来创立 115 年华诞，谨向贵社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祝贺！

“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历经百年辉煌的西泠印社，名家荟萃，贤达毕至，抱定“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以独有的执着精神和文人气质，传承、普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一代风骚，是为海内外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印学艺术社团，享“天下第一名社”之誉。

贵社与我校渊源久远，启航孤山、携手共进，始终高扬坚守学术旨归、振兴民族艺术的思想旗帜，为中国金石书画艺术和学术发展立定高峰、树起标杆。衷心祝愿贵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再塑新时代事业发展新高峰；希望贵社与我校不断深化合作、互勉共进，为推动文化艺术和社会美育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国美术学院

2018 年 9 月 13 日

西泠印社：

值此西泠印社成立 115 年之际，谨向贵社致以热烈的祝贺！

西泠印社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大的文人艺术社团，也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代表“中国篆刻艺术”项目的传承代表组织，拥有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艺术界的名师巨匠，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收藏、出版交流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在国际印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社”“名家之社”。

联合出版集团作为香港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出版机构，和西泠印社一样，始终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自 2015 年双方互访后，联合出版集团与西泠印社建立了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2017 年，集团所属香港知名文化艺术品牌集古斋与贵社在饶宗颐社长的亲自指导下，最终达成了在香港共同创办“西泠学堂”的意向，开始了面向香港及海外弘扬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培训项目。在贵社以及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贵我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西泠学堂开业顺利、蓬勃发展，今年春季的首期培训班与夏季的西泠印社深度文化游，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香港“西泠学堂”是我们共同创立的一个面向海外的文化交流平台，展望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共进，进一步增强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传承发展而勤勉努力。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面向未来，我们肩负着共同的使命，怀抱着共同的热情！值此西泠印社喜庆 115 华诞之际，我们预祝西泠印社庆典活动圆满成功！预祝贵社在未来的事业发展中日新月异，再登高峰！

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9 日

西泠印社：

今年，西泠印社迎来了创社 115 年华诞，在此本协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115 年前，正值清末，当时的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在风光明媚的西湖畔，择地孤山，创立了西泠印社，并于 1913 年公推吴昌硕担任首任社长。历史几多变迁，而西泠印社跨越了无数困难，作为整个东亚书画篆刻研究的中心团体，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它 115 年的历史中，书画家、篆刻家、研究学者等人才辈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而现在，它以国际化视野开展活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西泠印社早期，长尾雨山、河井荃庐等众多日本篆刻艺术家在西湖畔学习、交流，他们将先进的篆刻理论与技术传播到日本，提升了日本整体的印学水准。

日本篆刻家协会首任理事长梅舒适先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致力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他本人与西泠印社有着深厚渊源，鉴于他的艺术水平与艺术活动，被西泠印社委任名誉副社长一职。日本篆刻家协会追随其步伐，目前本协会成员在西泠印社共有名誉理事 2 名、名誉社员 7 名、社员 1 名，并在日本篆刻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均离不开与西泠印社的密切交往。

2016 年的浙江省美术馆、2017 年的日本神户，由西泠印社和日本篆刻家协会共同举办的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作品展，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终圆满落幕。

我们期待着西泠印社继续坚持创立之初的宗旨，不忘初心，活跃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希望你们能够博采众家之长，海纳百川，以古为镜，为后世开先声，并且不断加深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交流，增进国际友情，作为金石书画篆刻研究的中心，更上层楼。

最后，预祝本次 115 周年纪念活动“2018 年国际印社联展”以及其他庆祝事宜能够获得圆满成功。

日本篆刻家协会

2018 年秋

西泠印社：

真诚祝贺西泠印社创立 115 年，预祝社庆活动成功举办。

西泠印社自 1904 年创办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一直都被视为历史深厚、传统悠久的篆刻圣地。全日本篆刻联盟首位会长即为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小林斗盒先生，他多年来一直与西泠印社进行各种篆刻方面的交流，促进中日文化互通。今年，为迎接 115 年，一众先贤与社员或赠礼，或表敬意，尽心尽力，共襄盛举。

在此，衷心祝愿西泠印社不断壮大，愈加繁盛。

全日本篆刻联盟理事长 和中简堂

2018 年 10 月 9 日

西泠印社：

时下菊开秋节，衷心祝贺西泠印社建立 115 年。

众所周知，西泠印社 115 年以来，不仅在向海内外弘扬金石文化和篆刻艺术的领域劳苦功高，而且在金石篆刻、书画创新、文化保存研究、出版、对外文化交流等精神文化领域也是引领时风。也深信不疑历代社员诸贤对传统艺术的继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祈愿此次庆典的主题创作、艺术展览、研讨交流等诸般事务都圆满成功，也借此向相关人士诸彦致以问候。

祝愿精神文化的摇篮——西泠印社，万寿无疆。

感谢感谢。

韩国篆刻协会名誉会长 权昌伦

2018 年 10 月 10 日

1949—1979 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西泠印社

1949年5月，西泠印社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自此，西泠印社这个创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文人艺术社团，在社团性质上发生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转变，西泠印社的发展，由此纳入了政府文化政策的关注范围，得到了经费和组织上的保障。

1951年，鉴于西泠印社一时难以开展活动，经沪、杭两地部分社员研究决定，将印社全部文物资料、房地产及家具等暂时交政府代管，并由浙江省文管会和杭州市房管处（一说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接收管理。

虽然此时的西泠印社一时还难以恢复活动，但就社员个人活动来看，并非一片空白，尤其是作为当时唯一健在的印社四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由他发起、督促或协助完成的几件事，在印社历史上也是意义非常。比如，1957年印行的《西泠印社志稿》的编撰准备工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已由王福庵主持开展，历时多年；1954年问世的韩登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由王福庵嘱托、审定与资助而成。当印社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社员所做的这些带有一定总结性质的工作，既是他们对印社拳拳深情的见证，又为印社保存了前半个世纪珍贵而丰富的史料。

1956年，身为浙江省人大代表的张宗祥率先提议恢复西泠印社，受到浙江省文化局领导的重视。经过多次约谈，决定由政府拨款，先从筹备金石书画营业部做起，并由韩登安具体筹办。当年，在浙江省委文教部和浙江省文化局领导下，成立了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著名学者张宗祥任

筹委会主任委员，潘天寿、陈伯衡为副主任委员，诸乐三、沙孟海、阮性山、韩登安四人为委员。

1957年，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于11月、12月召开了两次筹备会议。此后，西泠印社社团事务逐渐恢复，并由政府拨款5000元，在孤山社址内开设金石书画门市部。

1957年，日本丰道春海、青山杉雨等一行来西泠印社参观访问，这是1949年后最早来访印社的日本书道代表团。

1959年，为贯彻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指示，西泠印社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到杭州市，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成立西泠印社办公室，全面负责社址管理和营业部日常事务，印社筹委会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浙江最大的艺术品商店——杭州书画社，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真迹和复制品的展览、收购和销售，并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活动提供基本的经费保障。

1960年，西泠印社金石书画营业部同杭州书画社合并，归属书画社管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又改由西泠印社领属书画社。

经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恢复、筹备阶段，印社渐渐显出生机。

承续20世纪50年代初印社学术研究的氛围，在著述出版方面，首先有了1957年《西泠印社志稿》的印行，这是迄今为止有关1949年前社史的最为翔实的资料；1960年，油印本《志稿附编》问世；1964年，印社出版《西泠四家印谱》。除了上述与印社的人和事密切相关的资料外，

印学研究领域也收获颇丰，如沙孟海著述的《印学史》《沙村印话》，叶潞渊、钱君匋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等，为印社此后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社团事务逐渐恢复的同时，在社员的鼎力支持和多方协助下，西泠印社在征集文物、举办展览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7年，得力于吴昌硕后人吴东迈的捐献，“吴昌硕纪念馆”得以成立；1962年，张鲁庵家属捐献了张氏望云草堂珍藏的印谱400多部、印章1500多方，其中多为海内孤本和珍品。此外，其他诸多社员如高络园、王个簃、葛书徵等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纷纷捐助文物，大大丰富了社藏，也为展览提供了条件。至此，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在印学研究方面真正具备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在社藏不断丰富的基础上，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西泠印社举办了盛大的金石书画展。展品包括古人及近人如吴昌硕、徐悲鸿、潘天寿等之书画，太平天国时期之印模，商周钟鼎彝器等全形及文字拓本，浙江境内名胜古迹石刻文字拓本，周秦汉唐等时期之铜、玉、犀、牙印章，自明迄近代西泠八家为主之石章及印谱等。展品来自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及沪、杭等各地收藏家等，堪称一次集大成的展览。

1962年，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社员座谈会，拟定了建社60周年的活动计划和《西泠印社章程》（草案），并成立了社庆筹备委员会。

1963年，西泠印社召开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了西泠印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金石书画展览会，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通过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选举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许钦文、孙晓泉为副社长，产生了首届理事会，并拟定了重振印社的全面规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泠印社的领导机制、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已经逐渐步入了正轨，各项发展计划正陆续付诸实施。但是，1966年“文革”的突如其来，使西泠印社再次跌入了历史的低谷。

“文革”爆发，印社活动被迫停止。十年间，丁敬、邓石如、吴昌硕三造像及后山石坊遭毁，许多社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抄家，甚至遭迫害致死的也不在少数，如马公愚、沈尹默、潘天寿、童雪鸿等。但当时西泠印社办公

室的人员还是设法保护了大部分的社藏文物和刻石，在当时的形势下做了大量书画篆刻普及工作，而社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以多种形式坚持篆刻创作，比如以革命口号、毛泽东诗词等内容入印，以简化字入印创作出版《新印谱》三集等。

1973年，由香川峰云、青山杉雨等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印社。在20世纪60、70年代中日两国书法篆刻交流兼带外交使命的大背景下，日本书道团的这次来访，为遭受“文革”冲击的西泠印社争取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而且印社能够以社团名义和集体形式出面接待、开展活动，在这十年里几乎是仅有的一次。

1976年，“文革”结束。印社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1977年，西泠印社重新整修了孤山社址；1978年，吴昌硕等三座造像重建落成；1979年，在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纪念会之前，又由浙江省文管会拨款维修了全部建筑物。

1979年12月，西泠印社召开了成立75周年的社员大会。“文革”十年，这浩劫过后的第一次聚会隆重而热烈，全国诸多著名学者、印学家、书画家应邀入社。大会通过了新社章，制订五年工作计划，选举沙孟海任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并进行了学术报告会与王个簃捐献授奖仪式。

在著述出版方面，1977年，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了《历代印章简编》和《吴昌硕印略》；197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成立，编辑出版了由部分社员和篆刻家创作的《革命胜迹印谱》，并从该年开始手拓出版《西湖胜景印集》等印章藏品集；1979年，以篆刻为主兼及研究金石书画创作的《西泠艺丛》创刊。沙孟海、方去疾、罗福颐等则继续以各自的著述推动着印学研究。

时光流逝，此时的西泠印社，已经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可谓饱经沧桑，尘世风雨的击打，在它身上已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草木房舍的损毁，尚可以修修补补，西泠印社在这三十年间最为痛切的损失，是一批学养精深的社员，或受冲击，或因老病，相继辞世。这对百废待兴的西泠印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日益沉重的隐忧。

（选自《西湖全书·西泠印社》）

我对西泠印社企业经营发展史的回顾

文 / 吕国璋

我 1963 年任杭州书画社主任，1984 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至二线，1991 年离休后，仍连任印社学术团体秘书长至 2002 年，为西泠印社工作长达 40 年。在印社创社 115 年之际，社刊约我写篇关于西泠印社事业（学术团体）和企业建设发展历史的文章，鉴于西泠印社事业（学术团体）的历史，已有多人撰写，我在此着重对西泠印社企业经营发展史进行回顾。

为便于书写和读者阅读，先作几点说明：

1. 文章中所称的“事业”，指的是学术团体，所谓的“企业”指的是经营部门（这些企业是属于文化方面的事业性企业，非工商性的纯企业）。
2. 由于时间跨度大，人员更迭繁，档案散失多，所写史实只能是回忆性、梗概性的，难以用原始数据说明。
3. 关于西泠印社的总体称谓，在“文革”结束前，因印社归属杭州书画社管理，对外总称“杭州书画社”。“文革”结束后，才以“西泠印社”为总称谓。
4. 文章采取“忆历史、叙观点”相结合的方式书写。
5. 文中所说“事业”方面、“学术团体”方面的工作，指的是印社办公室为学术团体所做的工作，不是指社员本人的创作学术活动。

一、建社初期

1904 年，叶铭、丁仁、吴隐、王禛在杭州创立西泠印社学术团体。同时，吴隐在上海开设西泠印社书肆，主要业务为编辑出版和印泥制作。其所出书画、印学书籍，数量多、质量好，广为海内外艺术家所珍藏，所制印泥也非常有名，畅销国内外。尽管这是吴氏的私人店，因为借用

了“西泠印社”这块名牌，所以业务更兴旺，企业更发达。而吴氏的企业在弘扬印学文化、体现印社宗旨、扩大印社知名度、支持社员著作之出版，以及向印社捐赠楼舍等诸多方面，即对纯学术性质西泠印社的生存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资助作用。

同样，在杭州孤山社址，社址管理人叶秋生也利用印社屋舍搞过“经营”，供应书画篆刻方面的书籍拓片、文具用品，以及印泥、石章，乃至一些旅游纪念品。据载，鲁迅及某个名人曾到西泠印社买过拓片和印泥。一些老社员回忆，每年社员春秋雅集活动时的会餐费都是由叶秋生所提供。由此可见，尽管这店是叶氏个人所办，但在客观上，它也为学术团体在弘扬印学、保存文物、开支经费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

上述历史，我也是听说的。我从中认识到，“事业与企业相互配合”的模式，从建社初就存在了，而且这种相互结合的模式，是起到了相互促进作用的。

二、恢复初期

1951 年，依西泠印社代表向民政部提出的申请，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印社的文物，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接管了孤山社址。此后，作为学术团体的西泠印社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它的组织活动。

1956 年，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党中央十分关注文化艺术工作。经张宗祥、邵裴子、沙孟海等著名人士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议，浙江省文化厅多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西泠印社。先在孤山由政府拨款开办营业部，供应金石书画及相关书籍、作品，并自制印泥、对外承接刻印业务。

1958年，该营业部被划归杭州市文化局直属管理。

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在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的关怀下，杭州书画社成立。它的任务是：团结杭州书画家、开展书画活动、收藏书画文物、展示杭州书画艺术，同时供应书画作品、文房用具。它具有发展事业和经营企业的双重任务，所以性质定为事业单位，管理方式为企业化管理。书画社位于杭州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具有当时文化单位中最大的营业场地、辟有最高品位的画室、藏有许多高质量的书画文物，经常举行书画展览和书画家笔会活动。可以说，书画社是当时杭州品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单位。杭州市文化局领导当即决定将西泠印社营业部转入书画社，由书画社直接领导。合并后的对外名称仍是“杭州书画社”。合并后，优势互补，企业规模更大、收藏品更丰富、领导力量更强、社会影响更扩大。这时的书画社就是后来西泠印社企事业大发展的基础。

三、西泠印社学术团体恢复期

1962年，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领导在一些有识之士的积极呼吁下，决定恢复西泠印社学术团体。此项工作确定由杭州市文化局领导，由书画社成立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办公室当年完成两件大事：一是争取老社员张鲁庵家属向印社捐献家藏珍贵印章、印谱；二是召开建社60周年社员大会筹备会，会后全力投入60周年大会会议文件和各种大型展览的准备工作。

1963年秋，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社员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总结了西泠印社的历史功绩，举行了学术报告会，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选出张宗祥等正副社长，通过新社章，制订了今后的发展规划。会上有一大批著名书画篆刻家应邀加入了印社。这是1949年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也是建社后最隆重、组织最健全的一次大会。它宣告了西泠印社学术团体的恢复，宣告了西泠印社全新历史阶段的开始。

这次大会之所以能开得如此成功，与浙江省、杭州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和书画社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大会的筹备经费、人力、物力，全由书画社承担，由此可见企业实力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下面我谈一下这段时间书画社企业发展的情况：

我是在这个时期调入书画社的。在参加印社恢复工



© 2003年的杭州书画社

作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事业没有财力支持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抓好企业，才能有财力去支持事业。所以，一开始，我就为自己提出了“以企业养事业，以事业促企业”的办社方针。记得到书画社的头几个月，社里的经营状况“入不敷出”，不得不向外单位借钱来维持运转。为改善经营情况，我们还专门去张宗祥先生家里讨教，受到不少启发。由于对经营管理做了种种改进，年底实现扭亏为盈，被评为市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60周年社员大会之后，杭州市文化局把恢复起来的学术团体——西泠印社交给书画社，由书画社负责管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为此，我决心遵循“以企业养事业，以事业促企业”的方针，尽力把书画社的企业经营和西泠印社的学术团体办得更好。

四、“文革”时期

正当我们想全面实施60周年大会制订的计划，振兴西泠印社，准备进一步改进书画社经营，发展企业经济的时候，“文革”爆发。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也在劫难逃。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印社恢复后不久，反复古风已经刮起，领导们不敢再来“管理”，工作人员也被先后调出。最后只出版了一本《西泠四家印谱》，其他计划只能成为泡影。

接着，社会上刮起了疯狂的“破四旧”风。记得杭州美术界的“革命派”曾来到书画社门前示威，他们在展览橱窗上贴上“砸烂封资修黑店”的大字报。另外，一批“红卫兵”从岳坟一路砸到孤山，把丁敬、邓石如二座石刻造像和后山石坊砸得粉碎。当时，迫于形势，我们在门市部

大厅先撕毁一些无价值的烂字画，佯装主动“革命”，以此为掩护，阻挡“革命派”破坏库房，损毁文物。同时又带领员工将社址中有价值的碑或卸下转移，或用石灰掩盖。有的职工还自发将毛主席像和语录贴在“三老石室”铁门上，以阻挡“革命派”入内砸毁这块稀世名石。由于大家的努力，印社文物终于躲过浩劫，幸运保存下来了。

不久，我作为“走资派”被“夺了权”，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劳动，前后长达数年之久。幸好我社职工在这样混乱的局面里，依然坚持生产劳动，坚持天天营业，从未间断。

1972年，全国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形势逐步好转。这时，我被结合进“革委会”。我们乘着形势好转的时机，齐心协力大抓企业经营。首先抓的是出版业。那时社会上十分需要“革命圣地”“样板戏”等画片、年历片。我们克服种种困难，组织资料，采集纸张，联系印刷，全力投入年历卡的生产。印出的产品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不仅本地生意极好，而且遍销全国，供不应求。连续几年的年历出版业务为书画社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为改善职工生活、支持西泠印社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也给全社鼓起了干劲、凝聚了人心。

当时，浙江省内外出版单位均不正常，出版物匮乏，社会上书法篆刻爱好者无书可买。为此，我们印制了《怎样学习毛笔字》《毛主席诗词行书字帖》《吴昌硕印略》等专业书，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外事活动逐渐增多，原有的孤山营业部太小，不能适应需要。于是我们用社里资金投资重建“宝印山房”，辟为外宾门市部，既恢复了印社景点，又增加了营业收入。

在“斗、批、改”时期，书画社差一点被砍掉。一天晚上，文化局的军代表带了新华书店和美术公司的两位代表到书画社来，在裱画工场召集大家开会，说是要对书画社进行“改革”。他们认为书画社是“封、资、修”单位，应该撤掉，营业部的房屋、人员划给新华书店，裱画工场的场地、人员划归美术公司。幸亏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奋力抵制，瓜分未能得逞，否则书画社、西泠印社早就不存在了。

在“文革”时期，我们不能正面宣传传统文化，但我们还是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开展有益于印学艺术发展的种种活动。如组织书画篆刻展览，与少年宫、工会合办各种培训班等。

这时，国际文化交流有所开展，外宾逐渐来访。1973年，印社在孤山接待了第一批应文化部邀请来访的、由最高级别的书画家组成的“日本书道代表团”。双方在题襟馆进行了交流。在之后的几年里，外宾不断增加，西泠印社与海外的关系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当然，也相应地带来了经济上的收入。

总体来说，在整个“文革”时期，书画社、西泠印社的企业和事业呈现一种先衰落后复苏的景象。事业与企业两方面仍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五、20世纪80年代前后企事业走向全面兴旺

1976年，“文革”结束。鉴于西泠印社在国内外影响重大，杭州市文化局决定整个单位定名为“西泠印社”。全社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决定全面振兴西泠印社，使它成为不仅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光荣传统，而且可以与荣宝斋、朵云轩等相媲美的全国最大的文化企业单位之一。当时西泠印社所属企业单位有出版社、印刷厂、湖滨书画社门市部、孤山外宾门市部、裱画工场、杭州文物商店六大部门。西泠印社的传统产业是编辑出版和印泥、刻印。我们首先集中抓了这两项工作。

出版方面。我们首先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申请出版权，经过多次努力，于1978年获得批准。我们随即调集专业干部组成编辑部，分别负责画册、字帖、印谱、年历、《西泠艺丛》等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不断加强领导，充实专业编排人员和出版发行人员，最终建成了高水平的编辑队伍、高质量的印刷系统和高效益的发行网络。鉴于市场上年历、月历易销，专业书难销的规律，我们实行以年历、月历养专业书的方针。经过编辑、出版、发行等全体人员的奋力拼搏、忘我劳动，出版社取得了很大成绩，所出书刊品种不断丰富，质量品位不断提高，有些还获得全国出版奖，赢得社会好评。此时，西泠印社在全国出版行业中已颇有名声，出版社的盈利年年超额，居全社各部门之首，成为西泠印社的主要经济命脉。

印泥制作方面。长期来，西泠印社的印泥一直委托他人加工。我们决定成立印泥工场，自己生产印泥。为掌握技术，我们先后多次派员向兄弟单位学习，又多次赴产地建立高质量艾绒、颜料的供应关系。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解决了油料浓缩的难题，最终制出了西泠印社自己的“西泠印泥”。新产品广受好评，畅销海内外。印泥生产不仅恢复了西泠印社的传统产品，也为印社企业扩大了经营途径，增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为了发展刻印业务，我们请来名家，由他们挑选专业基础较好的青年员工组成刻印组和印谱制作组，给予刻印艺术和印谱制作技术的培训。经过几年的培训和锻炼，这批新人的艺术水平和制谱技术大有提高，完全适应了为外宾刻印和承接制谱的任务，又为印社对外经营拓展了新渠道，增加了新效益，更为印社培养了一批篆刻艺术骨干。

此外，我们还对门市、裱画、拓碑以及文物商店等各所属企业部门进行了全面充实、提高和加强，使这些部门的经营水平和经济收入都有了新的提高。

为了适应全面大发展的需要，1978年，印社进行了一次社会大招工，人员增加近一倍。新职工被分配到本社或兄弟单位接受业务培训，内容包括编辑、出版、裱画、鉴定、刻印、印泥制作、印谱制作、熟宣加工、文物修补等众多方面。这些年轻人后来成为印社各部门的领导，或造诣颇深的艺术骨干。

特别要提到的一件事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建和维修工程。这些基建的资金全来源于企业经营盈利所得。1979年建起了文物大楼，解决了出版社和文物商店的办公、营业、仓库用房。1982年到1983年，对孤山所有楼舍景点、园林绿化进行全面彻底整修、增补，社址面貌焕然一新。1979年到1988年，先后四次用印社资金建造了四处职工楼，使全社职工几乎人人分到新房，这在当时的文化系统内是独一无二的。

综上所述，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七八年中，西泠印社的企业经营已经发展到相当鼎盛的时期，“规模大、部门多、效益高、资金足、人心齐”，在浙江省文化企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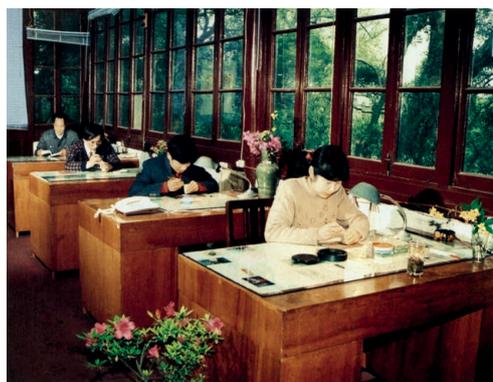
在这段时期，西泠印社学术事业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极大的发展，达到相当兴盛的时期。

“文革”结束，我们即以发信慰问、登门拜访等形式与各地老社员恢复联系，令全体社员非常感动，感到无限温暖。我们经常出版社员的作品和著作，邀请他们为出版社编书写稿，社员也主动为出版社出谋划策，双方关系十分密切。

1979年，杭州市文化局决定召开西泠印社75周年社员大会。大会由市文化局领导、印社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 西泠印社所产“西泠印泥”获浙江省著名商标称号



◎ 西泠印社刻印组



◎ 西泠印社裱画工场

所有经费和人力仍由印社全部负责。会前，印社组织专人分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拜访赵朴初、启功、吴作人、亚明、宋文治、林散之、陈巨来、朱复戡等著名书画篆刻家，并邀请他们入社，以进一步提升学术团体的声望。大会于当年秋天在杭州召开。经过十年浩劫、生离死别的折磨，还能有幸聚在一起，对逝者的哀痛，对生者的庆幸，重现艺术人生的希望，使大家慨叹万千，激动不已。有些人甚至老泪纵横，不能自己。老人们在欢庆印社恢复、共商发展大计时，兴奋异常，激情满怀。笔会上更是笔歌墨舞，一片欢腾景象。大会组成了新的理事会，公推众望所归的沙

孟海为社长,拟订了会后五年的规划。西泠印社再一次从“挫折”中站起来了。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在那段时间里,社员尤其是老一辈社员,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印社。王个簃先生曾向印社捐献了吴昌硕、八大山人等一大批珍品书画,某个老社员将一批吴昌硕自用田黄章无偿捐献印社。此外,张宗祥、王福庵、吴振平、沈尹默等家属向印社捐献、捐赠了书画、印章、印谱等大批珍贵文物。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老社员视社为家、为发展印学艺术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应杭州书画家们的呼吁,由杭州市文化局授权,印社负责筹建西泠书画院。经过学习取经、走访书画家、吸收画师等一系列准备工作,1979年底,在杭州召开了西泠书画院成立大会。刘海粟等众多书画大家应聘为画师,沙孟海为院长。画师们为画院纷纷挥毫留宝。对西泠书画院的成立,画家们反映很好,认为有了“自己的家”。1979年底,印社在湖滨展厅举办吴昌硕135周年诞辰作品展览,日本岐阜市市长参观后,热诚邀请印社派员赴岐阜举行展览。1981年初,印社应邀组团去岐阜举行“吴昌硕书画作品展”,与当地书画家进行创作和学术交流。这是1949年以后,印社首次组团出国访问。

为了保证学术团体活动有专人负责,规范进行,印社抽调两名干部组成西泠印社事业组,这就是后来事业科、社团处的前身。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西泠印社与日本书道界的交流十分频繁。先是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率领吴昌硕铜像呈赠代表团来印社敬赠吴昌硕铜像,参加代表团的有青山杉雨、村上三岛、小林斗盒、梅舒适、今井凌雪等日本著名的书法家。之后,这些大师都先后组织本团体、本地区书家来印社访问、交流、举办展览。新加坡、韩国、德国、美国的美术、书法、考古代表团,也先后慕名前来印社参观访问、交流座谈。

1981年,小林斗盒、梅舒适先后被吸纳为名誉社员。

1983年为印社建社80周年大庆。在杭州市文化局领导下,全社上下全力以赴投入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对社址所有楼舍、景点、绿地进行全面彻底大整修,还更新、补写了全部匾联,增建新景点,社址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印社先后筹备举办了社史展、创始人展、领导题词展、社员作品展、印社出版物展、国际交流展等一系列展览,通

过展览宣传印社的光荣历史,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80周年社庆大会于1983年秋在杭州召开,全国各地所有的新老社员,以及沙孟海老先生亲自推荐的商承祚、蒋维崧、杨仁恺等名家,国家、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兄弟单位负责人,创始人家属等,都应邀前来参加。日本社员小林斗盒和梅舒适先生各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全体代表参观展览,听取学术报告,参加创作笔会,并在柏堂前种植柏树留作纪念。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热烈的情景我至今难忘。会后出版了大会论文集《印学论丛》。这次大会的盛况体现了印社全体同人的团结,体现了印学研究和美术创作的繁荣,体现了印社国际声望的提高,更体现了西泠印社事业与企业步入辉煌时期。

1984年,我们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吴昌硕诞辰140周年纪念会,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了吴昌硕作品展览,同时举行了学术报告会。此次活动在全国影响较大,国家邮政局还出版了纪念邮票。

回顾从“文革”结束到198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企业和事业正达到一个全面兴盛的时期,这一历史事实更证明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学术团体品牌的影响,学术团体更离不开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保证。

六、1985年以后时期

1984年,我从主要领导岗位退下来,印社所有企事业工作均由新上任的领导管理。我认为从1985年到现在,历届领导为发展印社的企业和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发展。这段历史得请他们来回忆和评估。

经过40年的工作实践,我体会到作为学术团体的西泠印社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企业方面的经济资助(除非当时即有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维持);企业方面有了西泠印社名牌效应的作用,也一定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只有两者的密切结合才能求得共同繁荣。

本文原载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吕国璋: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

忆西泠印社文物收藏之点滴

文 / 丁茂鲁

在人们的印象里，一些“老字号”“百年老店”由于历史悠久，家底总会有不少与历史纪念有关的东西。西泠印社是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具有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篆刻艺术为己任，且建社已有百年历史，与文物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

西泠印社除了“山水清淑，人多才艺”（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之外，极为丰富的文物藏品也是其名满天下的一大优势。一个社团能拥有相当数量的印章、印谱、字画等珍品，在海内外是罕见的。据统计，印社库藏印章、印谱、字画、书籍等八大类国家文物计近万件、文物资料类达4000余件。丰富的藏品大多来自印社几代社员的无私捐献、海内外人士的馈赠和印社历年来的收购。翻开《西泠印社志稿》，其中“志物”一栏记载，从建社以来征集的文物有：铜印、玉印、印谱、书籍、墓志、碑记、井栏、界石、城砖、寺砖、买地券，等等。其中集巨资收藏了《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更是尽人皆知的爱国之举。印社前辈或捐钱物，或捐书画，共集资8000余元，购得此碑后筑石室保存，取名“汉三老石室”，现已为印社中著名景观之一。又如印社早期所藏罗聘画《丁敬身像》，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也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绘画精品，印社将此画像镌刻上石陈列于仰贤亭中。该画真迹即是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捐献。又如早期社员李叔同于出家前将自用印90余方在印社鸿雪径旁山崖凿洞度藏，并由叶为铭题“印藏”二字。20世纪60年代初，为更好地保存这批印章，遂取出藏于库房，其中李叔同自刻的“文涛”一印实属难得之物。

此外《印人画像》、《丁敬诗稿》、石鼓、经幢、经塔、题记等，或刻石于山崖，或陈置于粉墙，点缀于印社的亭阁楼阁、山石洞泉之间，布置错落得宜，既有印社特色，又能传之久远，更增加了印社深厚的文化内涵。

由此可见，印社早期就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存和收藏，前辈对此做出了极大贡献，也为印社以后的保存文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热爱印社事业，具有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积累起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20世纪50年代，印社更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对文物的收藏有了新的开端。老社员张鲁庵先生故世后，由其夫人叶宝琴女士向印社捐献了张鲁庵望云草堂珍藏的印章、印谱近2000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为捐献品之首。当年叶女士将存印柜、存印谱橱也全捐给了印社。印社专辟一室存放全部藏品，由当时任社长的张宗祥先生题写“望云草堂”匾挂在室中，这样的陈设也是对张鲁庵先生及其家属最好的纪念。张先生及其家属的义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印社藏品，也推动了更多社员的捐赠活动。此后相继有较大的几项捐赠，如王福庵先生故后，其夫人朱娴女士捐献印章、印谱、书籍、字画、文房杂件等近千件；张宗祥先生的女儿张珏女士遵照其父遗愿，将张老生前自用印悉数捐给印社；葛昌楹先生的两位女儿捐献了吴昌硕为葛昌楹所刻印章数方；某位不愿署名的老社员捐献了吴昌硕刻自用田黄印12方，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捐献和征集的历代印章包括秦玺、汉印及明清以来重要篆刻家的作品，如文彭、何震、程邃、林皋、徐贞木、邓石如、“西泠八家”，从皖派、邓派至赵、吴诸名家，可谓应有尽有。其中如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鹧深处”、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印，皆为稀世珍品。

印谱的收藏更是印社的骄傲，有《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铜鼓书堂藏印》《篁斋印集》《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等不下数十种孤本、珍本，均属国家特级文物藏品。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一部印谱有百册

之多的《十钟山房印举》，亦有小巧精致、尺寸不及半个手掌的《锦囊印林》，还有日本友人所赠的日本古代印谱、《缶庐海东砚印遗珍》等。印社所藏的印章、印谱，足可与大型国家博物馆里专项收藏品媲美。

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收藏的书画作品也十分丰富，不乏自明清以至近现代书画大家的精品。书法如文徵明、张瑞图、倪元璐、王铎、傅山、金农、郑燮、“西泠八家”、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作品均有收藏。其中如徐渭的巨幅草书，见者无不称绝。绘画有张路、蓝瑛、陈洪绶及“扬州八怪”、“金陵八家”、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名家的作品。如任伯年的《茶花三鸡》《画龙点睛》都十分精彩，其中一幅山水画更是难得见到的佳作；再如虚谷的梅兰竹菊屏，吴昌硕 74 岁所作四季花卉大写意屏，均是画家的代表作；又如赵之谦的一幅泼墨山水，长题意趣盎然，具有强烈的金石气息。许多藏品曾经全国书画鉴定组评定，专家们对不少藏品予以好评。

印社购藏字画文物，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虽说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般字画的价格并不高，对比今日甚至是相当低廉，可当时又有谁来买呢？鱼龙混杂，真伪并存，故要寻觅和收藏到真正有价值的字画亦非易事，当时印社同人确是深谋远虑，很有眼光。其时不少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字画的收藏，常来印社具体指导工作，支持并解决经费问题。因此，今日社藏的一件件字画的收购入库经历，往往有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这里凝聚了不少人的辛苦。之后经历“文革”时期，由于几代印社中人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和共识，才使这么多藏品完好无损。

由此又不禁使人忆及当年许多老社员为社庆大典挥毫奏刀，而今日这些作品已成相当珍贵的印社藏品，如潘天寿《鹰石图》、傅抱石《印人齐白石像》、来楚生“关山阵阵苍”印等。还有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的贺诗书作等，都十分难得。印社百年大庆时，许多社员为此而奉献佳制杰作，又为印社增加藏品。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印社为保存文物，在位于湖滨的杭州书画社三楼设立库房。因地处闹市，邻近又有旅舍餐厅，留有不少隐患。当时的浙江省领导即指示有关部门，专门拨出湖边山上的一幢房子作为印社库房之用，此处环境幽美，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从而使文物能获得很好的保

护。印社的文物管理工作从此逐步走上正轨，依照博物馆的管理制度照章办事，建立档案，健全安全措施，防止藏品受潮霉变、失窃损坏。工作人员也牢记“文物来之不易，而损毁往往只在瞬间”的道理，切实做到保证文物的安全。随着岁月的增长，印社的文物藏品也不断丰富增多，原有场地已显得局促。我寄望西泠大厦能早日建成，专门设立文物库房，改善现有的条件。相信有政府对西泠印社的关心重视，今后印社的文物保管工作会更上一个档次。

回顾印社百年历史，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印社恢复后，能在不算太长的数十年里收藏到如此丰富而珍贵的文物，其根本原因是党和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是印社几代社员和海内外友人热爱印社事业、视印社为家，与印社有深厚的感情，从而将珍藏多年的文物捐给印社所形成的。他们认识到将文物捐给印社就是捐给国家，同样会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更好的保管，并发挥个人收藏所不易起到的作用。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高尚风格，才有今天印社文物收藏的业绩。他们的捐赠为印社的学术研究、创作活动、出版和展览，以及对外文化交流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并为建成中国印学博物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印社的几代社员为印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和崇敬。

那幢掩映于绿树丛中，作为库房之用的精致小楼，珍藏着印社百年来所保存的许多藏品，人们可以见识到那么多大师巨匠的作品，每件文物都会使人重温它的历史。库房里佳作云集，犹如许多艺术家不分时间先后在此聚会，以他们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点拨后人，并给人深刻的启迪。浓浓的艺术氛围，使人们再次领略到民族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奥妙无穷。印社藏品经常性的展示，也增加了印社的艺术魅力，吸引更多艺术群体的重视和关注。

西泠印社百年，犹如日之初升，是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机，相信西泠印社的文物征集、保存及其研究、展览等会做得更好。真可谓文物因印社而聚集保存，印社得文物而更增光添彩。

本文原载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3 年版

【作者简介】

丁茂鲁：西泠印社理事。

西泠印社由私变公详探

文 / 王巨安

【摘要】

1951年后西泠印社由私变公，是其自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其原因、经过等情况，数十年来相关研究与宣传一直多存缺憾，误传广远。发掘、展现相关原始文献，结合历史背景详加考识，再现这一事件的起因、性质、焦点、过程等真相内情，能匡正、解答一系列误识与疑惑，从而留存信史。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吴振平 王福庵 邵裴子

一、相关回顾与本文意义

1951年，已广具影响的民间社团杭州西泠印社将其所有房地产、文物、图书、器物等财产全部移交政府部门，当时当地仅有的两份大报《浙江日报》《当代日报》没有报道，数十年来也不见有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出现。成书于1957年，由社人王福庵（名禔，1879—1960）审定、秦康祥（1914—1968）编纂、孙智敏（1881—1961）裁正的著名的《西泠印社志稿》，内容止于1949年，也未涉及此事。

1962年8月9日，复社不久已属国有的西泠印社在致“省文管会、市房管处、市园管局”的题为《杭州西泠印社要求将原西泠印社文物资料、器具设备、房屋等全部归还我社使用》的函（杭州房产档案馆藏）中称：

1951年，因鉴于印社一时难以恢复活动，又值当时管理人员因故变动，经沪、杭两地部分社员研究决定，将印社全部文物资料、房地产及家具暂时交给政府代管，并分别由省文管会与市房管处接收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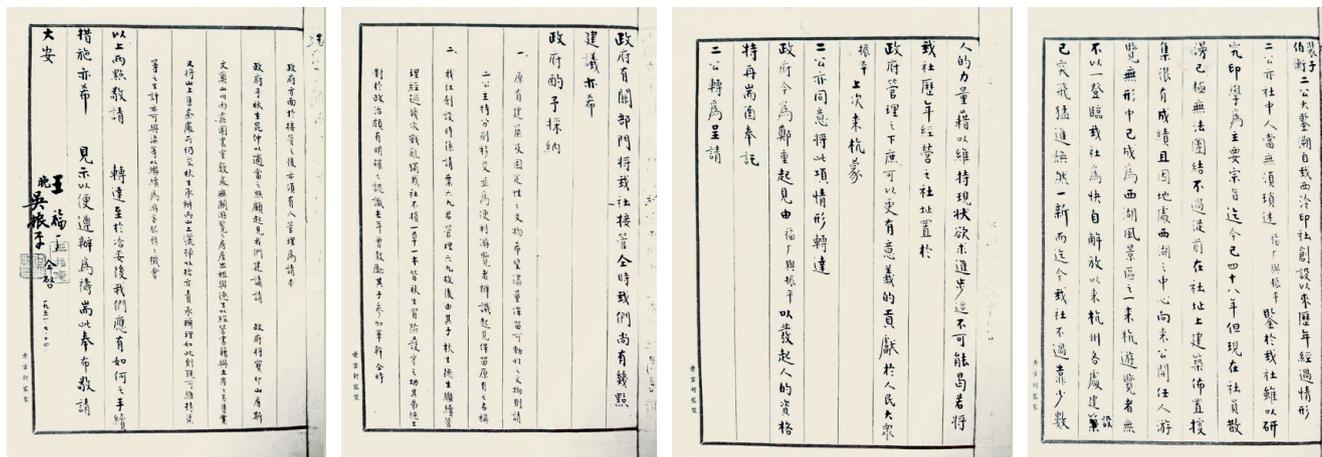
1995年出版的《西湖志》载：“1949年10月后，印社房舍移交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代管……所藏文物移

交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

1999年出版的《杭州市志》载：“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印社为杭州市军管会接管。”^[2]

进入21世纪，西泠印社在发现1951年9月10日杭州市民政局呈代市长吴宪《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呈请核示由》这一档案后，统一了“捐献”观点。但时至今日，相关宣传与论著仍一致认定这一捐献由丁辅之（名仁，1879—1949）首提，是丁辅之于1949年面嘱王福庵，^[3]甚至另加种种原因背景探讨，^[4]而2003年出版的陈振濂先生所撰《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对此却有更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在经历了政权更迭最初的混乱之后，西泠印社从被停止、被误解、被禁止的尴尬处境中逐渐解脱出来。目前所知道的早期资料，是张宗祥于1955年（笔者按：应为1956年，下同）在浙江省人大提出议案，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但在这之前的情况，却还是有许多的不同的记载。比如1949年解放前夕病重中的丁仁与王禔商量把西泠印社交给共产党；其后王禔于1951年夏会同吴隐之子吴振平，约请社员邵裴子、陈锡钧代转杭州



◎ 图1 王福庵联名吴振平致邵裴子、陈锡钧函（主函）

市人民委员会，要求捐献西冷印社的房产、土地、社藏文物，但要求不改变“西冷印社”名称。是年9月杭州市接受。但又有记载是省文管会接受文物，市房管会接收房产。当时的接收，捐献方由谁代表？接收方究竟是哪家单位？当时的文物有哪些？有无清单目录？与今天的印社所藏有哪些差距？又在1951年捐献之后直到1955年张宗祥交人大议案之时，西冷印社有过什么样的记录？还是一片空白？韩登安、阮性山等在当时从事何业？而杭州与上海的社员如王禔、吴振平等有否联络？是杭州方面自行裁定？还是接受上海方面王禔的指示？西冷印社的收归国有，与建国初的公私合营运动是否有某些关联？在这场大动荡中，作为西冷印社社长的马衡，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王禔在上海的某些意见，会不会与在北京的马衡商量？^[5]

以上可见，一直以来，对西冷印社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相关研究与宣传多有缺憾。为求有明确而全面的认识，笔者广做调查，在浙江省博物馆（下称“浙博”）与杭州市房产档案馆（下称“杭房”）发掘到就此事的往来原始函牍共计数十件。结合历史背景对此详探考证，能够完整、客观、清晰地再现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解答今人诸多疑问，再现西冷印社前辈社员在重要历史时期为求印社的存在与发展甘心奉献于人民大众的心态和形象。

二、三份重要文献

这些原始档案中，最重要的是王福庵联名吴振平

（1907—1979）从上海致杭州邵裴子（1884—1968）、陈锡钧（字伯衡，1880—1961）函（下称“主函”）和随附的吴振平致邵裴子函（下称“附函”）以及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周永年函（下称“邵函”）这三份原件。

（一）主函

主函（图1，杭房藏；另见陈锡钧抄件，浙博藏）连同信封（浙博藏）由王福庵毛笔手书，下署“上海广东路二二九号吴寄，一九五·七·十五”，表明由吴振平寄发。全文于下（标点笔者添加）：

裴子、伯衡二公大鉴：

溯自我西冷印社创设以来，历年经过情形，二公亦社中人，当无须琐述。福庵与振平鉴于我社虽以研究印学为主要宗旨，迄今已四十八年，但现在社员散漫已极无法团结。不过从前在社址上建筑、布置、搜集很有成绩。且因地处西湖之中心，向来公开任人游览，无形中已成为西湖风景区之一，来杭游览者无不以一登临我社为快。自解放以来，杭州各处建设已突飞猛进，焕然一新，而迄今我社不过靠少数人的力量藉以维持现状，欲求进步，殆不可能，曷如将我社历年经营之社址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庶可以更有意义的贡献于人民大众。振平上次来杭，蒙二公亦同意将此项情形转达政府。今为郑重起见，由福庵与振平以发起人的资格，特再函奉托二公，转为呈请政府有关部门将我社接管。同时，我们尚有点建议，亦希政府酌予采纳：

一、原有建筑及固定性之文物，希望尽量保留。可动性之文物，则请二公主持，分别移交；并为便利游

览者辨识起见，保留原有之名称。

二、我社创设时，系请叶六（笔者按：应为“洛”，下同）九君管理。六九故后，由其子秋生、德生继续管理。经过几次战乱，独我社不损一草一木，皆秋生冒险护守之功。其弟德生，对于政治颇有明确之认识，去年曾鼓励其子参加“军干”^[6]。同时，政府方面于接管之后，亦须有人管理。为请求政府予秋生昆仲以适当之照顾起见，我们建议请政府将宝印山房、斯文龛、山川雨露图书室数处无关游览之房屋出租与德生，以经营书籍与土产之另（笔者按：应为“零”）售业。又将山上售茶处所仍交秋生承办，而山上洒扫、收拾，亦责承办理。如此，则既可维持渠等之生计，亦可与渠等以继续为游客服务之机会。

以上两点，敬请转达。至于洽妥后我们应有如何之手续措施，亦希见示，以便遵办为禱。端此奉布，敬请

大安！

王福庵（并印） 同启
晚吴振平（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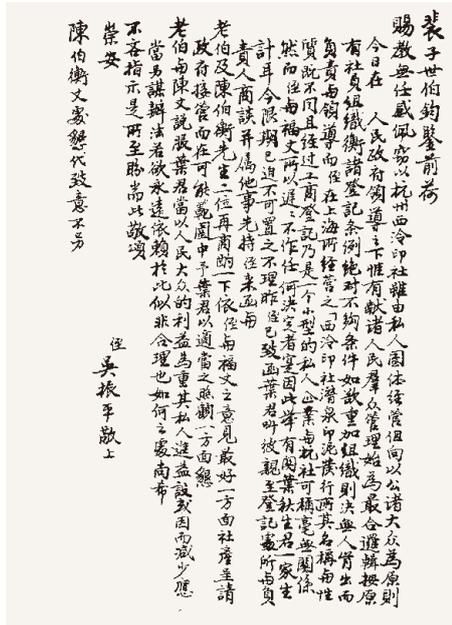
一九五一·七·十四

（二）附函

随主函同寄的附函（图2，浙博藏）为吴振平毛笔手书，未署年月，但与主函紧密相关，更反映隐情而具私密性。全文如下（标点笔者添加）：

裴子世伯钧鉴：

前荷赐教，无任感佩。窃以杭州西泠印社虽由私人团体经营，但向以公诸大众为原则。今日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唯有献诸人民群众管理，始为最合逻辑。按原有社员组织，衡诸“登记条例”，绝对不够条件。如欲重加组织，则决无人肯出而负责与领导。而任在上海所经营之“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其名称与性质既不同，且经过工商登记，乃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企业，与杭社^[7]可称毫无关系。然而任与福丈所以迟迟不作任何决定者，是因此举有关叶秋生君一家生计耳。今限期已迫，不可置之不理。昨任已致函叶君，叫彼亲至登记处所与负责人商谈，并属（笔者按：通“嘱”）他事先持任来函与老伯及陈伯衡先生二位再商酌一下。依任与福丈之意见，最好一方面社产呈请政府接管，而在可能范围中



◎ 图2 吴振平致邵裴子函（附函）

予叶君以适当之照顾，一方面恳请老伯与陈丈说服叶君，当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其私人进益设或因而减少，应当另谋办法。若欲永远依赖于此，似非合理也。如何之处尚希不吝指示。是所至盼。端此，敬颂

崇安！

任吴振平敬上

陈伯衡丈处愚代致意，不另。

（三）邵函

邵函（杭房藏；另见底稿，浙博藏）为邵裴子毛笔手书，是他与同事陈锡钧受王福庵、吴振平委托后，正式向属地政府部门提出捐献意愿，并将主函未明确的事项一一加以陈明。全文如下：

永年主任^[8]大鉴：

裴子等接西泠印社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二君来函，愿以印社房地献给政府，嘱为转达，并有意见二点，希予采纳。裴子等思维贵处实为接收此项房地捐献最适当之政府部门。日前因高亦吾同志前来文管会接洽公务，已由裴子先告大概，请其转陈。兹再附呈王君等原函，请察洽。其有原函意义恐有未明，再为解释附后：

一、所谓“固定性文物”，系指汉三老石室中之《汉三老碑》及其他有关印社历史之碑刻、摩崖与印人铜、石造像等。所谓“尽量保留”，即是在“原地保管”。“可

动性之文物”系指社中所藏书画、书籍、印谱之类，前由发起人吴君来杭面洽，交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再，请保留“西泠印社”名称，依旧使用。

二、建议第二点，本文^[9]已甚明析。兹又据叶秋生、德生兄弟来称：自其父洛九管理社月以来，四十八年，人历三世，向来不受工资，亦不出租金，以管理、打扫之工作换得一部分房屋之使用。且修理、税款等费，除少数社员自愿补助一部外，均由其筹措垫付，积数颇多。今经各社员同意捐献政府，当保证移交器具物件，不遗一丝一毫。唯其家兄弟两房共有大小十九人，均恃在印社卖茶及卖书籍、土产为活。恳请接收方面照顾，许其承租原用部分，从廉征收租金，并准予借用原用桌凳器具。其兄弟等并表示愿继续义务管理。至其子侄等现在所住部分，即行让出。

裴子等均属社员，知秋生等不但平时管理勤勉，且当日寇侵略时，尤竭尽苦心，维护社产及社内保藏之文物，丝毫无损。盖今日尚有印社，可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实赖秋生等护持之力。故裴子等亦同意请求贵处于接收后，顾念历史，予以特别照顾，勿以一般公产之承租人相待，则秋生等不致失所，同人于捐产之附带希望，亦获实现，均感公便。

如承贵处同意接收，社方应有如何之手续措施，希予示复，以便转知王君等遵办为荷。再，印社发起人吴、王、丁、叶四君，现唯王君健在。来函列名之吴君，则为原发起人吴君之嗣君（社例：社员身故，其子继之）。当时出资，吴君最多。除间有捐资协助者外，一般社员，凭介绍入社，毫无义务。故此举王、吴二君倡议，社员定必一致同意，毋庸顾虑。因高同志曾以询及，故附及之。此致

敬礼！

邵裴子（并印） 同启
陈锡钧（并印）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

附原函^[10]。

复示请寄本市龙兴路十五号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裴子等收。

三、三函考识

结合时代背景，考证以上三函，可得以下认识：

（一）房地产捐献性质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农村虽已广泛开展土改运动，但在城市远未开始对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故主函及附函所称“将我社历年经营之社址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呈请政府有关部门将我社接管”“献诸人民群众管理”等，其含义即赠交。邵函则更明确表述为“此项房地献给政府”“愿以印社房地献给政府”。对此，接收单位行文（包括回函）也全部延称为“捐献”（详见下）。吴振平专程来杭赠交西泠印社名下房产权证给政府部门（详见下），也足可证明。

（二）社藏文物包括书籍器物之移交应认定为保管

对于印社所藏“固定性文物”与“可动性文物”，主函称“希望尽量保留”“分别移交”，附函也笼统称“唯有献诸人民群众管理”“社产呈请政府接管”；而邵函先表示为“在原地保管”“交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后又称“盖今日……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但随后邵裴子在致杭州房管处康玉生函中又言“社中所有文物，概由该社移交省文管会接收。至其房产捐献，则为我等私人受托代办”（详见下）。有关部门如杭州市民政局则在呈代市长吴宪报告与致杭州市建设局函中则都提到：“房地同意捐献……文物准予保管。”（详见下）可见，对于社藏文物等物品的移交性质，应认定为代为保管。这也是恢复后的西泠印社提出“代管”说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是物随社走，都归了国有。

（三）主要捐献人是吴振平

前两函反映出，吴振平的捐献意愿更为明确，态度更显积极；且在与王福庵正式致函前，他已为此奔走杭州，分别相商于邵裴子、陈锡钧与印社管理人。主函王福庵置先，是王福庵属长辈。

吴振平，浙江绍兴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字石潜，1867—1922）幼子，随父居上海，承父业并以善制印泥出名，也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1947年与韩登安、叶良本（叶为铭次子）同被推为印社的干事。^[11]

1951年8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税务局房地产税编查表》、1951年11月4日纳税人为叶秋生的《浙江省人民政府税务局房产税缴款书》与1947年西泠印社契照（均杭房藏）显示：其时西泠印社有土地5.678亩，房屋合计建筑面积701.13平方，时值230275000元（1955年

币改后为 23027.5 元），代理人吴振平、叶秋生，房产证由吴振平收执，表明已是吴振平实际掌控印社这一主要资产，这与印社的成立与发展以吴隐的贡献最大直接有关。建社初期四位创办人公捐，吴隐出资达大洋 490 元，占四人捐 1084 银圆的 45.2%。^[12]又，吴隐父子早期以西泠印社名义大量出版书籍与出色研制印泥，促使西泠印社声誉鹊起。因此，其他创办人或其继承人即使有处置意愿，也须经吴振平同意方可提出。而到此时，并不见其他两位共有人即丁辅之、叶为铭（时均已故）后代有任何表示（叶良本直到 1951 年 11 月 2 日移交之日才出现，详见下）。至于创办人以外的其他社员，不享有对印社财产的支配权，这在邵函中也述及。

在历经战乱、民生艰苦的情况下，吴振平等为西泠印社的保存与发展不计个人得失，令人敬佩。可惜他的这一大功，至今彰显不足。

（四）捐献给谋求印社的存在与发展，直接促因是社团登记

附函所称“登记条例”“今限期已迫，不可置之不理”及“登记处所”，背景是 1950 年 9 月 2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3]次年即 1951 年初，浙江省人民政府也发出补充规定，要求“各地的社会团体限四月底前登记”^[14]。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 1951 年 3 月 23 日又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施行细则》，对民间社团实行登记制，规定由社团负责人申请登记，“限令各旧有的社会团体，于一定期间内补行申请成立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以自动解散论；抗不登记继续活动者，得由该管人民政府解散之，并得予该社会团体负责人以惩处”^[15]。杭州市民政局也刊登通告，规定了当地的登记期限，“已进行筹备设立的社会团体及已成立的社会团体，限于七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卅一日止向本局办理补行申请登记”，并重申了后果。^[16]

前两函提到的“现在社员散漫已极无法团结。……欲求进步，殆不可能”与“按原有社员组织，衡诸登记条例，绝对不够条件。如欲重加组织，则决无人肯出而负责与领导”，确为实情。作为民间结社，西泠印社的组织结构本不健全。所举社长马衡（1881—1955），1949 年前就是挂名的，其时远在北京另有要职；所举总干事韩登安（1905—1976），因曾任职旧政权，当时正被强制管训，无暇顾及

社团事务。且因新旧社会更替，社员情况变化太大，有的甚至无法联系，不仅缺乏负责人而不能登记，更无法填报该《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各项登记内容，诸如章程、计划、目的、主要负责人姓名与主要经历、组织情况及人员数目等，从而面临自动解散。而且，印社本就“向以公诸大众为原则”，为求印社的延续与发展，“以更有意义的贡献于人民大众”，在当时只有赠交国家才能实现。

以上也说明，这一捐献移交的提出，与丁辅之、马衡、韩登安等人无涉，更不存在其他直接起因或政府的强权行为。

四、焦点事项

如果没有这批档案的存在，谁也不会相信这一重大捐献移交所引起的焦点事项，是政府接收部门能否同意印社管理人叶秋生（约 1897—1972）、叶德生（1911—1994）两家在原处生存续操旧业。

叶家三代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小本生意，与西泠印社可以说是相互依托。在为观光游览者带来参观休息与购物方便的同时，印社也借以保持生气，扩大影响，并得到日常的照看接待，甚至各项税费承担。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八年，公私所藏文物图书大有损失，不乏荡然无存者，即便如邵裴子、陈锡钧也不幸免。^[17]而叶家却能“维护社产及社内保藏之文物丝毫无损”，实为奇迹，令人刮目相看，故邵函方有“盖今日尚有印社，可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实赖秋生等护持之力”这样的由衷之言。当印社归公后，当地政府部门能否满足管理人的这一要求，捐献人无力干预；且在历经战乱、百业凋敝的背景下，管理人全家的生存也确非捐献人所能担当。为此，邵裴子只能反复提请政府接收部门同意。但到各项交接完成日，有关部门仍没有任何实质表示，邵裴子等只能进一步致函（杭房藏；另见底稿，浙博藏）吁请并详陈理由：

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房产管理委员会房产管理处^[18]：

我们已遵照约定于本日代表西泠印社将该社房产（连同契据）、器具及文物照缮具清册分别移交贵会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至于原管理人

叶秋生、叶德生兄弟及秋生之子松柏、松泉希望照顾一节，前由园林管理处周主任通知裴子“西泠印社闻业奉到上级批示同意由房管处接收，交由园管处管理。对于叶等的照顾，闻：上级认为适当照顾，但不能作为条件”等云。查裴子、锡钧前函园管处，代表在上海之该社原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等表达愿将该社房产连同土地捐献政府之时，曾请照顾原管理人叶秋生等生活，但并不以此为捐献条件。兹承允“适当照顾，但不能作为条件”，与原来声请的意思正同。除前已向园管处说明叶等与社之关系外，今再向贵会陈明，以资了解：

西泠印社创设至今已四十余年，闻始即由叶秋生之父叶洛九管理，订定不给报酬，但许其利用一部分房屋卖茶及经售印谱、书籍、书画及其他物品，不收租金，以资补贴。管理、清洁均由其负责，房屋小修及房地租亦由其负担，直至于今不改。洛九年老，即由其长子秋生实际负责管理。其后洛九病故，由其子秋生接管。再后因营业范围稍稍扩大，秋生识字不多，不能书写、做账，即召回在上海习商之胞弟德生帮同料理。最近因秋生二子均已长成，由秋生将所营各部分生业，分配由其弟及二子与自己四份分理，每部分的收入由分理之人享受。其一家大小十余口，均恃此为生。故印社房屋捐献之后，若不能继续其从前所受之待遇，则全家衣食即生问题，因其此外别无其他生理。再叶家三代为印社服务达四十余年，平时颇能尽心，沦陷期内，保存社产，丝毫不损，尤属不易。本社于社产捐献之后，不能再直接予以照顾，念其前劳，故为声请。现经叶等表示意愿，自以资本不多，且经营缺乏领导，以至难以改进。最好能就其现在营业范围，许其与政府合营，庶经营既有领导，管理亦可加强。所望似尚合理，为此陈明其与印社多年之关系，并为代陈意愿，尚祈酌夺，本“适当照顾”之旨，予以处理是荷。此致敬礼！

西泠印社代表人

邵裴子（并印）

陈锡钧（并印）

吴振平（并印）

叶良本（并印）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

住址：龙兴路十五号省文管会转

但印社移交后，紧接着叶氏兄弟两家被全部迁出，另行安排。^[19]社址由杭州园管处另派专人负责维修，社址向有的门店经营全部取消不存。各类活动因无场所无法举行，印社形同消失，此状持续多年，结果大大出乎人愿。

五、邵裴子功绩

王福庵、吴振平委托邵裴子作为第一代理人，是英明之举。观整个捐献移交过程，邵裴子尽力有加，直接出面以外，今见到其亲拟信函就达六通，以致杭州有关部门在函牒中多次称为“邵裴子等捐献”。

邵裴子（1884—1968），名长光，浙江杭州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出身，民国间先后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等职。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他与陈锡钧^[20]都善书，喜鉴藏金石碑帖，同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

以邵裴子的地位、学识与威望，他的出面经办，自然得到杭州市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迅速反应。其功绩还体现在：

第一，提出可动性文物交浙江省文管会接收保管。这既可为之妥加保存，也是出其背景。时杭州市尚未设文物保护单位与收藏单位，而印社所藏多纸质文献，一旦保存不当，即面临霉烂、虫蛀、鼠啮。又，文物书画的点收造目，远比房地产复杂得多，外行难以胜任。

第二，提出“请保留‘西泠印社’名称，依旧使用”。这一可谓高瞻远瞩的要求，只出现在邵函中。

第三，积极吁请房地产接收部门照顾管理人全家的生计。西泠印社所藏文物、字画、图书，是极具文化内涵与既往繁荣的见证，但向来缺乏详细完备之登记目录，实际上完全由管理人掌控。邵裴子这一善举，有利于社藏物品的如数顺利安全移交。

邵裴子的这些作为，为数年后西泠印社的恢复埋下了伏笔。但他仅据王福庵、吴振平委托就直接操办，特别是他认为“社员定必一致同意”并对政府部门释疑，显为不周与过于自信。交接中，他与陈锡钧既充当移交方西泠印社的代表人，又是接收方浙江省文管会的代表人（详见下），实属不妥。

六、事记及文录

1951年7月15日，王福庵、吴振平致函邵裴子、陈锡钧（前录），正式表示捐献意愿，并委托他俩经办。此前，吴振平来杭分别趋访相商于邵裴子、陈锡钧与叶氏兄弟。

1951年7月24日前，叶氏兄弟按吴振平嘱趋访邵裴子、陈锡钧，并递交了《叶秋生、叶德生请求事实》报告（浙博藏）。

1951年7月24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函杭州市园管处主任周永年（前录），正式向政府部门提出捐献并明确相关事项。

1951年8月4日，杭州市建设局致杭州市民政局《为西泠印社愿将房屋土地捐献政府，交由园林管理处接管，函请查正核办并希见复由》（杭房藏）：

接本局园林管理处八月二日林管字第1459号报告：以西泠印社社员邵裴子、陈锡钧二君，转附该社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二人原函，愿将西泠印社的房屋土地捐献政府，要求本处接管，并提出两点要求……经本处研究结果，认为西泠印社在孤山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孤山风景而言，确有统一管理的必要，原则上同意由本处接管。唯究竟应否交由本处接管？以及当应具备何种手续？谨检附原函贰件，报请核示等情：本局同意由园林管理处接受，统一管理。兹检附原函贰件，函请查正核办，并请转报市府核准！至捐献手续，应如何办理，并希复示，以便转知。此致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计附邵裴子等原函贰件^[21]。

1951年9月10日，杭州市民政局呈代市长吴宪《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呈请核示由》（底稿，杭房藏；正本杭州档案馆藏）：

……取局意见：房地同意捐献，由房管处接收，由园管处管理，文物准予保管，管理人叶秋生、德生等，由园管处按具体情况酌予照顾，不能作为接收房地后之限制。是否有当？呈请核示。

1951年9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杭州市民政局（杭房藏）予以同意。

1951年9月26日，杭州市民政局致杭州市建设局《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函复查照由》（底稿，杭房藏），

告知已获同意的请示市政府内容，要求该局通知杭州房管处进行接收，并请转知其下属园管处与房管处联系办理。

同日，杭州市民政局致函杭州房管处《为西泠印社捐献土地，业经呈奉市府同意，函请你处予以接收由》（另见底稿，均杭房藏）。

1951年10月16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康玉生（杭房藏）：

康同志：

裴子前在开会期间，承枉顾，见询西泠印社房产老契问题，并约以三日答复。此项产契，系由何人收执，裴子向不明了。经询印社管理人，始知系由创办人某君保管。已嘱该管理人去信接洽，请其寄杭（保管人向往上海）。一俟寄到，当即奉知。

此事系裴子与同事陈伯衡先生同受该社创办人王、吴两君委托办理。同时，社中所有文物，概由该社移交省文管会接收。至其房产捐献，则为我等私人受托代办，与我会并无关系，特此附白。此致

敬礼！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六日

1951年10月20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函杭州房管处康玉生（杭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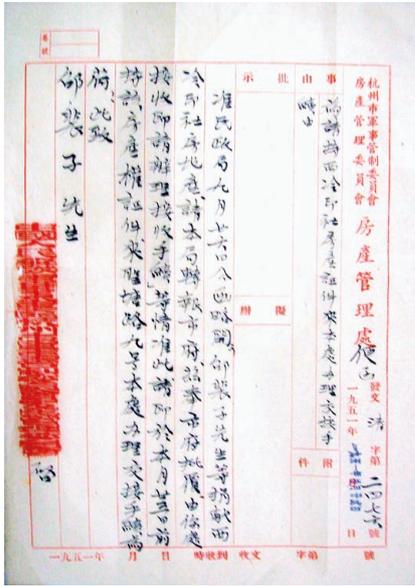
康同志：

关于西泠印社老契移交事，前已有函奉洽。兹得上海创办人方面致此间管理人叶德生函，略称：“已蒙当局允予接管，至为欣慰”。嘱叶“将可以移动之物件，分两部分造具清册：①交与园管处者；②交与文管会者（按：此指文物部分，交园管处者为器具部分）。另一方面请与有关各方磋商移交手续与日期。诸事明确后，详以见告。图照及契约，当于移交时亲自携来”等云。现我已嘱叶德生赶办清册。办竣后，即行通知贵处指定日期，再函上海方面将图照等携来交上。先此奉知，即致敬礼！

邵裴子
陈锡钧 启

十月二十日

1951年10月22日，杭州房管处致函邵裴子，要求持该房产证于1951年10月25日去该处办理交接手续（图3，



◎ 图3 杭州房管处致邵裴子公文

浙博藏；另见底稿，杭房藏）。

1951年10月23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杭房藏）：

兹奉贵会清字第二四七六号致本人便函，敬悉。此事曾经贵会派康同志前来了解，以我适参加省人代会，未能到会，经函复。此事乃由西冷印社发起人王、吴二君托我及我会同事陈锡钧代表转为申请，已嘱在杭之该社管理人函上海王、吴二君，请将契据寄来。旋得上海与该社管理人复信，嘱为分造器具及文物清册（器具备移交园管处，文物备移交我会），俟造好后再接定交接日期，由王、吴二君之一亲自携来契据来杭交接。我已于隔昨函知康同志。兹接来信，定于廿五以前持证前往贵会交接，实来不及。当俟各项清册造好，由我再行函请贵会指定日期，一面即据函沪上之原发起人持件前往贵会交接。今复奉洽，此致

房产管理处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三日

我与康同志二信，可以取看，以资接洽。又及。

又原发起人准备将：（一）房产证，（二）器具，（三）文物，一次交出。以往在上海，多次往来或久留杭州，均有未便之故。

1951年10月26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杭房藏）：

西冷印社管理人已将器具等移交清册造好。请你决定移交日期告知，以便即函上海通知该社创办人如期携带契据来杭交接。今日为星期五，希望当日或星期六得到你处回信，再预备信件和人。杭沪往来共四日，如定为下星期五交接，当尚从容。是否即定为下星期五，请你决定见复，转沪接洽。此致

房产管理处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六日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邵裴子《函复西冷印社交接日期地点由》（浙博藏；另见底稿，杭房藏），表示同意邵裴子所提日期，决定11月2日上午9时在西冷印社社址办理交接手续，并请即通知在沪负责人，按期到达办理交接手续。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浙江省文管会《函告请派员会同接管西冷印社文物由》（底稿，杭房藏）：

本处准市民政局转奉市府指示接管西冷印社捐献之房地产。查其文物部分拟由你会接收管较为合适，用特函达。……

1951年11月2日，完成全部移交手续。

该日点收完成的《西冷印社移交文物碑刻清册》（杭房藏，载图书、印谱、字画、文物、碑帖等约380多件，包括在原地保管的不可移动文物）末尾显示：“移交人：西冷印社代表邵裴子、陈锡钧、吴振平、叶^[22]。接收人：文管会代表邵裴子、陈锡钧、朱^[23]。会同接收人：房管处代表康玉生。”

该日点收完成的《西冷印社移交器具清单》（杭房藏，载家具等约280多件）末尾显示：“移交人：西冷印社代表邵裴子、陈锡钧、吴振平、叶良本。接收人：房管处代表康玉生、金家祥。会同接收人：文管会代表邵裴子、陈锡钧、朱寿潜。1951年11月2日。”

同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吴振平、叶良本致函杭州房管处（前录），再次要求印社管理人能在原处继续旧业。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公安北山路派出所（底稿，杭房藏），要求准吴振平将其私人所有的家具运出。此前，吴振平提交题为《吴振平寄存家具》清单一页（杭房藏），要求归还家具等物件。

1951年11月6日，杭州房管处高副处长就11月2日

邵裴子等四人函要求下属提出意见（杭房藏）。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税务局西湖区分局《为准民政局转奉市府指示接管邵裴子等捐献西泠印社房地产清查照由》（底稿，杭房藏）。

1951年11月9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民政局《为函复接收西泠印社经过清查照由》（另见底稿，均杭房藏）。

同日，杭州房管处呈代市长吴宪《为请示将西泠印社交园林管理处管理理由》（底稿，杭房藏）。

1951年11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杭州房管处（杭房藏）予以同意。

1951年11月19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建设局《为奉市府指示西泠印社房产交你局园林管理处管理理由》（底稿，杭房藏），要求该局于11月21日上午9时派员前来会同办理交代手续。

至此，该项捐献移交历经四月告结。

现在看来，吴振平、王福庵这一历史选择卓有远见。

本文应约据《西泠印社国有化钩沉》（载《中国书法》2016年第9期，署名王巨安、周刃、吴琼俐）改写。

【注释】

- [1]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编：《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 [2]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卷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77页。
- [3] 如西泠印社官网的“百年西泠”栏目中，有“西泠收藏故事——丁辅之的嘱托”一节（<http://www.xlys1904.com/portal.php?mod=view&aid=1595>）称：“丁辅之紧紧握住王福庵的手说：‘龙华已有炮声了，创社四人，吴石潜、叶为铭皆先而故，印社的重担由你一人承担了。好在解放已近，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听着躺在病床上老友的嘱托，王福庵潸然泪下。……1951年夏，王福庵带着老友的嘱托，与吴石潜之子吴振平商议，联名写信给在杭社员邵裴子、陈锡钧，请他们代为转呈捐献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地产、社藏文物的信，信中提出唯一的请求，就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
- [4]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佩智编著《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与《回望西泠印社六十年（1949—2009）》，分别于2005年、2009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 [5] 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 [6] 即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当时各地普设。

[7] 指杭州西泠印社。

[8] 周永年（1908—1990），原名彬。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1948年起任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处长、主任达30多年。

[9] 指主函。

[10] 同上。

[11] 1948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出版的《美术年鉴》第二章“西泠印社”条载：“八十翁叶品三以精力就衰，推韩登安、吴振平、叶良本为干事，并由韩登安总其事。”

[12] 陈振濂：《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书法研究》1992年第4期。

[13] 详见《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1日第3版。

[14] 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2月12日第3版。

[15] 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4月29日第3版。

[16] 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7月12日第2版。但浙江省该项工作至1952年底仍未完成，为此，该报1952年12月31日第3版载《省政府厅指示本省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完成社会团体登记工作》。

[17]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垣旧事——杭州文史资料第25辑》，杭州市政协文史委2001年9月印行。

[18] 从档案看，当时此名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处”通用，故本文在陈述时均简称“杭州房管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5月7日成立，是此后至1951年浙江省和杭州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

[19] 据叶秋生孙永茂惠告：叶秋生一家被安置在湖滨一公园对面居住，并在楼下设西泠礼品店；叶德生一家回祖宅延定巷46号居住。

[20] 陈锡钧，江苏淮阴人。清代两江法政学堂出身，民国时期在浙江各地法院与政府部门任职，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长，有“碑帖大王”之称。

[21] 指主函与邵函。

[22] 即叶良本。

[23] 即朱寿潜，时任浙江省文管会秘书。

【作者简介】

王巨安：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文物征集背后的历史情结

述 / 孙晓泉 整理撰文 / 郭超英

1962年末，张鲁庵先生家属将张先生毕生所收藏印章、印谱捐献给了杭州市政府暨西泠印社，遂了其遗愿。这对于尚处于恢复初期的西泠印社是笔莫大的财富，是西泠印社建社以来所接收到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物。

张鲁庵（1901—1962），浙江慈溪人。久居上海，是西泠印社的老社员。他早年篆刻受业赵叔孺，后在继承传统之中，专注于邓石如，辑有《秦汉小私印选》《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等。他尤钟情于收集历代印章、印谱，而且所收印谱既富且精，时称“海内第一家”。他还精于制作印泥，其研制的“鲁庵印泥”为篆刻家所乐求。

1959年秋，作为组织参与者，我亲历了西泠印社的恢复阶段。为了加强对西泠印社恢复工作的领导和研究水平，我们充实调整了恢复西泠印社筹委会的组成人员，由张宗祥、潘天寿、邵裴子、阮性山、沙孟海、诸乐三、韩登安七人组成筹委会，张宗祥任主任委员。为庆祝国庆10周年，西泠印社拟举办历代书画展，委派王树勋（时任杭州书画社主任）、韩登安拜访浙、沪两地老社员，并商借书画展品。这就有了印社工作人员与张鲁庵的唯一一次接触，他们到上海走访的第一位老社员就是他。他们与张先生谈到为了西泠印社的恢复与发展，需要收集历代金石书画，张先生听后即表示，在他身后可将他的收藏全部捐给西泠印社。

1962年春，曹漫之对我说起此事，我即于5月派王树勋、韩登安，会同老社员高式熊，再往拜访张鲁庵先生。然而遗憾的是，张鲁庵先生已于4月不幸病逝了。我们担心捐献之事可能会因此而搁浅，但经过了解知道，张鲁庵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要将这批藏品捐献给国家。据此，张鲁庵夫人及哲嗣张永敏表示，捐献不成问题，只是具体捐献给哪个部门，尚待商量。经王树勋、韩登安、高式熊等人说明：“张

鲁庵先生是西泠印社老社员，西泠印社是全国性的印学研究团体，这批藏品捐给西泠印社是最理想的归宿，这样做，也是符合鲁庵先生遗愿的。”张氏家属深明此理，经过商议，全家一致决定将这批印章、印谱捐给西泠印社。王树勋、韩登安等当即帮助张家将这批藏品进行了初步清点。

韩登安回来后向我汇报说：“这批藏品不得了，不仅何雪渔、文三桥、赵之谦等明清大家都有，而且秦汉铜印也是既多且精，其中善本、孤本、明拓等版本，多为罕见之物……”

我听了甚为高兴，说：“经过战乱，我们接管西泠印社时，社内没有一颗印章，也没有一本印谱。这次捐献如能成功，我们西泠印社才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印学团体，你们也立了一大功呀。”

在捐献过程中，张氏家属提出：“鲁庵遗嘱是将这批印品捐献给国家，而西泠印社不是国家机关，仅是群众性团体，这事如何办好？”于是众人为难了。

经过思考，我提出一个方案：“张鲁庵先生遗嘱将所藏印谱、印章捐献给国家。为此，我们可以报请批准，张家这批印品捐给杭州市人民委员会，由陈礼节副市长代表市人委接受捐献，并以市人委名义颁发奖状、奖金。然后再由陈礼节副市长宣布，将这批印品交给西泠印社保管、使用。”我的这个方案，大家一致赞成，并向市人委进行了汇报，市领导亦同意。张家也同意捐给杭州市人委。

事情进展似乎很顺利，但也许是好事多磨。10月初，王树勋从上海回来后对我说：“事情很复杂，上海方面说，这批藏品应该留在上海，不同意捐给杭州。”

我感到愕然，急问：“不同意？是哪个单位？”

“是主管局。”

“你找到曹漫之同志吗？”

“找过。他说，要你到上海去商量商量。”

于是，我很快赶到了上海。

据曹漫之说，上海市有关主管机构确实想把这批印章留下，他们表示：“这批藏品不能让杭州运走。”

这时，我感到有些棘手了。这批东西都是大橱小箱贮藏着的，他们不同意，难道叫我们秘密行动不成？于是我提出找上海市文化局协商。

曹漫之说：“找文化局不行，关键是两个人，一是市委分管文化的书记王一平，一是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

“好！”于是我俩一起分别拜访了两位领导。

果然，在我们说明情况，讲清理由后，他们认为：“上海事情够多了，像篆刻印谱之类的东西，还是由西泠印社保管好，物尽其用嘛！”他俩答应了，并表示有关单位由他们去打招呼。

至此，问题圆满解决了，所有印品于10月11日运抵杭州。我们又请沙孟海、阮性三、诸乐三、韩登安、朱醉竹仔细清点、检查了这些印品，造册登记。对此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的领导如王黎夫、赵士炘等同志，也应邀参加了此项工作。对捐献印品进行清点、登记后，其数量如下：历代印章1525方（其中秦汉铜印305方，历代名家刻印1220方），历代印谱433部，计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孤本、善本33部，计200余册）。诸德彝先生对此曾有评语：“名人篆刻，搜罗尤多，浙皖诸家，择精著录，所收诸印俱各精美，无伪品。”（诸德彝《慈溪张氏鲁庵印选》）

1962年12月15日，捐赠仪式在杭州饭店举行，仪式由我主持，时任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代表杭州市人民委员会接受捐献，并发给奖状及奖金一万元。然后陈礼节副市长将印品清册交给西泠印社保管、使用。

他说：“西泠印社可以通过陈列、展览、研究和出版，充分发挥其作用。”会上，张永敏介绍了其父的生平及意愿。西泠印社筹委会主任张宗祥致答词，对张鲁庵家属表示感谢。出席仪式的还有马一浮、沈尹默、邵裴子、王个簃、潘天寿、沙孟海、唐醉石、钱君匋、诸乐三、丁吉甫、叶潞渊、罗叔子、韩登安、方去疾、高式熊等著名学者和书画家及张鲁庵夫人。《人民日报》及沪、浙两地多家报纸，均对这一要闻进行了报道。

事后，我向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进行了汇报。林

书记说：“这个人不简单！他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收藏印品，干得很出色，贡献很大。”并指示：“把葛岭一座黄颜色小楼拨给西泠印社作为藏印之用。”

印社特将藏品辟专室保存，沿称“望云草堂”，并由张宗祥社长题额，悬于藏印楼的门楣上。从此，望云草堂和张鲁庵先生的珍品长存在西子湖畔了。

西泠印社还有许多社员、社友为丰富社藏做出了贡献。如高络园先生献铜印500方，多为汉代私章，篆法严谨，形制规整，保存完好。这是高先生所辑《乐只室古玺印存》的原印。后又赠晋代铜鼓2只，和汉、晋有纪年或纹饰的古砖数百块。高络园先生之女高璧女士捐献了《朱耷墨迹集册》20页，诗书画俱精。葛昌楹先生献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这是葛先生1925年编选的《传朴堂藏印菁华》中的精品，1938年又合辑于《丁丑劫余印存》。其中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鹧深处”、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诸印，更是篆刻史上的代表作，久为印学界推崇。印社创始人王昶遗存的自镌、自用、自赏佳印，则由其家属选出356方，于1964年赠送印社。徐渭草书《唐岑参〈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是其少有的大幅佳作，得来很曲折，全凭曹漫之先生多方周旋。邓石如草书五言对联和虚谷设色梅兰竹菊画屏，是上海魏廷荣先生捐赠。吴昌硕的书画，印社独多，主要来自上海朵云轩的大力支援，以及方去疾先生的热忱提供。

近年来，我也耳闻目睹了许多社员向印社捐献珍品的事迹。王个簃先生捐献了吴昌硕的书画，吴长邨向印社捐献了吴昌硕所刻极其珍贵的田黄印，杨鲁安捐献了他收藏的一大批文物，诸涵等诸乐三的家属捐献了诸乐三晚年篆刻的精品印章，日本东丘印社捐献了一批日本古印谱和中国藏传铁印，童衍方捐献了新近所购日本圆山大迂印章，小林斗盒在百年社庆前夕捐献了他用重金购得的吴昌硕名印“西泠印社中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了社员拳拳爱社之心。

本文原载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孙晓泉（1919—2015）：书法家，1958年至1982年间任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曾两次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1979—2003 年 改革开放后至百年大庆的西泠印社

十年浩劫之后，印社工作百废待兴。1979年，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这次庆祝大会强调了这样的观点：“西泠印社作为艺术团体，必须加强学术研究，繁荣艺术创作，并在人才培养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一精神的确立，为西泠印社重新恢复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西泠印社中断多年的活动又开始恢复正常。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泠印社在浙江省、杭州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项社务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海内外的印学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加强。

1980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先生率领青山杉雨、村上三岛等人组成的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专程来杭举行铜像捐赠仪式。

1981年，西泠印社吸收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梅舒适和小林斗龠为名誉社员。

1982年，西泠印社在杭州举办已故社员韩登安、阮性三遗作展，并且接待了青山杉雨先生率领的日本谦慎书道会江浙学术考察团的来访。

西泠印社出版社成立之后，短短几年间，编辑出版了《西泠印社藏印选》《西泠印社铜印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张宗祥藏印集》等大批印谱法帖，为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的普及与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社员更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如方去疾对明清篆刻流派的研究、罗福颐对古玺印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很高的

学术水准。可以说，伴随着“艺术的春天”的来临，西泠印社也进入了全面恢复进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83年11月，西泠印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建社80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社长沙孟海先生针对长期以来“金石”与“篆刻”概念混淆不清的情况，提出了印社要以印学为主、加强学术研究的观点，并明确了篆刻学独立的思想。这一观点的提出，对西泠印社乃至整个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此后，西泠印社社团事务走上了常规发展的轨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团运作机制。除建社逢五、逢十周年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外，每年定期邀集外地社员来杭研究印学、商讨社务、观赏藏品，组织社员开展篆刻书画创作和展览交流活动，并编辑出版金石书画出版物。

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稳定，使西泠印社社员的个人艺术创作也异常活跃，个展、联展层出不穷。印社还组织了数次全国性的篆刻作品评展，组织社员进行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的专题性篆刻创作活动。在学术研究方面，则有《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古肖形印臆释》《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史》等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相继问世。社报《西泠艺报》也在这一时期创刊发行，对于及时了解社内外情况，增进社员间的友谊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社团组织建设上，社员队伍不断扩大，遍及全国各主要省市，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同行被吸纳为社员，他们的加盟，为印社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印社的藏品也得到进一步充实。1987年，丁辅

之后人捐献其生前用印 72 方，社员戚叔玉捐赠《十钟山房印举》原拓本 8 函 182 册。1989 年，已故社员葛昌楹的夫人捐赠葛先生生前用印 10 方及《邓印存真》2 册。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1993 年，赵朴初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沙孟海、赵朴初、刘江、李伏雨等社中前辈的提议和倡导下，在印社同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印学博物馆从无到有，并在 1999 年 9 月正式建成开馆。这对弘扬传统艺术、传承与普及印文化、促进印社对外交流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 21 世纪之后，西泠印社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和城市格局变迁的背景下，百年名社遭遇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惑——社长赵朴初先生过世造成掌门人缺位、社团登记受阻、印泥商标官司、出版社停业整顿、高级人才流失、主要经营场地杭州书画社拆迁、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孤山社址常年失修、产业经济效益严重亏损等，一时间，西泠印社的发展几乎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既有外界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不适应，也有来自历史、体制的制约，更有内部运作机制和管理的问题。一方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公众关注面的转移，传统的艺术品经营项目难以适应；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泠印社社团、行政机构、产业经营、文保单位、出版事业等多种性质的实体对外都称为“西泠印社”，管理模式滞后，无法按照各自规律运作，造成各种资源限于内耗，无法协调发展。

对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把西泠印社的发展作为建文化大省、创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强调要通过改革，加快发展，做大做强西泠印社，光大西泠印社品牌，促进西泠印社的全面发展。在 1999 年的《关于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把金石书画作为三个重点发展的艺术门类加以扶持。为了进一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西泠印社社团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体制上的关系，促进西泠印社各项工作稳定、健康、协调发展，2002 年 7 月，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决策，调整西泠印社行政组织机构，并于 2002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召开西泠印社六届五次理事会，从社团组织内部对这次政策上的机构改组进行了相应的呼应和调整，延续多年的西泠印

社运作格局有了重大改变。根据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精神，西泠印社撤销西泠印社办公室（原杭州市文化局下属单位）行政机构，组建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为市委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作为印社日常事务管理机构，承担西泠印社社团日常事务、学术研究、文化艺术交流和教育活动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社委会于 2003 年 7 月正式组建完成。同时，鉴于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先生已经逝世，选举启功先生为社长，增选陈振濂、王玉明两位副社长。进一步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鼓励社员写出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创作出高质量的艺术精品。此外，对西泠印社现有各经营部门和经营性资产进行整合，实行公司化改造，建立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并积极吸收其他国有及社会资金，使之逐步发展为股份制的现代文化企业。总之，在社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社团、事业、产业实现了良性互动，分类管理。

2003 年，西泠印社被确定为浙江省、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在新的世纪，传承印学文脉的百年名社悄然转身，以一种更加温雅从容的姿态，步入了新的发展里程。这一次转身，后来被媒体称作浴火凤凰般的涅槃重生。

（选自《西湖丛书·西泠印社》）

沙孟海社长关于西泠印社发展的学术主张

文 / 陈振濂

一代宗师沙孟海先生，既是一位书法艺术大师，又是一位学术泰斗。他以具有前瞻性的学者眼光，对于向来被称为“雕虫小技”的篆刻艺术以及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学术主张与文化定位。

印社之名，当然首先是得自于“印——篆刻”。在明清文人篆刻兴起之后，“以印会友”成了篆刻家之间交流的一般方式。西泠印社在创始之初，也遵循了这一传统的做法。每年两次的春（清明）、秋（重阳）雅集，即是印社中人互相交流、赏印论印，观摩研讨的最佳组织“载体”。而每十年一次的庆典，如20周年时的“金石书画展览”，30周年时的“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40周年补行（1947年丁亥）纪念活动中对历代印人的祭奠等，皆是以印交流的盛大活动。虽然当时没有正规的学术研讨，篆刻家们也不习惯于写论文宣读发表，但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映照下，西泠印社通过这些具有学术含量的活动来体现其研究风范，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根本上说，当时的“研究印学”还很难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性质规定，而更多地体现为“印论”与“书论”“画论”“诗论”“文论”的相并列，还缺乏真正的学术规范与逻辑思考，这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故几篇《印学概论》（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沙孟海、马衡等著）的出现，已经预示着印学研究从传统的古典印论随笔方式，开始向有一定系统的、概论式的现代学术论文方式转型。这种转型，在历史学、文学、哲学方面，甚至是在美术学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篆刻方面，却相当迟缓滞后。以此角度来看西泠印社的“研究印学”，恐怕更易见出的是文人士大夫雅玩风范，而不是现代学者的专业风范。

马衡是第一个讲求学术规范的社长，他的主攻方向是

在广义上的金石学。对他而言，篆刻（印章）只是金石学中很小的一个分支，肯定不属于他的主要学术成就的范围；而沙孟海则是以印学研究为自己的“主业”，因此他的研究，体现出明确的从古代印论方式（如《沙村印话》）向现代印学史研究方式（如1964年《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谈泰印》、1980年《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1987年《印学史》）的转换——从印学随笔札记到专题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研究方法”的转换。这种转换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这种新的研究指向，在沙孟海而言，是历史、文物考古与书法、篆刻并举。如在这同时，他的书法论文《碑与帖》《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以及其他学术研究论文《助词论》《训诂广例》《家谱通例》《转注说》《〈海岳名言〉注释》《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等，同样是在实践这一从古代书论、文论向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其次，他的学术论文有足够的“疑古精神”，每有宏文发表，必指向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绝不无病呻吟、东抄西凑，更不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如关于“秦印”名称的考辨、关于书迹与刻迹、关于执笔法问题……都是打破习惯认识，有理有据地提出新见解的好论文。如果是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印论札记方式，大抵是自娱娱人；而如果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则当有感而发，每发必中。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认为：“研究印学”在吴昌硕时代，在印社四位创始人的眼中，与在沙孟海心目中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不同，才体现出时代的变迁与学术规范的变迁。

在西泠印社史中，沙孟海是以明确的学术形象“自立”于印社的。早在1963年西泠印社六十大庆时，他即应邀作学术报告《印学的发展》；在随后的1964年，纪念吴昌硕

120周年诞辰暨孤山吴昌硕纪念馆成立之时，他又应邀做关于吴昌硕治印艺术的重点发言。当时50多岁的沙孟海，在西泠印社名家元老之中，已有鲜明的学者形象了。至1979年西泠印社75周年当选为社长之后，他更是为西泠印社的学术（而不仅是技能型的篆刻创作）大声呼吁。在此一阶段，有两个举措足以证明沙孟海的学术自信心，并体现出他作为社长、学术泰斗的原则立场。

其一，重视并坚持篆刻与印学的学科定位。

1983年，适逢西泠印社八十大庆。沙孟海社长在庆典大会上发言，明确提出篆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自立，应该把它从含混的“金石”概念中剥离出来，使篆刻能够以独立的艺术门类自立于艺林。他分析了金石学作为“学术”与篆刻作为“艺术”的根本区别；并指出，按传统的做法，“篆刻”依附于金石学，看起来是自高身价，其实反而丧失了独立性，不利于篆刻学（印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应该予以澄清。沙孟海的宏论一出，在习惯于以金石指代印学、篆刻学的老一辈社员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社员表示疑问，但王个簃、方去疾诸位则认为沙老的看法有道理而予以支持。沙孟海也非常和善又非常坚决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直到几年以后，一些老社员才开始慢慢改变了原有看法。

应该说，由经受过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洗礼，又在学术转型过程中有过深切体会的沙孟海，以社长之尊登高一呼，会对篆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极大的好处。它会使篆刻的学术边界更清晰，轮廓更分明，研究主体更具有主导能力，学术框架与体系也更具全面与综合性。这二十年来，西泠印社学术方面的实践证明，沙孟海先生的这一“廓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为西泠印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学术支点。

其二，明确提出西泠印社应该是“国际印学研究中心”。

1988年，沙孟海社长又一次提出，西泠印社虽然有85年历史，但国内外以印聚社的例子越来越多，在新形势下，西泠印社唯有紧紧抓住学术研究这个命脉，打造学术核心，并使它在国际上产生主导性影响，这样才是“天下第一社”应做的工作与应尽的责任。在他之前，印社的宗旨本来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又加了一个“兼及书画”。如前所述：如果把当时的“研究印学”大致定位为古代印论或论印诗形态的话，那么沙孟海社长明确提出建立“国际印学研究

中心”的构想，则具有明显的以现代学术来统辖印学，并且以清晰的理论形态（学术论文与研究著作）来定位“研究”的性质。它在西泠印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理念与新目标。

一切艺术的创造实践，在行为与形态上必然首先表现为“术”，即技巧形式的实践。而要使某一种“术”具有历史含义或进入历史进程，则建立在“术”基础之上的“学”的概括与综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世纪之交，篆刻艺术有长足进展之时，各地印社的成立，林林总总，大抵是以创作实践，即“术”的内容来切磋交流的。西泠印社之所以能被尊为“天下第一社”，是因为它的人才汇聚与学术指向——篆刻的创作实践与交流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每个印社无论大小皆会努力去做的，而理论研究，特别是有学科基础的、有高度的学术研究，却是绝大部分印社无法胜任的——只有像西泠印社这样既有百年历史，又囊括国内外人才精英、极具凝聚力的“元老大家”，才有能力去做好这一工作。沙孟海社长有杰出的实践经验（可以《兰沙馆印式》为证），又有极强的学术意识和理论研究上的卓然大家风范（可以他的大量学术论文为证）；此外，他还有足够的权威与号召力（可以他作为书法泰斗与西泠印社社长的身份为证）。有此三者，则他提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之构想，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他任社长期间，每五年一轮的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的举办以及各种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在他身后，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建立，无不是对他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宏伟构想的积极回应。在社庆之际，我们积极筹备、策划的各项学术活动，也都是在认真实践着沙孟海先生的构想。在今后，随着西泠印社的又一次走向繁荣昌盛，可以设想：沙孟海社长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目标，还会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会以篆刻创作实践为基础，以学术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为目标，不断去创造真正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所应具备的新辉煌。

本文原载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西泠印社文献概要（1904—1998）

文 / 朱妙根

西泠印社百余年历史，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现将历年来收集的这方面资料，择要汇编成文，以补史著之用。

一、《西泠印社志稿》

《志稿》对印社的组织、建筑、布置、人物、艺文、规则、藏弄等，都有详尽记述。《志稿》先后编写过三本，复刻过一本。第一本为1915年由印社创始人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编写，汪承启作序；第二本，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编写印行；第三本为1960年由秦康祥补写的油印本《西泠印社志稿附编》；第四本为西泠印社成立80周年前夕，由印社依据1957年本复刻油印100本存社。

（一）1915年本志稿

1915年由西泠印社创始人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共同编写《西泠印社志》。《志》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上）、艺文（下）、规则、藏弄、志余八卷，汪承启（佑卿）作序。但此《志》成书后未及印行，便告散佚。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编辑印行的《西泠印社志稿》一书曾提及此事：“原夫《社志》之作，叶、丁两君，早有同心，且已成编，今乃湮没，不可得见。”“叶舟丈曾有《社志》之辑，即讯叶舟后人，遗稿查不可得，因不胜唏嘘。稿既成，亟谋写印，或不至如叶舟之稿倏然散佚也。”笔者1993年7月从杭人藏书家陶承杏先生家中，发现湮没已久的首本《西泠印社志》，原来由他收藏着，之后由笔者在《西泠艺报》予以披露。据陶先生言，此《志》他于1949年前得自杭州青年路昭生旧书店。昭生家住涌金门直



◎ 印社重要历史文献《西泠印社志稿》

街，与叶为铭先生为近邻，过从密迹，私交甚笃，此《志》当是昭生从叶家获得。陶先生素有搜书抄写之嗜好。得书后，便亲笔照原《志》清写一本备存，并于1965年请印社老社员朱醉竹先生朱笔斟校、作序、署签，线装成册，计124页，6万余字。不久，“文革”开始，陶藏《西泠印社志》原稿本、清写本均被查抄。“文革”结束后清写本失而复得，原稿本则不复可见。

据朱醉竹先生在陶氏的清写《志》本序文中说：“……近以其清写叶一舟、丁辅之、王寿祺三文所同辑之《西泠印社志》稿成，嘱为斟校题记，并将原迹仍藏其‘辉运楼’中。盖自日寇陷杭，铁花庵中藏书星散，迨重光后，福庵丈亟访此志，而不可得，乃另起炉灶，重事搜集，嘱社兄秦子彦冲逐录哀辑，又商定于孙丈廛才，复成《西泠印社小志》六卷，已付印矣。今竟得见此湮没而不可得见之原稿，既为注其异同，又复正其讹谬，凡二百数十处。”此《志》原为陶承杏先生收藏，陶歿后，由其子女陶士和兄妹接收。陶氏生前秘藏此志，从不示人，与笔者交友时，只允观看、摘要，绝不允全文抄录、复印。故只摘录了现《志稿》中

没有记述的部分。

1. 印社创设时，吴隐、丁仁、王寿祺、叶为铭等多次呈文及各级政府批文。

2. 有关“印”的掌故。此志本中一一记载了“吴遁庵得‘云中白鹤’印拓片题咏册”“宋岳忠武王印”“汉寿亭碧玉方印”“雪渔所刻‘听鹧深处’印”等印的由来和典故，读来引人入胜。

3. 现藏西泠印社的《汉三老碑》被誉为“浙东第一古石”。《志》中详尽记载浙人抢救《汉三老碑》募集捐资的过程和精拓此碑一百张，凡认捐一份者，赠送拓片一张以为纪念等事。

4. 征书及章程和收藏目录，也是后编志稿没有辑入的。征书启事和章程明文规定，专收两浙古今志乘及乡邦掌故、先贤著述及一切考论金石玉器书画等书，若当代名流有所投赠则又不敢以此为限。

5. 《志》文记载了丹徒戴振声癸丑西泠印社修禊律诗四首。戴振声是《招隐山房诗集》作者戴启之子，癸丑（1912年）随父参加印社盛典，赋诗四首，以记其盛。并有日本三位诗人，亦联袂而至，洵盛事也。

（二）1957年本《志稿》

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合编。六卷（线装）一册，油印本，约58000字。

孙智敏作序，王福庵作跋。《志》分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志物、志余六部分。

（三）1960年本《志稿》

秦康祥编。二卷（线装）一册，油印本。

志稿编定以后，复以编余之金石及印人社友小传，别成附编，分上、下两卷。

（四）1983年复刻本《志稿》

此本依据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合编本复刻。内容相同，也是线装，一册，油印本。

二、《西泠印社记》

《西泠印社记》记叙印社建筑物修葺的过程，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等，先后共有八篇，见诸印社《志稿》的有五篇。1906年印社日籍社员河井仙郎首先写《西泠印社记》并刻诸贞珉，后1912年余杭人鲁鉴，1913年

会稽人胡宗成，1914年钱塘人张景星，以及安吉吴昌硕，也都分别有撰记。

1949年后撰写三篇。一篇为衢州徐映璞撰。徐为清平乡人，晚年寄迹杭州清平山，专工诗词记传，尤长于史志舆地之学，自号清平山人，记为1958年所撰。另外两篇是印社社员林乾良和社长沙孟海分别于1983年和1988年撰写的《西泠印社记》。沙氏《记》已于1988年刻石嵌于孤山印社社址的碑廊内；林氏的《记》由同人姜东舒书写成篇藏于印社。

三、西泠印社纪念刊物

（一）《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

新州叶为铭编。平装，一册，1933年排印本，约7万字。

该书颇为详尽地记述了西泠印社30年的经历，其中有印社土地测绘面积图、宅地面积执照、《西泠印社启》、《西泠印社社约》、《西泠印社同人录》、社藏印谱等内容。

（二）西泠印社80周年纪念刊物

《西泠印社社员印集》由谢稚柳题封，扉页分别由沙孟海、王个簃、启功题写，钱君匋作序。16开本，15印张，220页。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为建社80周年的纪念刊物。该书将印社历史上100人的作品编印成册，并附注作者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何时入社等内容。

（三）西泠印社90周年作品集纪念册

该纪念册由西泠印社编辑出版，汇集社内外200余位作者的近250余件印、书、画作品。其中有国家领导人和著名人士题词。地域遍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及台湾、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四）西泠印社90周年大型纪念画集

该纪念画集由西泠印社出版发行，印数2000册，是集文字、图片为一体的大型豪华本纪念集，由时任印社副社长方去疾作序。

四、西泠印社图卷

西泠印社图卷是西泠印社史上难得的实物文献，先后有陈豪、汪洛年、高时丰、陆俨少、潘韵、王伯敏、姚耕云、舒传曦、丁茂鲁、陆抑非、王辛大，或个人或合作，或彩

绘或壁刻，作品达十幅之多。其中以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为最先。

(一) 陈豪《西泠印社图》卷

纸本，水墨，纵 25 厘米、横 97.9 厘米。自题：“西泠印社图，丙午九月为辅之世二兄作，止庵陈豪。”

卷后另纸有金蓉镜(1914)、胡饒(1907)、吴昌硕(1908)、程兼善(1909)、金鉴(未署年月)、盛庆蕃(1909)、张祖翼(1911)、金尔珍(1914)、高尔康(1914)、章澍(1914)等十家题咏。

(二) 汪洛年《西泠印社图》卷

纸本，水墨，纵 24.9 厘米、横 107.7 厘米。自题：“西泠印社图，丙辰十月为辅之二兄属，汪洛年制。”

此卷为汪洛年 1916 年所作，轻描淡写，骨秀神清，笔墨颇得戴熙风韵。此画创作于吴昌硕首任社长后三年，也称得是一件早期为印社留痕的罕见佳品。

图后另纸有题者十人，依次是：吴庆坻(未署年款)、潘飞声(1917)、罗振玉(1917)、黄山寿(1918)、朱孝臧(未署年款)、张朝墉(未署年款)、王禹襄(1930)、陈汉第(1944)、陈敬弟(1944)、孙智敏(1944)。

五、西泠印社孤山社址遗迹

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各处景观存有大量的名人匾额、楹联，点缀观照景点，令人品赏之余回味无穷，摘录记之。

(一) 正门

印社正门门楣上“西泠印社”匾额，是沙孟海先生 1983 年夏所书；右侧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上“西泠印社”四字，是张宗祥先生 1963 年所书。

(二) 柏堂

原为南朝宋代古迹，年久屋圯，清光绪二年(1876)重建。

正门门楣“西泠印社”篆书匾额，吴昌硕书。

柏堂内“柏堂”隶书匾额，俞曲园书。

柏堂正大门两侧楹联，胡宗成撰、沙孟海书：

旧雨新雨西泠桥畔各题襟溯两汉渊源藉征鸿雪，

文泉印泉四照阁边同别藓挹孤山苍翠合仰名贤。

柏堂大门沙孟海楹联旁侧楹联为方介堪所书：

访三老碑亭东汉文留遗迹在，

问八家金石西泠社近断桥边。



◎ 柏堂内正厅上方木刻匾额“柏堂” 俞曲园书

(三) 竹阁

原为唐代古迹，清光绪二年(1876)重建。

竹阁门楣上匾额“竹阁”己未年(1979)夏六月为诸乐三书。

竹阁门边两侧“以文会友，与古为徒”楹联为丁上左撰、王个簃书。

(四) 仰贤亭

明天顺间就关氏四照阁遗址改建，年久为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为印社初期的建筑物之一。

仰贤亭有三处仰贤亭匾额，南面“仰贤亭”匾额为沙孟海书，北面“仰贤亭”匾额为赵朴初书，东面“仰贤亭”匾额为王个簃书。

仰贤亭东门旁楹联为金鉴撰并书：

先生扇莲社清风刻画六书负鸿博，

胜地是桃溪深处渊源一派溯龙泓。

(五) 宝印山房

在仰贤亭东，1913 年建，后圯，1974 年重建，因先有赵之琛书额，故沿用其名，宝印山房左边空地，为原西泠印社发创之地数峰阁的遗址，早圯。

“宝印山房”隶书匾额，在宝印山房门楣上，为赵之琛书。

“天地有正气，山水函清晖”大篆楹联，在宝印山房大门两侧，集文信国谢康乐句，为清道人书。

(六) 还朴精庐

位于印社西麓，建于 1915 年，是印社早期建筑物之一。内有匾额两块：门楣上“还朴精庐”篆书匾额为吴昌硕书，门楣下侧“纂籀簃”行书匾额为罗振玉书。

门旁两侧“君子好遁，弥勒同龕”楹联为吴昌硕书。

(七) 遁庵

紧邻还朴精庐，建于 1915 年。

门楣上“遁庵”匾额为吴昌硕书。

大门两侧“既遁世而无闷，发潜德之幽光”楹联为张祖翼书。

(八) 观乐楼

即吴昌硕纪念馆，在华严经塔西面，建于1920年。印社前期的一些活动曾在这里举行。吴昌硕生前来杭，也曾住在这里，登观乐楼，游览两湖（里、外西湖），全景在目。

内有匾额三块：二楼门楣“观乐”隶书匾额为（佚名）书，二楼大厅上侧“吴昌硕纪念馆”行书匾额为沙孟海书，二楼大厅下侧“去驻随缘室”篆书匾额为王个簃书。

大门两侧“鬪云起高阁，叠石疏流泉”楹联为韩靖庵书。靠韩氏楹联两旁为任董撰并书的楹联：

得无官失求夷日，
尚有闻歌识雅人。

悬挂在大门的最边楹联由许炳璈撰、程十发书：

合内湖外湖风景奇观都归一览，
萃浙东浙西人文秀气独有千秋。

楼内正堂两侧楹联为吴昌硕撰，诸乐三书：

印诂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
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九) 四照阁

宋初都官关氏建，原址在现华严经塔处，后废。明天顺间郡守胡濬重建，又废。1914年西泠印社重建，并迁于凉堂之上，即现址，它东南西北四面皆为明窗，故名四照阁。

门楣“四照阁”行书匾额为谢雅柳书。

大门两侧楹联为金有麟录旧句，刘江书：

尽收城郭归檐下，
全贮湖山在目中。

阁内楹联为赵士鸿撰、刘海粟书：

高阁山光仍四照，
故人石壁亦三生。

(十) 鹤庐

与题襟馆相连，在题襟馆后，1923年建成，因系丁仁捐资，故以其号名之。

门楣上“鹤庐”隶书匾额为吴让之书。

大门两侧楹联为观津老人撰、朱屺瞻书：

梅鹤为邻小坐依然图画，
莼鲈下酒故乡无此湖山。

(十一) 题襟馆

又名隐闲楼，1914年建，上海题襟馆书画会会友募集书画易资兴建，以为游息之所，室内墙上嵌有丁敬《砚林诗墨》等刻石。

门楣上“题襟馆”匾额为金尔珍所书。

大门两侧楹联为丁上左撰并识，高丰书：

宜雨宜晴静观自得，
尽美尽善为乐至斯。

题襟馆西门旁楹联为杨天禄集，陆俨少书：

登高一呼万山皆应。
得少佳趣众宾与欢。

六、西泠印社历年出版活动

西泠印社的出版活动与印社的诞生相伴相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印社的历史，也是编辑出版的历史。印社所以能享誉海内外，与印社和同人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印学、篆刻等的图书，是密不可分的。印社的出版活动分1949年前、1949年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究竟出过多少图书，现已无从查考；后半部分，印社曾编辑过《西泠印社出版社1978—1994年出版图书目录》，尚可查清。现将1904年至1998年时间跨度达95年的有关出版印学、篆刻方面的图书粗略汇集如下，并企盼同仁续补，以补印社出版史之用。

1904年

印社辑《吴让之印存》十册。

丁仁辑《西泠八家印选》四册本和三十册本。

1905年

印社辑《钱胡两家印辑》四册。

叶铭辑《铁花庵印集》八册。



◎ 西泠印社出版的部分珍贵手拓印谱

丁仁辑《杭郡印辑》八册。

印社重辑《周秦古玺》二册。

1907年

王昶辑《福庵藏印》十六卷。

1908年

印社辑《求是斋印谱》（陈豫钟刻印）二册。

印社辑《赵次闲印存》四册。

吴隐辑《遁庵秦汉古铜印谱》八册、《遁庵集古印存》十六卷。

1909年

叶铭辑《逸园印辑》四册。

印社辑《杨啸林印集》（杨大受刻印）二册。

印社辑《铁庐印谱》（钱松刻印）四册。

印社出版《十六金符斋印存》（吴大澂辑）。

1910年

印社辑《养自然斋印存》（陈雷刻印）二册。

印社辑《补罗迦室印谱》（赵之琛刻印）二十册。

印社辑《印汇》二百五十二册。

印社辑《龙泓山人印谱》（丁敬刻印）八册。

印社出版《印人传》《续印人传》。

叶铭撰《后续印人小传》三卷及补遗一卷。

丁仁辑《鹤庐印存》四册。

吴隐辑《鸳湖四山印谱》一册、《浙西四家印谱》四册、《三代古陶存》、《遁庵秦汉印选》四集二十四册。

1911年

叶铭撰《广印人传》四册十七卷。

印社辑《蒙泉外史印谱》（奚冈刻印）二册、《吉罗居士印谱》（蒋仁刻印）一册、《秋景庵印谱》（黄易刻印）四册。

钟以敬撰《篆刻约言》。

1912年

丁仁辑《悲庵印存》（有二册、三册本二种）。

印社印行《咏西泠印社同人诗》。

1916年

丁仁辑《秦汉丁氏印谱》二册。

印社出版《完白山人印谱》二册。

1917年

印社辑《赵搗叔印存》二集八册、《董巴胡王会刻印谱》

四册。

印社出版董洵《多野斋印说》。

吴隐辑《篡籀穆古玺选》二册、《秦汉百寿印聚》二册。

1918年

印社出版朱象贤撰《印典》六册。

1919年

吴昌硕自刻印《缶庐印存》八册。

1920年

吴隐汇辑《遁庵印学丛书》十七卷二十五册。

印社出版《黟山人黄牧甫印存》二册。

1921年

罗福颐辑自刻印《初庵印草》二集和《仿古玺印谱》。

1922年

陈衡恪著《中国绘画史》（含印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

1923年

叶铭辑《遁庵遗迹》一册。

商承祚、罗福成、罗福葆、罗福颐辑《古陶轩秦汉印存》。

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十五卷、《殷墟文字待问编》十三卷。

1925年

沙孟海辑自刻印《兰沙馆印式》二册。

葛昌楹辑《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册、《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六卷。

罗福颐辑《玺印姓氏征》二卷。

1927年

方岩辑自刻印《介堪印谱》一册。

罗福颐辑《待时轩印存》正集十八册。

马衡辑《毓庆宫藏汉铜印谱》二册。

1928年

沙孟海撰《印学概论》。

方岩辑自刻印《方介堪篆刻》。

马衡辑自刻印《凡将斋印存》一册。

张鲁庵辑《横云山民印聚》二册。

1929年

黄质辑《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八册、撰《古印概论》。

马公愚辑自刻印《马公愚印谱》四册。

陈巨来辑《安持精舍印存》一册。

罗福颐编撰《汉印文字征》《古玺文字征》。

谢磊明辑《春草庐印存》六册。

1931年

葛昌楹辑《吴赵印存》（吴熙载、赵之谦刻印）十册。

邹梦禅辑自刻印《梦禅治印》一册。

吴熊辑《封泥汇编》一册。

罗福颐编撰《印谱考》四卷。

1932年

罗福颐辑《待时轩印存》续集十五册。

方岩摹辑《古玉印汇》一册。

马衡辑自刻印《端庐印稿》三册。

1933年

印社印行《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叶铭编）。

1934年

印社辑《现代篆刻》九集。

方岩辑自刻印《介堪手刻晶玉印》二册。

1935年

张鲁庵辑《钟斋申印存》四册。

1936年

王昶辑《麋研斋印存》二十册、辑自刻印《麋研斋印存》四册。

经亨颐辑自刻印《颐斋印集》一册。

张鲁庵辑《黄牧甫印存》二册。

商承祚重辑《契斋古印存》十册本。

吴熊辑《百名家印谱》。

1938年

邹梦禅辑自刻印《梦禅治印集》二册。

1939年

谭建丞辑自刻印《建丞印存》一册。

丁仁、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辑《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

张鲁庵辑《鲁庵印选》六册、辑徐三庚印《金罍印抚》四卷。

1940年

印社辑《伏庐选藏玺印汇存》三册。

黄质辑《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五册。

张鲁庵辑《退庵印寄》（赵之琛刻印）四册。

沙孟海撰《沙村印话》。

俞人萃辑《荔庵印选》二册。

1941年

董雪鸿辑自刻印《雪鸿印存》五集。

1943年

葛昌楹辑《吴赵印存》重辑本六册。

王昶辑自刻印《麋研斋印存》重辑本四册。

秦康祥辑《松窗遗印》（诸德彝刻印）二册。

韩登安辑自刻印《登安印稿初集》一册。

张鲁庵辑《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二册。

1944年

吴朴摹辑《小玺汇存》二册。

童大年辑自刻印《童子雕琢》四册。

高时敷辑《乐只室古玺印存》十一册（另有一册合集本）。

葛昌楹、胡淦辑《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十二卷。

张鲁庵辑《何雪渔印存》二册、《秦汉小私印选》二册。

钱君匋辑自刻印《钱君匋印存》二册。

马衡撰《论刻印》。

葛昌楹辑《邓印存真》二册。

1946年

朱屺瞻辑《梅花草堂白石印存》二册。

1948年

高式熊辑自刻印《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四册。

方去疾辑自刻印《去疾印稿》一册。

唐源邛辑自刻印《醉石山农印稿》一册。

陈巨来辑自刻印《盍斋藏印》二册。

秦康祥辑《睿识阁古铜印谱》。

来楚生辑自刻印《来楚生印存》二册。

1949年

秦康祥辑《古笏斋印谱》（钱世权刻印）一册。

徐良辑《乐易榭印谱》（方去疾刻印）二册。

1950年

秦康祥辑《乔大壮印选蜕》二册。

方岩辑自刻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册。

吴朴辑《二金蝶堂印谱》（赵之谦刻印）一册。

方约选拓《苦铁印选》四册。

1951年

方约辑《晚清四大家印谱》（吴熙载、赵之谦、胡饴、吴昌硕刻印）。

陈巨来撰《安持精舍印话》一卷。

汪统辑《复戡印集》二册。

1952年

王昶辑自刻印《麋研斋印存重辑本》（续）二册。

叶潞渊辑自刻印《静乐簃印存》一册。

1953年

张鲁庵辑《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一册四卷。

1954年

印社印行《西泠印社胜迹留痕》（韩登安刻）。

钱君匋辑自刻印《君匋印选》二册。

1956年

商承祚编撰《石刻篆文编》二册十四卷。

1957年

印社印行《西泠印社志稿》（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编）。

1958年

黄质编撰《滨虹草堂玺印释文》一文。

1959年

方去疾、吴朴、单孝天辑自刻印《瞿秋白笔名印谱》一册。

张鲁庵发起集刻《鲁迅笔名印谱》。

1960年

钱君匋辑《豫堂藏印甲集》（赵之谦刻印）一册。

1961年

钱君匋自刻印《长征印谱》一册。

吴朴撰《印章的起源和流派》。

1962年

钱君匋辑《豫堂藏印乙集》（吴昌硕刻印）一册。

1963年

印社辑《西湖胜景印集》一册。

罗福颐、王人聪辑《印章概述》一册。

钱君匋、叶丰编撰《中国玺印源流》一册。

傅抱石撰《齐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

罗未子撰《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

印社印行《西泠印社小志》（叶铭编）。

1964年

韩登安辑自刻印《毛主席诗词印谱》。

印社出版《西泠四家印谱》。

1966年

钱君匋辑《丛翠堂藏印》（黄牧甫刻印）二册。

1972年

韩天衡、张维琛、单孝天辑自刻印《新印谱》第二集。

1976年

郁重今刻《鲁迅笔名印谱》。

1977年

印社编辑出版《历代印章简史》。

印社编辑出版《吴昌硕印略》。

1978年

罗福颐辑《汉印文字征》增订本。

印社出版《西湖胜景印集》（手拓本）。

1979年

印社编辑出版《革命胜迹印谱》《王福庵说文部目》。

印社编辑出版社刊《西泠艺丛》（不定期）。

1980年

方去疾编《明清篆刻流派印谱》。

韩天衡著《中日篆刻艺术》。

丁吉甫辑《现代印章选集》。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印社铜印选》（手拓本）、《西泠印社藏印选》（上、下，手拓本）、《西泠印社胜迹留痕》（韩登安刻印，手拓本）。

1981年

罗福颐辑《西夏官印汇考》，编撰《古玺印概论》，主编《古玺文编》《古玺汇编》。

方去疾撰《明清篆刻流派简述》。

印社编辑出版《鲁迅著译书名印谱》（上、下，手拓本）、《吴让之印存》、《吴让之篆书字帖》。

1982年

韩天衡撰《五百年流派印章艺术新谈》。

小林斗盒辑《中国篆刻丛刊》四十四卷四十册（集明代以来刻印）。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后四家印谱》《黄牧甫印存》《王个簃印谱》，出版罗福颐著《近百年来对古玺研究之发展》。

1983年

马国权编撰《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

方去疾编订《吴让之印存》。

沙孟海撰《谈秦印》。

王伯敏编释《古肖形印臆释》。

印社编辑出版《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

1984年

印社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吴昌硕作品集》（上册绘画，下册书法篆刻）。

1985年

印社编辑出版《李叔同常用印集》（手拓本）、《张宗祥藏印集》（手拓本），出版《中国历代印学论文选》（上、下，韩天衡编订）、《篆刻丛谈》（叶一苇著）、《晓天印稿》。

编辑出版《西泠艺报》（月报）。

1986年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浙江篆刻选》《秦峰山碑》，出版《邓石如篆书〈弟子职〉》。

1987年

印社出版《印学史》（沙孟海著）。

印社编辑出版《印学论丛》、《西泠印社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选》、《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作品选》、《篆刻丛谈续集》（叶一苇著）。

1988年

印社出版《钱君匋刻书画家印谱》。

1989年

印社出版《篆刻技法》（刘江著）。

1990年

印社编辑出版《铁云藏印选》、《钱君匋论艺》、《左夫刻印选集》、《现代印选》（陈寿荣编）、《中国篆刻学》、《商周金文选》、《现代印选》、《全国印社篆刻联展作品集》、《西泠艺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期）。

1991年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艺丛》（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期）、《余任天书画印谈》、《余任天印集》。

1992年

印社编辑出版《书法教育学》（含篆刻）、《西泠艺丛》（第三十、三十一期）、《西泠印社藏印选》（手拓本）。

1993年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八家研究——丁敬》、《印学论谈——西泠印社九十周年论文集》、《国际篆刻书画邀请展作品集》、《西泠印社九十年》、《吴昌硕》（潘天寿著）、《中国印学年鉴》、《陈茗屋印痕》、《西泠印社九十周年》、《刘江篆刻》、《玉柱印痕》、《经亨颐作品集》、《吴昌硕、王福庵书西泠印社记》、《吴昌硕作品集》（续集）、《吴昌硕早期诗稿手迹两种》、《西泠印社第三届篆刻作品评展作品选》、《韩登安印存》、《马亦钊书法篆刻选》、《思微室印存》、《翰墨春秋——沙孟海先生纪念集》（刘江、沙匡世等著）、《日本的篆刻》（高畑常信著、徐梦嘉译评）、《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刘江著）。

1996年

印社编辑出版《姚江名人名胜篆刻》、《西泠印社法帖丛编》（《大孟鼎铭文》《石鼓文》《吴昌硕临石鼓文》《魏季子白盘铭文》《散氏盘铭文》《毛公鼎铭文》《颂鼎铭文》《汉铜印源》）。

1997年

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印社古铜印选》《吴昌硕篆刻及其刀法》《西泠四家印谱》《西泠后四家印谱》《王福庵说文部首》。

1998年

印社编辑出版《吴让之篆刻及其刀法》、沙孟海《印学史》（重版）、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曹锦炎《商周金文选》及《中国篆刻学》（重版）、《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吴让之印存》、《黄牧甫印存》、《中国历代题画诗选注》、《赵之谦篆刻及其刀法》、《黄牧甫篆刻及其刀法》、《吴昌硕篆刻及其章法》、《篆刻家常用字字典》、《汉铜印丛》、《顾氏集古印谱》、《吴昌硕诗稿手迹》、《吴昌硕行书诗稿》等。

本文原载于《西泠艺报》1998年第145、146、148期

【作者简介】

朱妙根：西泠印社理事。

西泠印社与台湾印学的发展

文 / 简英智

【摘要】

西泠印社成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已有115年历史，赓续不绝，社誉甚隆，早为海内外印人向往的印学圣地。其成立与发展具有五大典范性特点：群策群力、团队合作；坚持实践印社宗旨；继承传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庭园兴建、雅集论印。此典范性，启示并影响了台湾的印学发展。

台湾印学发展较为迟缓，且一路坎坷，直至清代中晚期，始渐萌芽，未见茁壮。日据时期，印学初兴，台湾本土印人传承明清篆刻及日籍印人带来的明治时期日本篆刻，1913年水竹印社、1923年婆娑洋印会、1932年台北趣味同人会，是得西泠印社典范性的启示与影响。

1945年至今台湾印学发展，历经台湾印学会、海峽印集、篆刻学会以及印社林立等时期，从印学团体结社、发展、雅集模式，到印学理念、印风，都受到西泠印社的启示，并以参照西泠印社成功经验为标杆，寻求开拓未来发展之道。

【关键词】 西泠印社 水竹印社 台湾印学会 海峽印集 印宗秦汉

一、西泠印社成立与发展的典范性

西泠印社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编辑印行的《西泠印社志稿》卷三，记云：

清光绪间，杭郡文学诸长老，探讨六书，研求篆刻，辄会于数峰阁。厥后印人，仁和叶为铭，亦作单名铭，字曰叶舟；王寿祺，今名禔，字福庵；钱塘丁仁友，后名仁，字辅之，号鹤庐；山阴吴隐，字遁庵，号石潜，又号潜泉，与同好数子踵行之是为印社先声。光绪三十年甲辰，于数峰阁旁买地数弓，遂议醵资营建立印社。^[1]

经过十年的擘画筹资、辟地营建，孤山西泠印社庭园完成，1912年9月开社。吴昌硕在其《西泠印社记》中提到，西泠印社创于甲辰（1904年），成于癸丑（1913年），并云：

……于壬子九月开社，彬彬秩秩，觴咏流连，洵雅集盛事也。^[2]

1913春召开成立大会，《西泠印社成立启》谈到印社成立缘由，云：

觴咏流连，赠缟有同声之应。是以永和禊事，高会兰亭；支遁吟俦，闲开莲社。……乾嘉盛时，则有丁龙泓、金冬心、厉樊榭结吟社于先，钱叔盖、李节貽、释莲衣立解社于后。

《社约》：

一、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3]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是西泠印社一贯的宗旨，亦始终为西泠同人之篆刻与学术所坚持与实践的宗旨。在一代代西泠同人努力之下，西泠印社自成立至今，已有115年历史，社运赓续不绝，社誉甚隆，早为国内外印人向往



◎ 图 1 中国印学博物馆

的印学圣地。当今，更以“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继往开来。西泠印社的成立与发展，具有五个具有典范性的特点：

（一）群策群力、团队合作

《西泠印社志稿》所言，西泠印社成立缘由是“清光绪间，杭郡文学诸长老，探讨六书，研求篆刻，辄会于数峰阁”，后叶为铭、王福庵、丁辅之、吴隐与“同好数子”共同筹创印社，经十年的辛苦擘画建设，筹建期间大抵由“创社四君子”共同董理社务。1913年召开成立大会，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印社首由有大影响力的篆刻学术名望来领导，而社务的开展一直是群体的努力。西泠印社的成立、筹建及发展具有群策群力、团队合作的典范性特点。

（二）坚持实践印社宗旨

1913年春西泠印社成立大会，在《西泠印社成立启》中开宗明义、郑重而堂皇地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社之宗旨。印社宗旨是印社同人的共同愿望，也是印社同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百年来西泠印社始终秉持“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印社宗旨。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不遗余力，史有著绩，1921年西泠同人热烈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建“三老石室”珍藏，首任社长吴昌硕及“创社四君子”叶为铭、王福庵、丁辅之、吴隐在印学研究上的成就每为典范，社员后学亦孜孜不倦，在篆刻学术上继有佳绩。21世纪以来，每年西泠学术研讨交流热烈而层次高超，成果丰硕，是为典范。

（三）继承传统、兼收并蓄

吴昌硕在所撰《西泠印社记》中道：

顾社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4]

鲁坚在所撰《西泠印社记》提及西泠印社建立仰贤亭，奉置先哲龙泓诸先生遗像二十八人，饯诸贞石，以资师镜。

胡宗成也在其所撰《西泠印社记》中道：

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古索今，开后起之先声。^[5]

在在表明，西泠印学继承传统、兼收并蓄，并且要继往开来，此亦成为篆刻后学之典范。

（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西泠印社仰贤亭所奉丁敬等印学先贤二十八人，在篆刻上包含浙派、皖派及扬州诸印派，地域上亦不以杭郡为囿，浙江、安徽、山东等五湖四海印学有成者，皆能广纳而弘扬。印社成立之初始即有河井仙郎、长尾甲两位日籍印人加入，西泠印社《大事记》记载：1906年河井仙郎慕名来访，与四位创始人“把晤于印社，以抒积愫，评论印学，迨无虚日”，并于浴佛日撰《西泠印社记》。^[6]河井仙郎赞印社吴、叶、丁、王各出藏印及印谱“不肯自秘以提倡后学，即余身处海外，亦得一苇而至，见所未见，不特余之幸，亦为后世刻印者之幸”^[7]。1970年后，西泠印社与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印人及印学团体有更加密切的交流：雅集、互访、展览、座谈、学术研讨，

西泠印社广纳海内外印学有成、弘扬印学绩效卓著者，如今社员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法国等。

（五）庭园兴建、雅集论印

西泠印社创始，先买地数弓，赀资营建，拓地筑屋，构亭浚泉，社员劳心，出钱出力，十年惨淡经营，于1913年竣工开社。1999年中国印学博物馆（图1）竣工开馆，是印社另一指标的完成。社员捐献玺印、金石、书画以丰富社藏。印社庭园及印学博物馆凝聚同人的向心力，是印社的“家”，亦为全体印人交流与研究印学的中心。效仿永和修禊兰亭雅集，以及丁敬等结吟社、钱松等立解社之前缘，西泠印社是篆刻专业文人的结社，活动方式如兰亭雅集，放怀吟咏、赏印论道。21世纪以来，每年举办专业、高层次的国际印学研讨会，并汇集发论文集，更成为国际印坛的标杆。

西泠印社的典范性，启示并影响了国内外的印学发展。下文将讨论西泠印社对台湾印学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二、明清时期台湾印学发展萌芽

相对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台湾印学发展较为迟缓，且一路坎坷。直至清代中晚期，台湾印学始渐萌芽，未见茁壮。

台湾至今考古尚未发现明郑时期以前有使用“印”，或类似印的原始初型，或有类似印记功能的应用。当文（彭）、何（震）大力提倡篆刻之际，台湾正在荷兰人的占据之下。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来台，期以台湾为反清复明大业之基，屹屹碌碌，却短命未能竟其志。郑经继位，亦以反清复明大业为目标，然而内有权力之争，外受荷兰及清廷之威胁，军事频仍，文艺之事，难以顾及。现今可见明郑时期的印章，官印有“招讨大将军印”、“宁靖王章”、“俨鉴”（玉印），文人书画用印有“郑森私印”“成功”“郑成功印”“森口”“宁靖王章”“玄畅斋”。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具章并奉上“延平郡王印”“武平侯臣刘国轩印”“忠诚伯臣冯锡范印”降清。

清初，台湾隶属福建，是边陲海屿，未受清廷重视，对于文教措施、文教建设未能重视，艺文发展迟缓。台湾社会仍未脱初期移民社会的景况，偏重拓殖营利，一般百姓为求生存与温饱已碌碌不堪，何能奢望艺文活动。然而，少数士人与地方富绅，在家产丰足后，便重视子弟的培育，

期勉勤力向学以博得功名，一方面设塾礼聘通儒硕望讲学，一方面自身转型为传统社会的文人生活形态。清道光（1821—1850年）以后，有诗文书画印造诣颇高的官绅佐幕陆续来台，同时，各地名士富绅兴建庭园日盛，如竹塹的北郭园、潜园，台南的吴园、宜秋山馆，板桥的林本源宅邸，雾峰的菜园等，广招各地文士雅集、诗会酬唱，传统诗、文、书、画、篆刻的创作与鉴赏，亦因而传承与发展。

至清嘉庆（1795—1820年）以后，多位在书画篆刻方面有较高造诣的文士来台，才真正开启了台湾地区的篆刻艺术。其中，吕世宜将金石学导入台湾，为台湾印学带来划时代的影响。吕世宜讲授金石学，指导书法，唤起文雅之风。他携带来台的书籍、金石拓本，扩展和开阔了一般文人、士子的文化、书画艺术鉴赏与创作。另一方面，他为林家购置数万卷书籍、千余种金石拓本，为台湾立下金石学的初步基础，是将金石学导入台湾的最重要的推手。^[8]清嘉道间大陆来台的文士中，郭尚先、吕世宜、谢颖芬、陈邦选等，台湾本土的林朝英、吴尚沾、洪丹九等，在书画篆刻上造诣较深，讲究用印，探索金石，提倡印学，台湾的印学始渐萌芽，尚未能茁壮。

三、西泠印社对日据时期台湾印学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一）日据时期，台湾篆刻、印学初兴

日据时期台湾的篆刻，一方面是本土印人传承明清台湾篆刻，另一方面是来台日籍印人带来明治时期日本篆刻的影响；而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篆刻又深受中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印风以及经由杨守敬传入北碑书风的影响。在台湾本土印人及日籍印人的努力下，促使台湾篆刻在该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前后，发展至历史的第一次兴盛期，表现为四个特征：参与的印人数量大增，印学社团成立与发展；台湾本土印人与中国大陆印人、日籍印人之间交往密切，跨地域的交往日增，日渐重视印学。

此期台湾篆刻发展是以成立印学社团和发行印学刊物为主轴的。1907年尾崎秀真与村木鬼空、杉阪牛麿在台北组织研究印材与印学的团体。1913年前后，泽谷星桥与当时日本长思印会在台印人今井星海、田村星台、岭竹轩等（日据时期在台日籍印人，约有50多名参加了当时日本的长思印会，并在长思印会所辑《雕虫》发表作品），以及台南地区的印人，共同创立水竹印社，并发行社刊《铁网

珊瑚》。1923年，尾崎秀真、諏访素涛、高泽寿等印人在台北成立娑娑洋印会，发行社刊《娑娑小景》。1932年12月，石原西涯、尾崎秀真等发起成立的台北趣味同人会，1934年夏出版《拾逸印集》，1934年10月举办“印材印谱趣味展览会”。此期比较有成就的篆刻家，除上述诸印人外，还有日籍的须贺蓬城、松田寄山、朽木研堂，台湾本土的赵钟麒、洪以南、王石鹏、谢国文、张耀堂、戴寿堪等。

印学研究上也开启了崭新的一页。1914年《台湾日日新报》以“寸心千古”专栏刊载水竹印社选，共15篇，每篇一印，并有尾崎秀真、赵钟麒及泽谷星桥的品评；1922年，尾崎秀真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古邨读余印存”专栏，共181回，介绍中、日名家与寓台日人印作；魏清德的诗、文造诣佳，亦精于金石书画的收藏鉴赏，留有大量有关印学的诗作、印谱题跋及印学论述，可以称是日据时期印学论述第一人，1922年发表《纪印谱》一文；张耀堂文学造诣深，兼擅汉诗，1933年发表《跋听莺山房印谱》，其在《台湾时报》发表探讨金石书画的文章共有三篇：1933年的《诗·书·画·三绝》、1934年的《本岛篆刻物语》、1935年的《石原西涯先生と斋藤东篱先生》；林熊光是日据时期台湾最重要的藏印家，参与台北趣味同人会，1931年辑得北京罗振玉赫连泉馆、北京尊古斋及上海黄滨虹、童大年等的古铜印，请盐谷寿石手钤《磊斋玺印选存》，是在台湾地区钤拓发行的首部古印谱，其《磊斋玺印选存》10册本收501印，《磊斋玺印选存》续集4册本收185印，《磊斋小玺选存》六册收384印，林熊光宝宋室曾藏古铜印至少1070方之多，经手及收藏的明清名家印也有数百方。

（二）西泠印社对日据时期台湾印学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西泠印社的成立、发展具有典范性，启示并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印学的发展。印人专业结社，可得互切互磋之效，集同道之力，篆刻得以推广，艺术可以提升，学术专业价值可以发挥，并受到社会高度赞同与肯定。有了西泠印社的成功范例，篆刻同道结组印学社团蔚然成风，如1914年乐石社，1921年冰社、圆台印社，1924年东池印社，至日本1907年丁未印社、1909年江上印社、1910年长思印会，日据时期台湾1913年水竹印社、1923年娑娑洋印会、1932年台北趣味同人会，都是得西泠印社典范性的启示与影响。

日据时期影响台湾印学发展的三大印学团体水竹印社、娑娑洋印会、台北趣味同人会，是印人同道的雅集体，无

正式政府立案之团体的组织严谨，许多社务是要同人群体分担而合力完成；并无正式推举或选举之明确的社长，但有公认共识推崇的精神领袖，如水竹印社的泽谷星桥，娑娑洋印会的尾崎秀真，台北趣味同人会的尾崎秀真、石原西涯，以及负责综理事务的主其事者，如水竹印社的泽谷星桥、娑娑洋印会的諏访素涛、台北趣味同人会的石原西涯。

此三大印学团体，都无明确的印社宗旨，其本旨及印社活动的开展，基本上还是实践西泠印社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从水竹印社发行的社刊印谱《铁网珊瑚》、娑娑洋印会发行的社刊印谱《娑娑小景》、台北趣味同人会发行的《趣味同好图录》《拾逸印集》，以及当时出版的印谱、图录即可探得。这些印谱、图录一方面是印社印人的“研究印学”，具体实践表现在自己的篆刻作品或论述、品评之上；另一方面是“保存金石”，展示同人收藏古铜印、明清名家印、印谱及金石拓本。台北趣味同人会林熊光收藏古铜印千方以上、明清名家印数百方，并钤拓成谱，是“保存金石”有成者。

西泠印社的活动以兰亭雅集的方式，放怀吟咏、赏印论道。春、秋两季于清明、重阳前后的雅集，是印社传统而固定的活动，挥毫、奏刀、鉴赏金石文物、谈印、论道、聚餐、合影。日据时期台湾的印社活动方式亦如是。曾于当时参与印社的戴寿堪描述：

……创设印社，每月集会数次，互相切磋，并各携其搜罗金石交换鉴赏，后将其作品刊登报端，以发扬我国古代文化……^[9]

梁乃予所撰《日据时代在台日本印人》一文也说：

台湾省在日据时代，篆刻艺术的风气是颇为兴盛的。当时日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艺术诸如绘画、书法、篆刻都极力追求、学习，并作有系统的研究。民国初年前后时期，台省就有许多“印社”分布各处，以台北和台南两地组织较为健全，社员人数也众多，社友经常举行雅叙，与会时各自提供篆刻作品、印石及有关资料相互观摩，将篆刻印稿辑订成集俾社员参考，也在报章杂志刊载篆刻作品，以期广布流传。^[10]

两者都提到印人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篆刻作品，日籍如泽谷星桥、諏访素涛、高泽寿、尾崎秀真、石原西涯、盐谷寿石，台湾本土如张耀堂和戴寿堪，其中以盐谷寿石发表约800方作品为最。印社雅集时印人同刻一“合作印”



◎ 图2 趣味之会席上合作印

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是很有意义、值得一提的雅事，如1931年3月7日的《台湾日日新报》就刊载了趣味之会合作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印（图2）。

四、西泠印社对1945年至今台湾印学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9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来台与第十九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市中山堂（原称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台湾回归中国。1946年起，陆续有大陆篆刻家如乔大壮、高拜石、陶寿伯、王壮为、曾绍杰、王北岳、梁乃予等渡海来台，与台湾本土篆刻家戴寿堪、郭介甫等，一同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一）台湾印学会时期

1949年11月，戴寿堪（比南）在《“中央”日报》与《新生报》刊登《征求金石篆刻同志》启事：

余素对我国文字考古极感兴趣，略谙篆隶金石篆刻艺术，收藏汉玺印及明清时代名人佳刻数百颗（如祝枝山、文三桥、何雪渔、丁钝丁、郑板桥、赵之琛、陈曼生、徐三庚等刻者），战前曾与台日汉学家创设印社，每月集会数次，互相切磋，并各携其搜罗金石交换鉴赏，后将其作品刊登报端，以发扬我国古代文化，迨战时以迄光复，遂暂告中断，近闻国内文人墨客迁台者颇不乏人，似有复兴印社之必要，以资鼓励吾国古代文字艺术，爰借报端征集同志，共襄盛举，企望专家先辈幸勿吝教，倘荷赞同，敬请函约，以便访谈（每星期日下午）或移玉敝址（每星期日上午）洽商进行事宜，是所盼禱！

台北市赤峰街十七巷二十七号戴比南启
是年年底，台湾印学会成立，会员有30余人，公推陶

寿伯为会长，戴比南、孙静子为副会长，会务大抵由戴比南周理推动。其活动方式除继续定期到戴邸聚会座谈，携名刻、佳石、印谱、书籍及个人近作互相观摩学习之外，并曾先后集刻《百寿石刻》印谱（1951年）、《岳武穆满江红词》印谱（1951年）、《正义印谱》（未集成）等。第一届美术展时，又集刻文天祥《正气歌》印谱（1952年）及印石60方参加展出，所用印石皆由半千石室提供。^[11]参与此四部印谱集刻的印人，前后共51人。

后来，戴比南因公调职鹿港，会长陶寿伯又经常奔波国外，印学会活动渐而沉寂。1957年，台湾印学会并入台湾美术协会，正式结束自己的历史。

（二）海峽印集时期

1961年10月，台湾艺术馆邀请当代篆刻家举行“当代金石家作品展览”，获得成功，揭幕酒会中印人云集，因感于篆刻人数众多，而台湾印学会久无活动，印人聚会谈艺机会很少，再次兴起结组印社念头。于是，由王北岳草拟，王壮为、曾绍杰、王北岳、李大木四人署名筹组印社的邀请函，函文如下：

××道兄雅鉴：

金石之道，肇于远古，盛于两汉，明清以还，名家辈出，遂成专艺，拔腊范金，工夺天巧，筹思运刀，神参造化，虽云法古，但体势有殊，各臻其妙，是以古人有印社之聚，以印会友，以友辅仁，互切互磋，得以进德修业，洵人间一大快事也。同人等有鉴于斯，爰拟发起印友之集，冀聚群贤于一室，效古人之雅会，兹订月之十三（星期五）下午七时半，在永康街廿三巷十号，略备茗点，共谋一叙，凉荷同心，伫候命驾。

端此即颂

近祺

王壮为、曾绍杰、王北岳、李大木顿首

十月十日^[12]

当年10月，海峽印集正式成立，会员24人，每个月定期聚会，无正式而固定的会长，实际领导人是王壮为、曾绍杰二位先生，重要事务由两人商议决定，而主要庶务工作委由王北岳负责周理与执行。1962年，海峽印集出版《海峽印集》第一集，编辑者王北岳、田牧野，汇编会员的作品成书；1963年12月，于台湾历史博物馆推出首次印展，展出集刻的刘改之《沁园春》印谱和会员的个人篆刻作品；1969

年出版《海峽印集》第二集，编辑者王北岳，并集资印行《玺印集林》古铜印谱；1973年举行第二次大规模篆刻展，展出第二次会员集刻辛弃疾《水龙吟》印谱，并征集时贤及会员等收藏的古印、佳石、印谱、印书、印具等一并展出，发行《海峽印集癸丑印展图目》。1975年，海峽印集以20多名成员为骨干，加上当时的青年印人，共计36人，正式向“政府”立案成立篆刻学会，海峽印集走入历史。

（三）1975年至今篆刻蓬勃发展时期

1975年11月在“政府”立案成立的篆刻学会，是有正式组织、系统、大规模的印学团体。1976年7月，篆刻学会发起人之一黄劲挺在王北岳鼓励与指导之下，发行《篆刻通讯》，设有每月课题和专题介绍，十三期之后中断；1977年10月，张心白接续出资编印了《印荟》，内容有“古玺及秦汉印介绍”“历代篆刻名作欣赏”“当代印人拓印”三部分，出版十期后于1980年6月停刊；1977年3月，篆刻学会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篆刻展，展出集刻《大有为》印谱、印石和会员作品50余件，尔后陆续举办展览，并巡回至各县市文化中心展出；1977年起出版社刊《篆刻》，主要内容为篆刻相关论文和会员作品集，原设定年刊发行，后来隔数年出版，2018年发行第十九期。

此期，印人组织的印学团体纷纷成立，较具规模的有1983年印证小集（1996年改名台湾印社）、忻古艺集，1987年玄修印社、大墩印社，1989年玄心印会，1990年希夷印社，1991年南瀛印集，1993年拓方印集、念慈草堂篆刻学会，1994年十方印会，1997年摆接印社，2008年印心雅集，2016年初心印会等，其中历史较久、活动力强与影响力较大的是台湾印社、忻古艺集、玄修印社和玄心印会。印社发行社刊及专辑印谱是最基本而重要的，台湾印社发行《印证小集》57集、《台湾印社社刊》19集、《台湾印社VS西泠印社粤港澳台社员作品展》专辑、《2013年两岸汉字艺术节——两岸名家篆刻展》专辑、《文三桥刀法论集刻》、《五柳先生传集刻》、《欢喜自得集刻》；忻古艺集发行《意古楼同门印集》4集、《诗词集刻》、《习镌集》、《忻古艺集》；玄修印社发行《玄修印社书法篆刻集》5集、《台北云南篆刻联展》专辑、《王北岳石玺斋师生中国印学博物馆展》专辑；玄心印会发行《玄心印会印集》12集、《第一届大专青年篆刻观摩赛得奖作品及篆刻文物展》特刊。

与海内外篆刻同道交流是印社另一重要业绩。如：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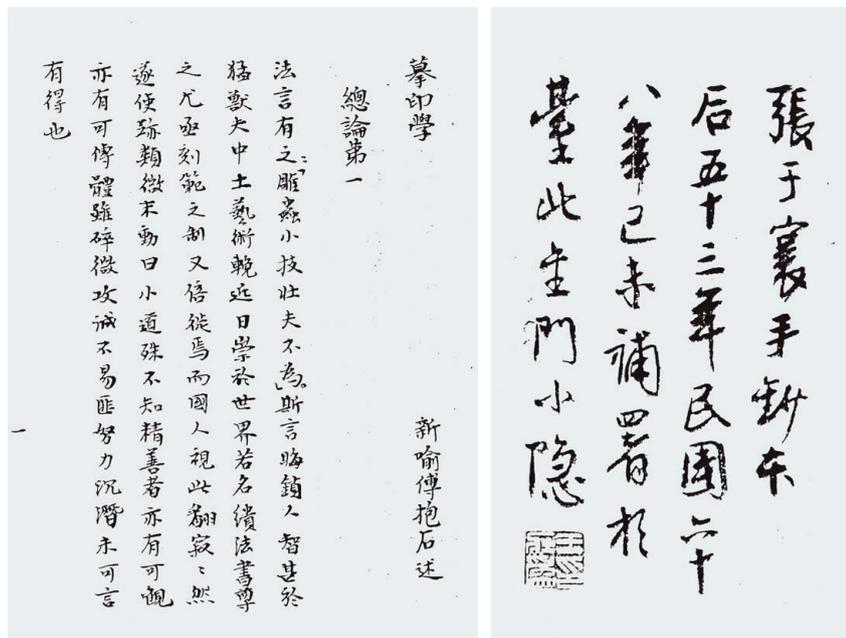
年7月、8月，王北岳领导玄修印社和玄心印会，与云南滇云印社交流互访，联展于昆明、台北，并拜访孤山西泠印社；2008年月，玄心印会参访韩国古岩篆刻艺术院及韩国《墨》杂志社，并与当地篆刻同道进行交流；2013年3月，台湾印社与西泠印社广东、香港、澳门社员交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共同举办“台湾印社VS西泠印社粤港澳台社员作品展”；2013年9月，台湾印社于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两岸汉字艺术节——两岸名家篆刻展”，两岸篆刻名家热络交流；2017年，台湾印社与终南印社互访交流，6月联展于西安交通博物馆，12月联展于台北国父纪念馆。

（四）西泠印社的启示与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西泠印社发展鼎盛之时，日后成为台湾印学发展主力的印人，正是孜孜钻研、意气朝发的青年。1980年以后成为台湾书坛硕望的张光宾，当年就读于杭州艺专，是亲炙傅抱石的年轻学子，经常拜访孤山西泠印社，至今手中仍珍藏着傅抱石著述《摹印学》1926年自手抄本（图3）。^[13]1929年，18岁的曾绍杰在南京、上海求学，游历杭州时，购得清光绪时石印的《匋斋藏印》印谱、刻印工具和吴昌硕、王福庵、唐醉石印谱，拜访过孤山西泠印社。高拜石于此期游历大江南北，遍交各地文艺耆老硕彦，也曾拜访过西泠印社。1949年，就读北京大学农学院的24岁学印青年王北岳，在杭州短暂工作了三个月，数度拜访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的创社与不凡事迹，早已成为有志印学的印人心中仰望的典范。西泠印社与台湾印学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因果关系，但是对1945年至今台湾印学发展，具有莫大的启示与影响。

西泠印社成立与发展成功的典范，启发篆刻同道结组印学社团蔚然成风，台湾1949年成立的台湾印学会、1961年成立的海峽印集、1975年成立的篆刻学会，皆是受西泠印社典范性的启发。特别是篆刻学会，王北岳与王壮为、曾绍杰、梁乃予就是倡议如西泠印社范例，正式向“政府”立案依法定组织成立的，活动方式也如西泠印社仿兰亭雅集的方式。此期台湾的印社雅集活动，其形态与内容，也多依循西泠，如携带珍藏古玺印、封泥、名家原石原刻、印谱、印书等观摩赏鉴，挥毫奏刀，集刻印谱，谈艺论道，举办展览，发行专刊等，亦成为定型化模式，如西泠印社的春秋雅集，彬彬秩序，觴咏流连。

王北岳先生于1976年发行的《篆刻通讯》序文中记曰：



◎ 图3 傅抱石著述《摹印学》、王壮为题跋 张光宾藏 1926年手抄本

曩见西泠印社有月课之法，约定印文，至社友聚会一一集拓，各取一分携归参考。于是，一印之出文同而态异，体别而多姿，诸家之法兼备，众人之貌各殊，既能博览，复可研磋，印艺求精，以斯为最。其后，东瀛人袭其法，且付之铅槧，流布愈广，受惠者亦众……予乃告以西泠月课之法，且云今之复印几与印刷相将，若能集同道若干人，或定月课，或各出所作，集而复印之，人各一篇，效西泠之法，而篆刻之事，亦将赖以不堕矣……效西泠月课之法，有题课，有自课，集印蜕、旁款，以复印方式发行《篆刻通讯》，作为同道研学篆刻、收良友切磋之效，后又施于《印林》杂志上，此为西泠印社影响台湾印学发展的实务之一。

由于西泠印社的典范，及创社前贤们在印学上的非凡成就，印社的印宗秦汉、继承传统，纳容皖浙各家、兼容并蓄的印学理念，影响此期台湾印学的发展，并奉为圭臬。启导 1945 年以来台湾印学发展的印学理念即是：印宗秦汉，以秦汉印古典美学为依归，先求得心领会，严守法度，厚实根底，再广撷兼资，师法明清浙、皖各派，及民初吴昌硕、王福庵、赵叔孺等各家，融会贯通，后出以自性悟修，创建个人风格面目。从海峽印集时期高拜石、曾绍杰、王北岳的印风（图 4），皆可窥见端倪。

五、结论

创立于 1904 年的西泠印社，社誉甚隆，赓续不绝，早为海内外印人誉为印学圣地，如今更以“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继往开来。其成立与发展的成功，启示并影响了台湾印学的发展，其“群策群力、团队合作”，坚持实践“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印社宗旨，“继承传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典范性特点，启导百年来台湾印学的发展，至今仍有标杆之效。

实践印社宗旨“保存金石”，除了保存珍贵文物的基本意义外，实为深耕“研究印学”的基础。印社成立之始，同人即无私的捐献珍藏名印、印谱及金石文物，如吴隐一人即捐出上百种几百册印谱，丁辅之捐出数十种，王福庵、叶为铭、吴东迈（吴昌硕之子）、张鲁庵、葛昌楹等，也都有大量捐献，都汇积为 1999 年成立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的珍贵典藏，该馆因而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印学文物、史料博物馆。此是台湾印学界应要学习的标杆之二。

西泠印社始终贯彻“研究印学”宗旨，且全心投入，继往开来，百年未歇，至今的高层次印学研讨、论文发表，欣欣不已，成果丰硕，领导国际印学益加昌盛。而台湾印学似有重技艺而轻研学、未能兼本固末之偏失。王北岳于 1995



高拜石印 高拜石



家在西南 常作东南别 曾绍杰



忘怀得失 王北岳



懒云龕主 高拜石



闽侯曾克尚鉢 曾绍杰



不知人间有我 王北岳

◎ 图4 《海峽印集》所录部分印拓

年《台湾篆刻研究报告》中有“篆刻理论阐发不足，而专业素养仍嫌薄弱”之警语。近年来，有较多研究生投入印学研究，以之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者，另有应用数字科技于公私电脑印学数据库的设立与推广。然而整体言之，印学研究的投入仍大有不足。是为今后努力学习的标杆之三。

西泠印社创始之初，即有高瞻远瞩、千秋印学、可大可久的气魄与胸怀，馥资辟地构筑，营建仰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剔藓亭、遁庵、味印亭，得潜泉、印泉，以及清幽雅致的庭园，不仅使得印社同人有了温馨的“家”，有了归属感与尽其挥洒的创作基地，亦成了汇聚印人同道、扩展千秋印学的根据地，成为国际印学圣地。台湾目前尚未有印社拥有自己的社址，何遑论印学博物馆或印学图书馆之设，甚至连倡议亦渺，是发展印学的隐忧。是为今后努力学习的标杆之四。

本文原载于《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

1957年版油印本，第1页。

- [2] 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 [3] 同[1]。
- [4] 同[2]，第114页。
- [5] 同[2]，第107页。
- [6] 西泠印社编辑：《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 [7] 同[2]，第62页。
- [8] 林熊光：《导入金石学到台湾的吕西村先生》，《书苑》第六卷第九号，日本三省堂1942年版，第14—19页。
- [9] 王北岳：《四十年来台湾地区美术发展研究之四—篆刻研究报告、展览汇编》，台湾美术馆1995年版，第23页。
- [10] 梁乃予：《日据时代在台日本印人》，《意古楼印课》，台湾印社2001年版，第567—582页。
- [11] 同[9]。
- [12] 同[9]，第25页。
- [13] 笔者曾亲自向张光宾先生借得其傅抱石著述《摹印学》手抄本。

【注释】

[1] 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编辑：《西泠印社志稿》卷三，

【作者简介】

简英智：西泠印社社员、台湾艺术大学博士，原玄修印社社长。

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述略

文 / 郭超英

西泠印社的对外文化交流，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就已开始，百年来成事纷繁，难以尽述，其中与日本书法篆刻界的交流最多，与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也相当频繁。百年大庆后，西泠印社代表团频频出访欧美国家，交流也日渐增多。现择其要者简述之。

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就有日本印人河井仙郎与长尾甲慕名前来加盟。河井仙郎对吴昌硕十分仰慕，1897年特奉函向吴昌硕请教印学，1900年他专程赴上海拜吴昌硕为师。1902年底至翌年2月，河井仙郎再次来华，其间大多逗留杭州，出示印作请吴昌硕指点，他与叶铭、王禔、丁仁、吴隐等共同切磋印学，亦获益颇多。1906年，在西泠印社成立的第三年，河井仙郎即来华入社。此后，他几乎年年来印社，与社人广结金石缘。1906年，河井仙郎撰写了首篇《西泠印社记》。1913年4月7日，西泠印社举行“兰亭纪念会”，他又作文《西泠印社修褉纪盛》，为印社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河井仙郎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西泠印社的另一位早期社员长尾甲于1903年来中国，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与吴昌硕结邻三载多。长尾甲在华十数年，常与吴昌硕数典谈诗为荣。1914年长尾甲回国后，仍与吴昌硕唱酬不断，引为知己。现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北面石壁上“印泉”二字隶书，即为长尾甲所题。

朝鲜王朝后期外戚大臣闵泳翊与吴昌硕交往十分密切。1895年朝鲜发生“乙未事变”，闵氏外戚集团被铲除后，闵泳翊便流亡上海，筑“千寻竹斋”以书画自娱。1914年，闵泳翊在沪去世，吴昌硕作诗《挽兰丐》（闵泳翊擅画兰，号“兰丐”），小序云曾为闵泳翊“奏刀三百余石”，由此可见吴昌硕为个人刻印最多的应是闵泳翊。韩国东方研书会1993年出版的《缶庐刻芸楣印集》收录了其中的241方。

吴昌硕的许多著名印章，如“芸楣”“园丁”“千寻竹斋”等，都是为闵泳翊刻的字号印。

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西泠印社有过几次零星的对外交流活动。1957年，日本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青山杉雨等来印社访问，这是1949年后西泠印社首次举行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次访问中，日本书法家还与印社社员举行了笔会交流。1973年，日本书道联盟常务理事、书道艺术院理事长香川峰云率日本书印代表团访问了西泠印社，团员有青山杉雨、饭岛春敬、金子鸥亭、村上三岛等日本一流的书法家。这是“文革”时期在印社举行的唯一一次外事活动，中日双方在题襟馆内举行了笔会，印社方面参加的有陆维钊、沙孟海、郭仲选等。这次交流使日本书法界了解到，历经“文革”，中国书法和西泠印社虽然很沉寂，但仍然存在，这为改革开放后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界交往的大发展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后，西泠印社第一次赴日访问交流是在1981年2月，由郭仲选、吕国璋等五人组成的杭州市文化代表团出访日本岐阜市，举办西泠印社藏“吴昌硕书画作品展”，并与日本书法界进行了交流。由于是西泠印社书画家和社藏吴昌硕精品第一次出国展览，所以在日本非常轰动。

此后，西泠印社对外交流日益增多，且代表团的出访多与办展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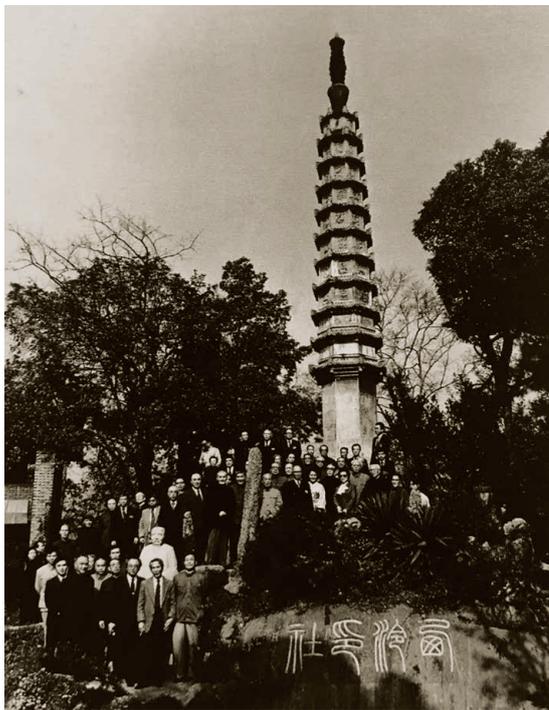
1988年，西泠印社在日本东京、大阪、岐阜举办了“西泠印社展”。中国文化部、浙江省文化厅、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以及青山杉雨先生对本次展览都很重视，青山杉雨亲自来西泠印社对展品做最后审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双方终于拟定了展览计划。1988年2月26日至3月2日，规模盛大的“西泠印社展”首先在东京开展，3

月 24 日至 4 月 3 日在中部的岐阜续展，4 月 7 日至 12 日在关西的大阪闭幕。该展由日本读卖新闻社与西泠印社共同主办，西泠印社分别派代表团参加了当地的艺术交流。该展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是西泠印社出国展览中品级最高、内容最丰富、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一次。展出前，日方还编辑出版了精美的大型《西泠印社展》图册。

1994 年，西泠印社在新加坡与新加坡海啸篆刻书画会联合举办了“中国西泠印社社员精品展”；1996 年，在香港举办了“西泠印社印谱印屏展”；2002 年，在澳门举办了庆回归“西泠印社百印展”。

国外艺术家及团体来西泠印社办展也日益频繁，如 1986 年西泠印社举办了“日中友好福井书法作品展”。1987 年 8 月 15 日，西泠印社在杭州举办了日中书法交流史学术研讨会，沙孟海社长在欢迎辞中回顾了中日书法交流史，钱君匋、刘江、陈振濂和梅舒适、杉村邦彦、鱼住和晃分别代表中日双方作了学术报告。11 月，“日本篆刻家作品联展”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展出，展览规模较大、规格较高，日本著名篆刻家都有作品参展，沙孟海社长及有关负责人和以小林斗龠为首的日本篆刻家联盟的 40 多位篆刻家出席了开幕式。1993 年，西泠印社建社 90 周年纪念大会期间，举行了“国际书画篆刻邀请展”“中韩书画联展”“新加坡书画篆刻展”。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艺术家时隔 59 年两次为吴昌硕塑造铜像的事迹，为西泠印社与日本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佳话。1921 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仰慕吴昌硕先生，特为吴昌硕塑造了铜质半身像二尊，一尊存日本，另一尊运往中国。吴昌硕即将此铜像转赠给王昶、丁仁诸同人置西泠印社安放，印社遂于闲泉的峭壁上筑龕藏像，取名“缶龕”。1979 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来西泠印社访问，得知缶龕中的吴昌硕铜像在“文革”中被毁，十分惋惜。回国后，他即组成“吴昌硕先生胸像复原委员会”，其时朝仓文夫早已去世，便请其弟子参照原像风貌再铸一尊。1980 年 11 月，小林与三次率领包括青山杉雨、村上三岛、小林斗龠、梅舒适等 50 多名团员的“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来西泠印社，中日双方在吴昌硕纪念室举行了隆重的铜像安放仪式，西泠印社老一辈艺术家沙孟海、诸乐三、陆维钊、方介堪、谢稚柳、方去疾等都参加了安放仪式。随后，大家又去超山拜谒了吴昌硕墓。这前后两次塑像，



◎ 1980 年，吴昌硕胸像赠呈仪式结束后，中日两国嘉宾在西泠印社华严经塔下合影留念

充分显示了日本艺术家对吴昌硕先生和西泠印社的友好情谊，他们与西泠印社老一辈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金石交，翰墨缘”，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西泠印社中人。

1899 年 11 月，日本冈村天溪会为纪念该会创始人日下部鸣鹤与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结友百年，向印社赠送了“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1891 年，日下部鸣鹤来中国江浙一带游学结识了吴昌硕，他是日本最早吸收中国碑学书法而开创“鸣鹤流”的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钱君匋、郭仲选、刘江，冈村天溪会主事南鹤溪女士等出席了赠碑仪式。1991 年 4 月 13 日，该碑由吴昌硕纪念室内迁移至室外观乐楼前，中日双方举行了奠基和移碑仪式。8 月 24 日，127 位远道而来的日本天溪会会员和西泠印社社员在观乐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从此，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又增添了一处中日友谊的象征。2007 年 9 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和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 116 周年，西泠印社与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天溪会共同主办了“西泠印社·日本天溪会书法交流展”，天溪会 112 人友好访华团随同来访。



◎ 1987年，日本篆刻家作品联展在西泠印社柏堂举行

从1996年起，由西泠印社日本名誉社员师村妙石等发起的纪念吴昌硕诞辰活动，于每年9月12日在日本北九州市若松区的吴昌硕塑像前举行，北九州市每年都会邀请部分西泠印社社员参加纪念仪式，该活动至今已进行了22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泠印社举办的国际印学研讨会上，有许多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的学者积极与会或递交论文。有多位日本、韩国的书法篆刻才俊荣获西泠印社举办的篆刻评展和国际篆刻书法大展的各类奖项。许多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法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篆刻书画家成为西泠印社社员。1981年夏，由沙孟海社长签署的两份西泠印社入社聘书寄往日本，印社决定吸收小林斗龠、梅舒适为名誉社员，这是改革开放后西泠印社首次吸收外籍社员。此举在日本书法篆刻界引起了“西泠印社热”。以后，西泠印社又吸收了今井凌雪等一批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人社。1989年8月，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篆刻学会会长金鹰显等韩国书画家来西泠印社访问，受到副社长郭仲选、刘江的热情接待。韩国客人还专程拜访了沙孟海社长。这是韩国书画篆刻家首次访问西泠印社。1991年，金鹰显加入了西泠印社。1988年，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小林斗龠、梅舒适被聘为名誉理事；1993年1月，青山杉雨被聘为西泠印社顾问；1998年西泠印社建社95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次社员大会上，金鹰显被聘为名誉理事。2003年11月在西泠印社百年大庆暨第十一

次社员大会上，小林斗龠、梅舒适、金鹰显被聘为名誉副社长。2004年底入社的法国汉学家、篆刻家龙乐恒是西泠印社目前唯一的非亚裔社员。

百年大庆后，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更加频繁。

2005年8月，由陈振濂、包正彦、余正组成的代表团赴日访问。这是西泠印社于1993年后派出的首个访日文化交流团。12月，西泠印社携3件国家二级文物藏品和百件文房拓片赴台湾举办“金石之韵展”，这是西泠印社首次赴台办展。2006年7月，西泠印社赴马来西亚举办社员作品展和专题讲座，这是西泠印社首次在马来西亚办展。同年8月，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秘书长包正彦带队出访美国、加拿大，对境外艺术机构进行了考察，并与有关团体达成了赴美办展的意向。2007年9月7日至11月18日，为纪念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80周年，应澳门艺术博物馆邀请，西泠印社与浙江省博物馆赴澳门联合举办“与古为徒——吴昌硕逝世80周年书画篆刻特展”，60余件馆藏吴昌硕书画印及文房用具参展，并由专人对参展藏品题跋文字进行了标点释文。2008年6月，由包正彦带队，西泠印社组团赴美国洛杉矶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洛杉矶特展，这是西泠印社首次赴美展出。展览展出了西泠印社社员创作的书、画、印精品100件，以及2007年西泠印社“人文奥运”百印创作活动中创作的120方印章原印，受到当地市民和华人华侨、艺术界人士的欢迎。之后西泠

印社连续以“百年西泠·中国印”为名举办了2009年法国巴黎特展、2010年意大利罗马特展、2011年西班牙马德里特展、2012年土耳其安卡拉特展、2013年荷兰海牙特展。

2009年12月1日，“百年西泠·中国印”巴黎特展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这是西泠印社首次在欧洲办展，更是“中国篆刻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西泠印社首次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2010年9月16日至10月1日，作为中意建交40周年暨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先声，由西泠印社与意大利文化部、意大利国家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百年西泠·中国印”罗马特展举行。这是西泠印社首次由外国官方机构邀请并在国家级博物馆举办的境外展，一方面说明经过近几年来连续赴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举行特展，尤其是“中国篆刻艺术”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篆刻艺术已逐步为欧美国家所认识和喜爱，突破了以往影响仅及汉文化圈的局限；另一方面，“百年西泠·中国印”罗马特展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年”系列庆祝活动先期营造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为意大利各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标志着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突破。此次展品包括作为上海世博会国礼、由西泠印社社员创作的以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名为内容的百方《万国印谱》印章原印，百余幅西泠印社社员书画精品，20块图文并茂介绍中国篆刻艺术、西泠印社和杭州历史文化的图板。每件展品均配有意大利文说明，有助于观众更准确地理解书画作品的内容和意境，意大利观众从中领略了杭州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文化形象。2011年“百年西泠·中国印”马德里特展向爱好中国艺术的西班牙朋友展示了中国印章的独特魅力，其中100方篆刻原印是西泠印社社员以奥运体育项目结合中国古典诗词为内容精心创作的，还展出社员的书画作品近百件。2012年9月20日至10月19日，作为土耳其“中国文化年”项目的“百年西泠·中国印”安卡拉特展，是特展首次被纳入中国文化部海外交流重点项目“中国文化年”系列活动，并由国家驻外使馆担任主办单位的活动。在举办安卡拉特展前后，西泠印社代表团还远赴南非、瑞典、芬兰访问，参观考察当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院校。在瑞典时，代表团拜会了国际汉学名家马悦然、史美德、劳悟达等。在2013年荷兰海

牙特展举行前后，代表团还赴希腊、印度考察访问。

2016年5月，西泠印社赴日本东京、大阪举办“西泠印社·中国金石篆刻艺术海外推广”活动，包括“西泠印社社长（现任）作品展”“西泠印社知名社员（部分）篆刻书法作品联展”“西泠印社社员海外雅集”“西泠印社名家海外演讲会”“李刚田书法篆刻展”等，创下了西泠印社海外参展艺术家人数、作品数量、活动时长多个之“最”。同年11月，“百年西泠·中国印”斯里兰卡科伦坡特展举行。2017年11月，“百年西泠·中国印”澳大利亚悉尼特展举行。2018年6月，西泠印社参加了“法国·浙江文化年”活动，巴黎“西泠学堂”开讲；同年9月，“百年西泠·中国印”匈牙利布达佩斯特展举行。

中国印学博物馆承担了许多西泠印社对外交流项目，如2007年“日本瑶蓝印社中国展”，2008年“杭州生活品质国际交流日活动”等，与日本、韩国联合举办年度展“中日锦带桥书法交流展”“韩中日国际篆刻交流展”等。2008年10月，中国印学博物馆受邀组团赴日本松江参加为纪念日本松江开府400周年暨杭州与松江缔结友好城市五周年而举行的“中日友好书画交流展”。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文物处利用文物库藏，举办特色鲜明的主题展。如2015年9月在澳门举办“吴赵风流”展；2017年4月在香港举行“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展”，西泠印社文物首次赴港展出，香港“西泠学堂”同时揭牌。同年5月，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西泠创社四君子书画篆刻作品展暨‘古韵今声’西泠印社藏历代印章原拓题跋扇面展”在日本兵库县美术馆隆重开幕，400多位嘉宾出席开幕式，日本篆刻界名家悉数到场。本次展览由西泠印社、日本篆刻家协会、丁鹤庐研究会主办，中国驻日大使馆等后援支持，共计展出“创社四英”书画篆刻作品社藏89件、日本各方珍藏百余件，全面呈现“创社四英”的艺术成就与影响。扇面展则集社藏古玺印与社员名家题跋于一体，在致敬先贤的同时，呈现了西泠印社中人对传统文人素养的尊崇与传承。

【作者简介】

郭超英：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艺评委副主任。

2003—2018年 百年大庆后的西泠印社

2003年，西泠印社在百年华诞期间召开的第十一次社员大会上，确立了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宏伟发展目标，提出了搭建平台、吸纳人才、繁荣活动、扩大交流、编印刊物、丰富典藏、扶植新人、拓展领域、建立网络、完善保障这十项具体措施，强调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扩大参与基础，强化精品意识”，做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共同协调发展；产业主体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转变经营管理运作模式，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两级试点的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2014年，中共杭州市委对西泠印社管理体制再次做出重大调整，实施“事企分离”改革，确立了“一个领导核心（中共西泠印社党委）统筹协调管理社团（西泠印社）、事业（社务委员会）、企业（集团公司）三大主体”的“1+3”模式，西泠印社社团及行政、事业、产业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完善组织建设、创新运作模式、整合社会资源、扩大专业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实现了西泠印社社团建设、事业发展和品牌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首先，完善组织建设，社团管理更趋规范化。积极建章立制，推进社务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运作流程化、服务规范化。加强品牌保护，针对新一轮体制调整后社团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在杭州市政协、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内理顺关系，对外提升保护力度，以“统一领导，整体规划；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分类管理，保值增值”为基本原则，拟定品牌管理规定和办法，为实现社团、事业、产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提升社员服务，开辟“社员之家”、设立“社员固定活动日”，定期组织社内外同好，在孤山社址、

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小型展览、鉴赏、讲座、交流活动，提升社员参与社务的活跃度。加强文物保护，不断充实文物收藏，为社团、社员提供文物文献研究和服务。做好抢救性艺术纪录片制作，按时、有序开展社员信息普查工作，确保社员联络与服务的有效性。

其次，创新运作机制，专业活动形成品牌化。将弘扬传统文化与“篆刻”非遗保护相结合，创新活动理念，吸引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精英，集中打造了一批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品牌项目。如从2007年起连续以“百年西泠”为主题，举办大型国际性艺术展赛及相关配套专业活动，每年均吸引海内外作者数千名参与，投稿量近万份，成为国际篆刻界首屈一指的艺术展赛权威品牌。篆刻选拔程序和评审机制开风气之先，为完善篆刻艺术人才选拔培养的长效机制积累了经验。三年一届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迄今已举办五届，集聚了印学及相关学科领域重量级专家、交流学术前沿议题，在当前国际印学界发挥了建立学术规范、总结最新成果、引领学术导向的重要作用。拓展印学格局，举办域外印章、图纹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等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国际印学研究深入开展。“百年西泠·中国印”海外特展已持续十站，规模影响不断扩大，为多元传播中华文化开辟新格局。这些文化活动品牌涵盖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领域，构成了西泠印社社团活动的品牌体系。

再次，集聚多方资源，艺术活动运作多元化。根据社团、事业、企业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特点，积极探索艺术活动多元合作的规律。在社团活动方面，对内于2003年底起先后组建七大研究室，整合社团艺术和学术资源，搭建社

团活动的专业平台；对外以社员为桥梁，有效整合各地文联、书法家协会、印社等多方力量，建立互助合作的活动模式，提升社团活动的整体规模和国际影响。在学术研究方面，尝试汇聚社内外多方研究力量，开展学术研究项目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将西泠印社学术研究推上新台阶。在多元业态建设方面，充分运用西泠印社的文化影响力，激发各级经营实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组织开展多元艺术品经营和文化活动，形成了以西泠印社为主体的“政府主导、主体自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2015年起，还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赴日本、法国举办展览、雅集、演讲、交流；2017年，在香港设立“西泠学堂”，开展篆刻书法公益培训；2018年，“西泠学堂”又在法国巴黎开讲，为增进文化沟通与理解、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扩大参与平台，社团活动打造新模式。在活动载体上积极寻求突破，搭建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平台，扩大印社社会吸引力和公众参与面。以研究室为载体，组织开展相应领域的专业艺术鉴赏会、创作笔会、采风交流、艺术展览；发挥印学博物馆的宣传、教育窗口功能，开展专题展览、艺术讲座、青少年创作体验等普及性活动；书画篆刻院举办名家工作室和专题培训班，为印社人才梯队的形成和“篆刻”非遗传承保护做出积极贡献；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创业基地合作开展专业教学，取得良好成效；社刊《西泠艺丛》于2014年获批正式刊号，由季刊改版为月刊，打造篆刻书画研究创作、切磋交流的平台。近年起还与在杭新闻媒体合作开设专栏；与香港集古斋、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华文化院等合作举办大型专题展；与浙江省广电集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合作实施大型纪录片《西泠印社》拍摄工程；与各界合作举办书法、篆刻展赛，有力地扩大了社会影响。

第五，提升经营管理，产业发展拓开新局面。积极探索艺术和经济联动发展的机制，一方面，事业发展着力打造社团文化品牌价值和高端形象，推动文化产业多元发展；另一方面，经营活力力求体现社团学术底蕴和专业价值，推进专业成果的社会转化。西泠印社集团按照市管一级国有企业进行升格管理后，企业治理、产业拓展、品牌建设、经济运营取得新进展。“西泠拍卖”自成立以来，连续多

年全国领先，稳占江南艺术品拍卖业鳌头。西泠印社出版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稳步提升，《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圆满收官，书法教材获教育部指定，《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鉴定评估中心获准成为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机构；产业公司、艺术公司配合社团年度主题，策划组织艺术活动；西泠印社美术馆围绕社员需求，举办多场专业展览和赏鉴、讲座。产业经济总量、企业管理结构、经营主体布局、行业竞争力跃上新台阶。

经过十余年的积极探索和实践，西泠印社在艺术活动品牌化、组织主体多元化、参与平台网络化、成果影响效益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符合西泠印社整体发展的艺术活动评价模式、组织主体多元合作模式、多层次群体参与模式、文化效益联动转化模式，使西泠印社整体呈现多元、立体化发展，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快速深刻的变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提升了西泠印社的专业首位度，也使西泠印社真正实现了良性、协调、可持续发展。

西泠印社从诞生于西子湖畔、孤山西麓的这一方清雅胜地，到今天海内瞩目的盛世繁华景象，光阴已经悠然流逝了115年。115年来，西泠印社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始终是标领海内外印坛的学术重镇。时值西泠印社建社115年华诞，新的发展蓝图正在徐徐展开。印社同人将进一步回顾社团建设成果，总结经验、分析不足，继承和发扬“西泠印社中人”的优良传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潜心艺事、修身立行，为西泠印社的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历任社长对西泠印社现代转型的贡献

文 / 史长虹

【摘要】

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泠印社，其社长的产生本无一定之规。但纵观西泠印社百余年发展历程，其历任社长又具有一定的专业、名望、文化形象的倾向性，从而形成了独具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有着诸多偶然性，但其中蕴含着西泠印社的内在自我定位和文化取向，历任社长们也对印社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西泠印社 社长推选 文化现象 现代转型

享有“天下第一名社”美誉的著名学术团体——西泠印社，之所以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是诸多因素使然，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就是历任社长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百余年中，印社的社长和印社的发展之间始终相辅相成，形成了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在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对于社长候选人的推选和确定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最初诞生于民间的艺术团体也因此逐步实现了光辉灿烂的现代转型。

西泠印社的社长推选

社长推选，是指西泠印社社长经由同人推举产生。其中关于西泠印社社长推选的标准，客观是循序渐进、逐步形成的。一个从民间自发的团体，是没有也不可能在一开

始即确定自己的“社长推选标准”的。筚路蓝缕的创始人纯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的初衷只是比较单一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绝对不可能想到印社发展到今天的宏大规模，更不可能事先设定社长的形象定位，这一点从吴昌硕逝世的1927年到1947年之间一直没有明确的社长即可见端倪。

令人钦佩的是，创社“四君子”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这就是推举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先生为首任社长，此公不仅在篆刻界享有盛名，在书画方面也自成一家、造诣非凡，而且诗学成就也不可小觑，《缶庐诗集》质、量俱佳。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人格魅力很强，能够直接吸引长尾甲和河井荃庐两位日本友人入社。可以说，西泠印社从成立之初就拥有先天优势，形成了相对开阔的艺术格局。毕竟，一个民间团体中有外

籍社员的参与，这在 20 世纪之初绝对是罕见的。

马衡先生的上任大致是在西泠印社补行 40 周年社庆前后。与他的前任相比，马衡虽然并非擅长篆刻，但由于他特殊的地位——曾任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以及与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非凡交情，使得他获得了社长提名并获得最后通过，成为《西泠印社志稿》中所载继首任社长之后的印社领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研究者认为在吴昌硕与马衡之间还有别的社长^[1]或者类似社长的人^[2]起过作用。

之后，继任者依次是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以及刚刚过世的饶宗颐先生。他们担任社长，皆有政府参与而非纯粹的印社同人自行推举。因为 1949 年后，印社已经从一个民间同人团体成为归属于人民政府管理的团体，人民政府对印社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援助，使得原本作为民间团体的西泠印社得以汲取更为丰富的给养。

纵观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不难发现，从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开始，直到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无一不是艺术巨匠或者学界泰斗或二者兼而有之。概括诸位社长的过人之处，则可以大致形成西泠印社推选社长的基本取向：艺术巨匠、学界泰斗、社会名流。

应该说，这个现象是随着西泠印社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是没有人预定而且也没有人能够加以左右的。准确地说，是西泠印社四个创始人的远见卓识以及后来人民政府的高屋建瓴之合力使然——创始人推举了具有综合能力（诗书画印“四绝”以及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吴昌硕，既为西泠印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在无形之中为印社后来的社长人选做出了某种规定性。马衡任社长也与他身居高位密切相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身份还是颇为引人注目的。1949 年以后，西泠印社的社长人选则综合考虑了印社的已有影响以及巨大潜能，对人选的综合条件予以更多的关注和考量。

假如用这样的三个基本标准来检验目前公认的西泠印社历任社长，则：

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师、社会名流；

曾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是当之无愧的学界泰斗，又是收藏家；

张宗祥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

曾经主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整理工作；

沙孟海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博物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终身教授；

赵朴初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会长，又是著名书法家，是典型的社会名流；

启功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又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饶宗颐是当代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学界泰斗，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法国远东学院院士等职。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汉学儒莲奖”、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华人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衔、法国文化部颁授高等艺术文化勋章、国家文物局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别贡献奖等多种奖项。

以上各任社长，都是全国乃至海内外艺坛、学界的知名人物。而且，从马衡开始，后面几任社长的知识构成已经有了质的转变——从“印学”本身的专门造詣与时俱进为更加综合的文化艺术修养。

西泠印社的现代转型与社长们的功绩

西泠印社的现代转型，是指印社从封建体制下吟风弄月的民间社团（其特征是：活动方式随意性较大、人员局限于同道好友、人员所在地域相对集中）最终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组织严密的学术社团（其特征是：拥有现代的组织意识和活动方式、人员职业多样化、来源更加多元、覆盖面较大）。

西泠印社的现代转型包括诸多方面，而且这些转型的最终实现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本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探讨上述历任社长在这些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印社健康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此视角观照印社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一个民间专业社团转向社会各界寻求广泛支持

西泠印社之所以在国内外拥有非凡的影响力，除却创始人的满腔豪情和卓越的事务处理能力之外，还因为其广

泛借助了社会的力量来寻求不断发展壮大的机会。来自社会的力量无论是主动捐赠还是在印社的请求下伸出援助之手，客观上都对印社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印社初期，创始人以及早期社员就曾向杭州府、钱塘县呈文请求帮助，为印社的成立以及拥有自己的固定活动场所取得了合法权益。

同人募赙《汉三老碑》时，是吴昌硕、丁辅之等联合同道四处呼吁奔走，发起书画义卖；其后，印社又发出《辛酉收回汉三老碑并建石室募捐公启》，吸引了社会名流的巨资捐赠，时任浙江总督卢永祥、浙江省警察厅厅长夏超以及吴兴巨富张钧衡均名列其中，卢、张各捐银 2000 元，为捐款名单中数目最大者。

开龙泓洞时，有关部门以“民间不得使用炸药”为借口，不准施工。是丁辅之、王福庵等致书孙中山的秘书底奇峰（亦为西泠印社社员），一纸示文，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印社 30 周年到来前夕，印社又发出《癸亥修理杭州题襟馆募捐启》。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9 年后，张宗祥以浙江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浙江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赵朴初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的身份，为西泠印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张宗祥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西泠印社在很长一段时间未有活动，后来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向人民政府建议，要让这个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社团重新恢复活动。1955 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浙江省人大代表的张宗祥率先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西泠印社应该开展有组织的公开活动，团结广大印人，弘扬篆刻艺术。次年，他又在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迅即指派专人负责，并于 1957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2 时在龙兴路（现延安路）6 号张宗祥住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推举张宗祥为主任委员，陈伯衡、潘天寿为副主任委员，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韩登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韩登安兼秘书长并负责筹备营业部。1962 年，西泠印社召开了 1949 年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推荐产生 60 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选举张宗祥为主任委员。1963 年中秋节，西泠印社建社 60 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华侨饭店召开，38 位来自杭州、

温州以及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的新老社员济济一堂。至此，西泠印社终于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活动。在这次会议上，张宗祥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据说，张宗祥还曾提议扩社，把文澜阁划进来，推倒界墙，连成一片，以青白山居作为印社的南正大门（其他圆洞门改为边门），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实施。^[3]虽然扩社建议未能施行，但也反映了这位社长曾经的努力，反映了他对于印社成长壮大所寄托的远大抱负和满腔豪情。

（2）赵朴初的贡献

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诞生之所以比较顺利，正是因为赵朴初社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审批手续，到第一笔筹建款项到位，都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逐步落实的。审批手续之经过，已为刘江先生所言^[4]，至于筹款之事项，有当时一则新闻报道为证：

目前，从西泠印社副社长、杭州市文化局局长胡效琦先生处获悉，呼声甚高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第一笔筹建款项，在西泠印社社长赵朴初先生关心和支持下，已由国家计委下拨西泠印社。目前，西泠印社正在抓紧印学博物馆馆址设计前期工作。^[5]

从建社之初的官府呈文，到后来诸位社长如吴昌硕、张宗祥、赵朴初等面向社会的努力，逐渐使西泠印社由凭借自身的绵薄之力苦心经营，到置身于广阔的社会舞台并获得来自各行各业的倾情帮助，为西泠印社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促成了其今天所拥有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格局。

（二）从一个普通篆刻团体升华为学术研究阵营

从首任社长吴昌硕开始，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皆为赫赫有名的学界名流或社会贤达。这样一个社长群体以各自的理论和实践，身体力行地在西泠印社学术氛围的营造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吴昌硕对于西泠印社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王伯敏《艺进乎道者贵——首任社长吴昌硕其艺其影响》一文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

缶翁，这位首任西泠印社的社长，给予印社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影响，不仅在书画篆刻上，还在于做人、做学问上。……潘天寿谈到缶翁时说：“昌硕先生见到晚辈，首先问你的，不是近来画什么、刻什么，而是问你读什么书。”^[6]

对于马衡和张宗祥两位的学术功力和学术影响，林乾良曾有专文予以介绍：

马衡在书画篆刻方面的造就不及吴昌硕，若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则固不多让也。所以，当时由他继任社长也是有道理的。……郭沫若的《凡将斋金石丛稿序》中，对马氏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特别对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历尽艰辛将石鼓等国宝妥运西南地区一事，推崇备至。^[7]

此外，选张宗祥当西泠印社社长也不是毫不搭界的事。一来，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见《西泠印社成立启》）。张宗祥对金石碑版之学颇有研究，兼及古器物如古玉与陶瓷等。在张氏的著作中，即有《玉杂说》《说玉》《说瓷》等。再者，西泠印社社员的特点，大约都兼是书画家。在这一点上，张氏可是大大有名。^[8]

对于沙孟海提倡学术研究的学风，与之相识三十年之久的吕国璋这样说道：

我深深领会到沙先生有一套完整的治社指导思想，其中心就是一定要搞好学术研究。他每一次与我研究工作，以及在每次理事会和社员大会上，都一再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要我们在搞好印社各项工作的同时，花大力搞好学术研究工作。^[9]

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逢社庆大典，即开始举办专门的国际印学研讨会，以提交论文为准，并不限于印社社员。“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西泠印社扩大组织规模、吸引人才加盟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渠道了。”^[10]

1999年9月，中国印学博物馆在西泠印社正式建成揭幕，这可视为“研究印学”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总部”。从早期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宗旨以来，历经数年，西泠印社印学研究的地位逐步上升，至此终于形成了喜人的规模。

上行下效、前仆后继，西泠印社有这样一些影响非凡、功力深厚、又积极提倡学术研究的社长们为先导，后来的社员已经不再满足于光是玩玩篆刻刀，不仅仅局限于只是编出几部印谱和文字学的工具书，而是以社长们为表率，奋起直追，涌现出一批批篆刻理论和艺术实践双丰收的新生力量。在西泠印社学术含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学术品位也逐步提升，从四个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自发组建的民

间社团，提升为具有多项才能、综合学养的高品位学术社团。

（三）从“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到“兼及书画”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是西泠印社在1913年成立大会上制订的社团宗旨^[11]，多年以来一直是指导整个社团活动的核心思想；“兼及书画”则是后来出于印社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原来的八字方针基础之上递增的。这一宗旨的调整吸引了大批声名显赫的书画家们踊跃加入，为这个学术阵营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为印社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提出“兼及书画”的具体人员和具体时间现在有着不同的说法^[12]，但是这一提法后来确实在印社得以实行（其实，书画在西泠印社所占的专业比重一直比较大，从建社伊始即已如此，早期的印社社员几乎都是擅长书画的能手。不过当时的书画比重没有在宗旨中强调，这是为了突出“金石”和“印学”的重要性）。60周年纪念会召开前后，印社由于顺利恢复和快速壮大之需，“兼及书画”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主要是为了吸收书画家入社，更好地开展工作，壮大印社声势。尽管如此，“书画”只是被“兼及”，而没有成为印社的主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提法在具体实施中所体现出来的战略性和灵活性（包括金石和印学在印社所占比重以及书画和印学所占比重），与沙孟海对于印社的准确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在《〈西泠艺丛〉编辑同人的谈话》^[13]中明确指出：

西泠印社创办时有“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样八个字的宗旨。在旧社会，金石文物国家不管，现在不同了，各级都有文管会、博物馆，国家特别重视文物保护，因此今天西泠印社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印学。印学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问，社会上搞不热闹，所以用书画来配合，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印社”，书画应该围绕印学来搞。

《西泠艺丛》是西泠印社主办的学术刊物，要把印社的宗旨作为刊物的特色，也就是说，题材不妨金石书画全面铺开，但要坚持以研究印学为主，不要喧宾夺主，混同于其他书画刊物。

这就是说，对于西泠印社这个印学社团来说，印学一直是最主要的，这个根基不能轻易动摇——这体现了战略性；而为了印社的发展壮大和开展活动的便利，可以用书画的形式来进行配合——这又体现了灵活性。但是“兼及”

一定不能取代主体，就像绿叶始终不能取代红花一样。

（四）从“中国一流”到“世界影响”

2011年12月，刚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证书的饶宗颐先生对这个百年社团的未来定位就是“世界性”。他说：“西泠近几任的社长，都不是刻印的。虽然叫印社，但应该有世界性的视野，扩大影响。”希望西泠印社不仅限于刻印，也应该不断提升学术层面，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时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说：“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给我们的方向。”“饶宗颐先生是我们的旗帜，我们当时请他来，是希望告诉社会各界，西泠印社定位传统文化的标杆、高度在哪里。他不仅要有学术水平，还要有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其实，西泠印社从首任社长吴昌硕开始，就有世界眼光了，创社之初吸纳两名日本社员即是鲜明例证，之后的百余年间陆续吸收了数十位外籍社员也是鲜明例证。但是，饶宗颐说此话的背景是21世纪的强大中国，着眼点是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这和党中央振兴文化的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可以说，吴昌硕接纳外籍社员还是风雨飘摇的民国伊始、作为民间社团的兼容并包心理，历任社长们吸纳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生力量则是一种稳中求进、继往开来的内涵建设和量变过程，那么饶宗颐强调世界视野和影响，则是对已在繁荣富强、蒸蒸日上的泱泱大国中长期领跑印学研创的百年社团塑造国际文化形象的顶层设计。

2006年，“金石篆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泠印社被确认为中国篆刻的综合保护、传承、交流和研究中心。2009年，以西泠印社为代表传承组织的“中国篆刻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杭州首个进入世遗《名录》的项目，也是西泠印社继国家级社团、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称号，标志着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中心的地位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权威认可。

2010年起，西泠印社先后成立西泠印社社友会和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为篆刻艺术传承和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有力夯实了“非遗”人才基础。与此同时，印社还通过组织举办系列专业活动、深入开展各类学术研究、深入拓展

对外交流、整理保存社藏文物等实实在在的行动，积极普及篆刻艺术，不断提升“非遗”保护深度，有力扩大了“非遗”国际影响，充实了“非遗”的史料基础。

饶宗颐接任西泠印社社长的第二年（2012年），历史悠久、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下属的铭文与美文学院，选举他为该学院外籍院士。这个荣誉是法兰西学院海外院士中的最高级别，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他是亚洲第一个获颁该荣衔的汉学家。同年，由饶宗颐主编、徐在国任副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及其书法集《饶宗颐书道创作汇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等2012年12月版）正式发布。接任西泠印社社长的第七年（2017年），饶宗颐以期颐之年重返法国，在巴黎举办“莲蓬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展”。

饶社长以身作则，开启了一个西泠印社对外踊跃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全盛时期。从2012年以来，印社妙招频频，形成轰动效应。仅2016年就有两项重要活动：首先是5月，“西泠印社——中国金石篆刻艺术海外推广活动”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召开，旨在进一步推进西泠印社“走出去”，在世界范围特别是汉文化圈推广中国金石篆刻艺术，展示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中心、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主要传承组织的艺术创作水平与成果，并为印社优秀的中青年社员搭建海外推广平台，为西泠印社继续打响“天下第一名社”名号做出积极贡献。其次是6月至8月，为迎接G20峰会在中国杭州隆重召开，让各国宾客领略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韵味，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远魅力，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西泠印社、浙江省能源集团共同主办的“喜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北京、杭州相继进行。系列活动契合峰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主题，突出“艺术无国界”的意识。两大展览汇集当代书法、绘画、篆刻界的一流名家和文化名流精品佳作，还包括西泠印社先贤和中国历代文人手札文牘的珍品，形式更新颖，内容更丰富。展出作品创作年代超过百年的时间跨度，用跨越时空的艺术篇章呈现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以高水准、高规格的文化盛宴来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据统计，系列活

动集中了社员创作的作品 452 件，是近年来印社活动最密集、社员响应最积极、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这些活动，恰如其分地实现了饶宗颐对百年印社的殷切期望。

结语

西泠印社的社长推选虽无定规，但体现了印社的自我定位与文化取向，所推举出来的历任社长对于西泠印社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虽然上文论述的四方面现代转型只是印社现代转型的部分闪光点，其中所体现出的也只是历任社长们巨大贡献的吉光片羽，但是从中已经大致可以看出，这个卓越的“社长群”为西泠印社所带来的是一份又一份如何丰厚的“财富”，是一圈又一圈多么耀眼的光环。同时，我们也由衷地相信，拥有悠久历史而且坚持开拓创新的西泠印社，定然也曾带给这些社长们以成功的喜悦。值此 115 年社庆的大喜时刻，衷心祝愿潜力无穷的西泠印社能够开创更新、更好的格局！

【注释】

- [1] 关于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的确凿人选，至今尚未有统一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马衡，相关文献记载有二：秦康祥所编《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沙孟海所作《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记》。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哈少甫，相关文献记载有三：1947 年《中国美术年鉴》，《方介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第 42 页，阮性三、韩登安合写《西泠印社》一文。但是，鉴于有关哈少甫的资料奇缺，不仅《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没有其小传，甚至在《中国美术家辞典》这样收录相对全面、资料相对翔实的工具书中连其卒年都未详，这样的背景显然难与以上所列举历任社长相比肩。无怪乎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这位可能的社长尽管流传着几家说法，但是一直没有比较确切、令人信服结论。尽管如此，考虑到在吴昌硕社长去世（1927 年）和马衡社长上任（约在 1947 至 1948 年）之间整整相隔了二十年的时间，不可能没有社长或者起社长作用的人选，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学术立场，我们尚在继续查证这段历史，查找可能出现过的社长或者虽非正式社长但实际上起过社长作用的人物，同时亦盼高明教我。
- [2] 朱关田先生称之为“不是社长的社长”。
- [3] 孙晓泉：《西泠情愫》，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 页。
- [4] 据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亲口见告，当时关于中国印学博物馆成立之事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的过程中，赵朴初先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 [5] 《中国印学博物馆首笔筹款项到位》，《西泠艺报》第 117 期

通讯稿。

- [6] 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 [7] 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 2000 年版，第 50 页。
- [8] 同上，第 55 页。
- [9] 同 [6]，第 45 页。
- [10]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 [11] 见《西泠印社志稿》卷三《社约》第一条：“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
- [12] 关于“兼及书画”的提出者和提出时间，目前尚无确凿的文献记载：据西泠印社前副社长兼秘书长孙晓泉说，这是沙孟海先生在 1949 年后第一次社员大会（1962 年）上提出来的：“这次大会讨论了几个事，一个是张鲁庵捐献印章、印谱要举行仪式，二是成立庆祝 60 周年筹备委员会。……再一个是章程（草稿）征求意见。讨论印社的宗旨，很多同志提出来，印社以篆刻为主，但也很重视书画，我们篆刻家大部分都是书画家。有的说就是突出印，不要书画。有争论。当时沙孟海提出来一个办法，西泠印社以研究印学为主，兼及书画。”见《一片冰心在玉壶》，《西泠艺报》第 187 期。据刘江先生亲口见告，是孙晓泉在印社成立 60 周年前后提出。据笔者迄今为止所获资料，“兼及书画”写进《西泠印社章程》最早是在印社成立 85 周年（1988 年），见《西泠印社章程》，《西泠艺报》第 43 期。从此，印社 90 周年、95 周年《章程》皆有“兼及书画”之内容。至于有否更早于 85 周年的记载，亦待查。
- [13] 《西泠艺丛》1990 年第 3 期（总第 24 期）。

【作者简介】

史长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

国家民政部“特批”西泠印社追记

文 / 童禅福

丙申岁末，一个偶然的机，我与一位西泠印社资深社员谈及国家民政部“特批”西泠印社的往事，他听后连声说：“这是西泠印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记载。”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终于把15年前的这件旧事重新追记了下来。

2002年国庆节刚过，上班的第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的秘书打来电话，请我去一趟。我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省委大院三号楼。秘书把我领到张书记办公室，张书记递给我一封信，信上还有他“请民政厅阅办”的批示。张书记对我说：“西泠印社是全国性的社会文化团体，应该由民政部注册登记，这件事你们要跟民政部协调解决好。”张德江书记曾任民政部常务副部长，对社团管理工作十分熟悉。当时，我刚从省信访局调任省民政厅不久，协助厅长分管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张德江书记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也在常理之中。

我过去虽然爱好书法，但对西泠印社了解不多。回到办公室，我认真看了西泠印社郭仲选等五位老社员给张德江书记的信及张书记的批示，感到肩上的担子一下沉重起来，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啊！

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我国现有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社团，也是海内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作为文献名邦的浙江，历代文人辈出，20世纪初，丁仁、王褆、吴隐、叶铭四位江南雅士在西子湖畔的孤山创办了一个研究金石的学术团体，定名西泠印社。经过一批文化人的努力，又得到企业家、政界官员的资助，

西湖孤山这才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址福地。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是吴昌硕，第二任社长是马衡，第三任社长是张宗祥，第四任社长是沙孟海，第五任社长是赵朴初，第六任社长是启功，这六任社长都是中国文化界名流。西泠印社诞生在杭州，是众所周知的；西泠印社社址在杭州孤山，这也是世人公认的。

在2002年，西泠印社社员已遍及全国，但坐落在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建社快100年了，还从没有进行过任何注册登记，只是一家天下知晓的、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文人社团！办好此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我刚调往浙江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协助厅长分管民间组织，复退军人安置、优抚及社会福利等工作。民政部分管社团组织的姜力副部长正好也是从优抚司司长升任的，这为我“跑部前进”奠定了很好的人脉资源，我也就壮着胆来到北京国家民政部。走进姜力副部长的办公室，这位办事爽快的女部长一见面就冲着我说：“不久前才在浙江开优抚工作座谈会，我今天又改行了。你们浙江人办事就让人放心，今天你特意找上门，有何事，直说吧！”我把张德江书记的批示和召见我的来龙去脉和盘托给了这位女部长后，她接过我的话茬说：“张书记原来是我的老领导，今天你可谓是张书记派来的‘特使’，这件事我们应该认真办。”她接着又说：“我刚接过这项工作，还不熟悉，具体情况可以与孙伟林副局长谈。”接着，这位女部长就打通了电话，请来了民间组织管理局这位深谙业务的孙伟林副局长。

我在孙伟林副局长办公室里又将向姜力副部长汇报的一席话重述了一遍，接着就有了以下探讨性的一番对话。

孙伟林（以下简称“孙”）：西泠印社创办快100年了，早就应该注册登记了。

童禅福（即笔者，以下简称“童”）：这有历史原因，现在的关键是主管单位很难确定。

孙：西泠印社的社员遍及全国，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西泠印社的主管单位只有国家文化部或中国文联，地方政府特别是下属有关部门是无资格作为主管单位的。

童：西泠印社的诞生地就在杭州，如果主管单位在北京，那工作十分不方便呀！

孙：我一针见血地说，不是不便，而是你们浙江和杭州不肯放。

童：西泠印社是我们杭州的一张名片，当然要由我们自己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我特来北京，就是请局长大人想办法的。

孙：这是原则，没有办法可想。

童：全国有其他的社团或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由地方政府主管的先例吗？

这位从事多年民间组织管理的业务副局长思忖了一下，说：“你这个点子提得好。有，宋庆龄基金会就是民政部特例批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作为主管单位注册登记的。”

我马上说：“是否可参照这一模式，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作为西泠印社的主管单位？”

孙伟林说：“宋庆龄基金会是特例，浙江省人民政府作为西泠印社主管单位，事先还要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再提交民政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确定，否则就会有后遗症。”

但我心里最明白，这特殊授权不是最终目的。遵照领导的用意，西泠印社最后是要由杭州市有关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的，我心中始终盘算着。经过反复商议，西泠印社的主管单位终于确定下来了。孙伟林告诫说：“西泠印社登记注册如果按我们今天商定的方案办，西泠印社必须按社团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办，目前吸收社员的区域只能限于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华裔、华侨和外国人士不能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这么办。如果他们有要求，工作

又需要，可以作为名誉社员或社友参加有关活动。”

返杭之后，我向浙江省、杭州市有关部门作了汇报，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都同意国家民政部的方案。从此，西泠印社注册登记的程序就按照商定的程序进行着。

2004年1月13日，国家民政部批准西泠印社正式注册登记，并特例同意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作为西泠印社的实际主管单位。

从2004年1月13日起，西泠印社真正成为一家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民政部“特批”的文化人社团。2005年，西泠印社313名社员分布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目前，西泠印社社长由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挂帅，书法篆刻大师刘江先生出任执行社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担任副社长兼秘书长，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已进入常态性的发展阶段。

本文原载于《西泠艺丛》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童禅福：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历任主任采访录

【编者按】

2003年1月，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管理机构，是中共杭州市委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归口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管理，为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一直以来，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的管理和发展受到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其主任一职均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历任常务副部长王玉明、魏皓奔、杨志毅、龚志南兼任。在任期间，四位主任带领印社实现了社团、事业、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分类管理，为印社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此115年社庆之际，本刊特约《杭州日报·艺术典藏》栏目记者夏琳、郑成航对四位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带来对于西泠印社改制与发展之路的回顾。

王玉明：百年西泠印社的世纪变革

如今的西泠印社，社团活动风生水起，社员艺术创作与印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社藏珍品数以万计，被誉为“湖上园林”之冠的孤山社址安然保护，拥有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出版社、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等机构，煌煌然一个多元而富有活力的百年名社。然而，就在十多年前，刚刚进入新世纪的西泠印社，曾经是那么步履蹒跚……

曾任西泠印社党组书记、社务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王玉明，就是这一历史节点的见证者与转变推进者。

从一份提案催动的变革

王玉明说，西泠印社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艺术团体无法比拟的。然而，刚刚进入新世纪的西泠印社，其艰巨繁重的社务工作还是由杭州市文化局所属的西泠印社办公室来承担的。作为一个自收自支的处级事业单位，它与当时绝大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一样，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

“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原体制下的西泠印社再是苦心经营，也依然在逐渐萎缩：雅集、展览、研讨等各项活动只能简而化之，层次不高、影响有限。赵朴初社长去世

后，西泠印社擎旗人悬而未决。因为其特殊的组成形式不符合国家关于社团管理的规定，西泠印社甚至难以依法登记。西泠印社出版社被勒令停业整顿。西泠印泥因品牌问题官司缠身，胜诉无望。价值连城的藏品堆拥于葛岭一隅，隐患重大。孤山社址年久失修，饱受风雨侵蚀……”眼看印社每况愈下，社员们颇有微词，更有日本社员小林斗盒发表《告西泠印社社友书》，表达对西泠印社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忧心和期望。当时有领导说：“西泠印社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转变的催动，是200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个提案。它由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肖峰带领一批文化名人联名提交，内容是关于对西泠印社现状的担忧和加强对西泠印社扶持的建议。该提案得到全国政协和浙江省、杭州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经过深入调查，认为体制改革是解困西泠印社的必由途径。2002年5月，中共杭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西泠印社设立社务委员会，作为印社日常管理、服务机构，为市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原西泠印社办公室转企改制。

“社委会的组建无疑是高屋建瓴之举，但它的起步是艰难的，面临的不仅是‘改革复兴’的任务、棘手的既成难题，甚至对这项改革要统一思想、形成合力都很困难。”

“尽管转企改制迫在眉睫，产业发展任务繁重，社委会组建从零起步，但最根本的还是振兴社团。社团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心涣散，怎么样通过有分量的社团活动来重温宗旨，凝聚人心。最理想的途径，就是精心策划，推出一个重大的活动载体，赋予它全新的工作目标和运作机制，让人人都来担当，在合作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因此，策划举办好2003年的西泠印社百年庆典就成了最好的切入点和抓手。

名家之社 天下之社 博雅之社

新组建的社务委员会在接触、走访了大量社员，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于2003年1月举行的癸未迎春雅集上就有关西泠印社发展思想的讨论中，首次提出了“名家之社”“天下之社”这两个概念。随后经过多番探讨，“名家之社”“天下之社”的想法不断得到固化，但大家觉得：“从社团的特点看，总还缺点什么。”后来，考虑到西泠印社既要坚守“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也要扩大视野，吸收书画、鉴赏、收藏等门类中的大家。“这是社员的普遍看法，也是西泠印社的传统，‘博雅之社’的想法就逐渐清晰了。”

“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发展思想得到了启功、郭仲选、刘江、程十发、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的肯定，也得到众多社员的响应，三个“之社”成为西泠印社未来发展的完整目标呼之欲出。与此同时，百年社庆的筹备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

西泠印社逢五、逢十的庆典是传统活动，而百年社庆作为“复兴”的契机，就必须升华。“西泠印社在艺术团体中的地位，要求社庆必须是一次印学社团的国际性雅聚；西泠印社的辉煌艺术成就，要求社庆必须有充分的展示；西泠印社的办社宗旨，要求社庆必须成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印学研究峰会。”最后，百年社庆的主题内涵确定为：百社雅集、精品荟萃、研究印学、继往开来。系列活动则包括八大展览、四大盛会、一个仪式。

筹备过程中，困扰西泠印社的工作难题，也在多方努力下逐个得以妥善处理：西泠印社作为全国性社团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国务院办公厅同意按特例处理；西泠印泥侵权官司终于平息；库藏文物安全搬迁；西泠印社出版社恢复经营；孤山社址得以修缮。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竭诚邀请，启功先生欣然“出山”，担任印社第六任社长。

11月18日，西泠印社百年庆典正式拉开大幕，庆典系列活动热情洋溢，精彩纷呈，印社同人心意融汇，同享高情。“传承”“光大”的主旋律如同神圣的乐章回响在孤山上空。11月20日，西泠印社第十一次社员大会隆重召开。“百年社庆和这次大会在西泠印社历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向社员提出广泛认同并为之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工作举措，这是凝聚人心的根本要求。”作为社团工作的总部署、总发动，大会之后西泠印社即以“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为指引，一一落实工作重点，社团活动空前活跃，工作成果层出不穷。

西泠印社的灵魂是宗旨，活力在社员

回忆百年庆典的往事，西泠印社中人至今还在感慨其圆满成功：“西泠印社百年庆典，是西泠印社中人一次空前的四海大聚会，一次空前的作品大展示，一次空前的才艺大交流，一次空前的发展大讨论。百年名社从此百年中兴。”

同时，王玉明也不乏深思：“百年庆典不管如何光彩夺目、内涵丰富，终究是耀眼一闪，西泠印社的传承还是自有其轨迹。社以人传，人以艺结。百年西泠，是一部社员奉献史。大师是西泠印社的旗帜，无数德艺双馨的社员热心社团活动更是本源和基础。”

今天，虽然西泠印社名下已派生出越来越多的内容，今后还会不断拓展，但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艺术、学术社团，无法复制，更不能变异。“她的灵魂是既定的宗旨，活力在于社员和社员活动。因此，不管西泠印社有多少外延，社团自应独行其是。可以说，西泠印社就是西泠印社，吸收什么样的社员，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是其永恒的选择、根本的选择。”

作为西泠印社世纪之交的衰落和新世纪改革复兴的全过程见证者，王玉明认为这些起落反差并非主事者能力水平有异，而是支持社团活动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百年大庆轰轰烈烈、大庆之后再度欣欣向荣，莫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今后，西泠印社的体制还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政府为传承这朵民族文化奇葩应有的担当不能变，为社团和社员实践其宗旨提供的支持和保障不能变。”王玉明说。

魏皓奔：令人敬仰的西泠人文精神

2005年1月，魏皓奔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的同时，担任了西泠印社党组（党委）书记、社务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直至2014年7月，共计九年半时间。魏皓奔任职期间，亲历了西泠印社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比如2006年“金石篆刻（西泠印社）”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泠印社成立105年和110年社庆；西泠印社集团成立；送别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迎接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等。

魏皓奔说：“在来西泠印社任职之前，我曾担任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领导达十年之久，对社团，特别是学术性社团生存和发展的种种难处，有真切的了解。因此，我在西泠印社任职后，经常在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学术社团能历经性质根本不同的三个政权而不倒，而且连名称也没改？为什么一个学术社团一百多年来能始终屹立在海内外篆刻艺术之巅？为什么一个专业十分小众的社团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

随着思考和工作的深入，答案在魏皓奔心中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根源于西泠印社可贵的人文精神，即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和一代代同人们对篆刻艺术的酷爱和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正因为有此酷爱和使命感、责任感，因而呈现出这一社团与众不同的学无止境的追求、海纳百川的气度、坚韧不拔的意志、爱社如家的情操等令人敬仰的人文光彩，进而有力地支撑着这一社团一百多年来铿锵前行。”

唯有使命感、责任感，方能成大业

在现实社会里，热爱某项艺术，进而发起组织社团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这些社团发展到后来，或是存续时间不长，或是名存实亡。唯独西泠印社历经百年而不衰，且根深叶茂、欣欣向荣。究其文化原因，首先在于西泠印社社员们在对篆刻艺术酷爱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魏皓奔说：“如果不能理解这份文化使命感和

责任感的重量，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四位印社创始人出钱出力，却始终不愿出任社长？如果仅仅由于爱好而结社，则显然不会敬谢不敏。为什么西泠印社社员的捐赠能蔚然成风？如果仅仅个人爱好，则显然难以割爱。因此，这一切只有从西泠印社社员们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西泠印社的士大夫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

关于中国士大夫及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北宋大儒张载有句名言描述得十分精辟，并经常为后人所引用，这就是：“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往圣继绝学”即替以往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则是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象表述。魏皓奔表示：“在西泠印社的创立和发展中，中国士大夫这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更是西泠印社人文精神的精髓。比如1921年西泠印社义卖、捐赠筹款抢救《汉三老碑》的义举。按常理，抢救汉碑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与印社无直接关系。然而，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角度来解读，当年西泠印社先贤们的感人之举就合情合理了。”其他的例子，比如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和政权，都对西泠印社这一学术社团在法律上予以认可并给予支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恐怕这也是由于这一社团所秉持的宗旨和社员们所表现出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

西泠印社人文精神的特点

在魏皓奔看来，西泠印社创立者和同人们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在西泠印社具体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比较集中地呈现出以下这些人文精神特质：

（一）海纳百川的气度

西泠印社虽然地处杭郡，由浙派金石家所发起创建，

但它的社团文化理念非常开放、包容，对其他地域的篆刻流派及赏鉴、金石考据等其他学术门类同样报以尊重，博纳兼容，艺术上相互砥砺与借鉴，于是引来了满座高朋，共同开创了印文化的巅峰。

（二）学无止境的追求

西泠印社以弘扬篆刻艺术为己任，始终重视印学研究，并以锲而不舍、学无止境的精神，终成大业。

（三）坚韧不拔的意志

西泠印社能够一百多年而不败，与西泠印社几代人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为：认准目标，坚定不移；艰难困顿，不忘初心；同时，在坚忍中充满睿智。

（四）爱社如家的情操

爱社如家的事例，在西泠印社不胜枚举，它是西泠印

社历史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1904年创立初始，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印社同人的齐心协力，西泠印社可移动文物收藏数量从无发展到今天的1万余件，文物藏品类别具体可分为印章、印谱、印屏、绘画、书法、碑拓、书籍、杂件八大类。据2017年资料统计，其中有126件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484件被定为二级文物、3725件被定为三级文物。在西泠印社的这些收藏品中，有丰富的秦汉玺印和明清各流派印人的代表作品，还有明清印谱，其中多部属孤本。西泠印社因其藏品的史学性和专业性，具有其他学术团体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西泠印社社员的这种爱社如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西泠印社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并为印社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也是印社立社百余年的根本。”

杨志毅：学术立社 走向国际 文化名城中的百年名社

2016年，G20杭州峰会惊艳了世界。杭州的优秀文化和深厚积淀，为这场盛会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其中，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艺术献礼，就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时任西泠印社党委书记、社务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杨志毅，正是这一系列献礼的见证者。事实上，从2014年至2017年，杨志毅与西泠印社的故事还有更多。这三年里，杨志毅带领班子同志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推进文化名城建设，推进国际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建设和发展西泠印社。

献礼国际峰会 提升国际声誉

杨志毅表示：“2016年，杭州迎来了G20峰会这一重大国际会议。西泠印社围绕办好G20一个圆心工作，以‘四个满意’的要求，发动全体干部，统一思想，以百年印社的文化遗产备战G20峰会。”

以“迎峰会”为主题，由西泠印社主办的艺术活动包括“当好东道主，展示西湖美”迎峰会笔会、“喜迎

G20·丙申春季雅集”、“喜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迎G20峰会书法篆刻主题创作”、“二十国国名、二十国元首姓名与肖像印篆刻作品创作”等七个主要活动，组织社员创作作品452件。其中于北京、杭州两地举办的“喜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是系列活动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化盛事，跨越百年历史时空，以艺术的篇章献礼G20。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对此评价：“本次活动很有品味，很有意义，感谢艺术家的辛勤付出。”“迎G20峰会书法篆刻主题创作”，围绕“西泠、西湖、西溪”，以书画印为抓手，既表现了杭州最负盛名的湖山美景，也突出了印社作为世界“非遗”传承组织的文化特质，出版发行的《作品集》更为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留下了富有艺术价值的纪念。

杨志毅说：“除了G20峰会这个契机之外，西泠印社的海外推广也在这几年间从汉文化圈逐步扩展到欧美国家和地区，从华人世界扩展到西方主流传媒，从民间艺术界扩展到官方文化机构，在交流层面和深度、广度上不断提升。

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和活动，进一步扩大西泠印社对外交流平台，促进西泠印社加快国际化进程，不断提高国际声誉。”

2015年，西泠印社联合澳门艺术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君匋艺术院举办的“吴赵风流——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特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展。2016年9月，日本篆刻家协会来杭参加西泠印社主办的“四君子”展，并举办“日本六轡三人书法作品展”。11月，“百年西泠·中国印”海外交流活动于“一带一路”重要国家斯里兰卡隆重举办，展出了近百方中国印和社员创作的书法、国画精品，此举既为多元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拓展西泠印社对外交流建立新的渠道，也是响应国家号召，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次亲身实践。12月，由香港民政事务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西泠印社共同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在香港举行，借此进一步扩大了“西泠印社”国际影响力。

2017年4月，西泠印社于香港举办“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展”。5月在日本东京、大阪举办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西泠印社——中国金石篆刻艺术海外推广”系列活动，包括系列展览和雅集、演讲等交流活动，受到了日本政界、书道篆刻界以及艺术爱好者群体的普遍欢迎与好评。

既然要向国际推广，西泠印社自身也需要充分保护、利用好自身的文物资源，加强文物保护、促进文物有效利用是新时期西泠印社文物事业发展目标。在G20峰会到来前，社务委员会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文保要求高、施工困难多等种种不利因素，对孤山社址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保护性修缮，按照文物修复要求，完成了对建筑物油漆养护、环境绿化整治、部分建筑抢救性修缮、华严经塔塔基加固、整理数峰阁遗址、开辟碑廊新景点，提升改造厕所、供水配电、安防系统基础设施等近十个方面的工作，为世界各地游客献上了一个典雅精致、古意盎然的江南园林精品。2017年，社务委员会又再次对孤山社址进行了全面布局调整，重点打造社员之家，为西泠印社社员和广大书画篆刻爱好者交流、展示和切磋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平台。

此外，库藏文物的管理也更加规范，2014年以来，每年社务委员会都配合完成可移动类文物普查、古籍普查，完成西泠印社藏文物电子档案，有效促进社藏文物的管理和合理利用。文物研究展示也不断深入，继往年举办的社员捐赠展、七任社长展等取成功后，今年先后举办了“金石留韵——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拓片展”“徐三庚篆刻精品展”

等公益性文物藏品展览，充分发挥库藏文物展示教育功能。

西泠印社文物捐赠工作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各界贤达与社内同人的大力支持。尤其是2017年上半年，西泠印社接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捐赠的篆刻书法作品近180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意义之大，为近年首屈一指，将成为西泠印社展览、出版等文化推广活动的重要素材。是年，文物库房借赴日举办社藏印章原拓题跋扇面展之机，向海内外60位社员征集作品，并接受了社长饶宗颐先生及其他社员捐赠书画多件，为社藏增添新品。

深化体制调整 构建印学新格局

从2014年到2017年，西泠印社按照中央、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有关精神，进一步深化体制调整，事业和企业按规定实现了体制分离。

2014年，建立“1+3”体制运行模式，即在西泠印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指导协调西泠印社社团、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三个主体的统筹发展。

“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好党委的领导作用，顺利完成事企体制分离，梳理、规范机构设置，落实人员分流、定岗、兼职清理等工作，积极妥善解决好早期改制历史遗留问题，实现西泠印社整体平稳过渡。”2016年，按照中共杭州市委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单独设立党委。西泠印社党委根据实际再次做出调整，并从西泠印社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中共西泠印社委员会和中共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的议事权限和议事内容进行梳理。“两个党委按照从严治党要求，分别对所在单位部门的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党风廉政、意识形态等承担主体责任，本着‘尊重历史、立足长远、共同发展’的原则，相辅相成，相互支持，从全局出发，共同推动西泠印社的整体发展。”杨志毅说。

此外，西泠印社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也是社务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之一。西泠印社重视、加强品牌管理和统领，推进依法治理，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2015年，社务委员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的《西泠印社品牌保护与管理的实践思考》获得杭州市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评审二等奖。修订《西泠印社品牌管理规定》，积极推动《品牌许可使用协议》的全覆盖，配合杭州市人民政府做好有关“西泠”商标事宜的督查工作。2016年，社务委员会继续深化维权

工作，加强“西泠印社”商标注册保护。此外，社务委员会对2015年至2017年度品牌费征收和涉及其他品牌管理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制定、规范了《品牌费使用管理规定》。

印社素以学术立社，印学研究是百年名社永恒的主题。为此，西泠印社以学术建设为重点，每年举办国际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社刊《西泠艺丛》和召开编辑研讨会等学术性活动，力图构建国际印学研究新格局。

杨志毅说：“‘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和大型专题学术研讨会，作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印社乃至国际印学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积累。国际印学峰会每三年一届、大型专题学术研讨会每年一届，近年来收稿量逐年增加，论文质量逐年提高，作者覆盖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对促进国际印学界学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交流，推动当代国际印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体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第四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2015年“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2016年“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均为学界公认的相关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和最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尤其是2016年的“篆物铭形——图形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了海内外印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不仅拓展了传统的印学研究视野，更进一步构建了当前国际印学研究的新格局，在国际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追随先贤足迹 扶植新生人才

传统文化离不开传统形式，传统形式有赖于传统活动。西泠印社最负盛名的传统活动，莫过于传统春秋雅集。几年里，西泠印社的传统雅集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在延续先贤开创的事业中，主动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社委会按照总书记在文艺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挥自身优势，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雅集活动，与国家的重大事件，省市的重大部署紧密结合，将传统的雅集活动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赋予新的内容和活力。”相关的活动有“纪念抗战70周年”主题创作活动、“纪念建党95周年”系列活动、“五水共治”笔会活动等，强化“中国梦想·美丽杭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

印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新鲜血液。2014年以来，社务

委员会不断加强社员的走访、调研和听取意见，强化服务，加强青年社员的培训，2016年举办了青年社员和西泠印社社友会会员专题研修班，以加强思想政治、文化素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引导。关于入社制度，“西泠印社秘书处对《推荐入社新社员标准的施行细则》进行多年慎重酝酿、研究，多方征求印社领导、理事、社员的意见和建议，历经秘书长会议、社长会议讨论和审议，对《细则》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明确了社员入社的标准与程序，此举延续了精英治社的优良传统。此外，社委会为统一管理社团事务，不断加强遍布世界各地的400多位社员和已故社员的建档、信息更新工作。”

此外，高层次的赛事也是扶植艺术人才发展的重要举措。西泠印社国际性大型艺术展赛作为西泠印社每年重点活动之一，连续举办“雅韵流芳”“湖山流韵”“金石弘源”等“百年西泠”主题艺术展赛，既是对西泠印社创社宗旨与文化理念的推扬，也为繁荣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促进技法交流和借鉴、提升艺术人才综合素养、培育印社后备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百年西泠·湖山流韵’诗书画印大型选拔活动，从原有的篆刻、书法为主，扩展到诗、书、画、印等多项艺术门类，与立社宗旨相呼应，彰显了西泠印社提倡艺术家博通兼能、注重传统文化综合素养的理念。通过十年打磨，‘百年西泠’系列活动业已成为国际篆刻书画领域独具特色、最有影响的专业活动品牌。”

创办“西泠学堂” 记录“非遗”影像

2015年，西泠印社金石篆刻成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创业基地首批引进的五个项目之一，西泠印社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首开“西泠学堂”，双方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原则，探索“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非遗”传承人，扩大金石篆刻艺术的影响力。

2017年4月，西泠印社于香港举办“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展”，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出席开幕式，并为香港“西泠学堂”揭牌，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这标志着西泠印社和联合出版集团旗下集古斋经过一年多详细策划的“西泠学堂”正式创办。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批示：“加

强平台建设，促进文化交流。”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批示：“这次活动组织得很好。接下去要下些功夫把香港‘西泠学堂’办好，在取得经验基础上再稳步推进，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杨志毅表示，创办“西泠学堂”旨在大力弘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国传统文化，以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作为载体，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立足香港、辐射亚洲、面向世界，通过一系列集专业性、趣味性、实用性相结合的中高端课程体系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使更多香港市民乃至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有更多机会参与和学习，感受中国文化的大美之所在。创办期间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中联办、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和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班子的努力争取，2016年“西泠印社金石篆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项目正式立项。西泠印社与浙江大学合作摄制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先生、95岁资深社员归之春、103岁资深社员顾振乐等人的“非遗”纪录片。2016年12月，“莲蓬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杭州举办，就此开启了饶宗颐社长“非遗”纪录片的拍摄；2017年4月，西泠印社在香港举办“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展”，饶宗颐社长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剪彩，摄制组专程赴香港进行拍摄和采访；2018年2月，饶宗颐先生仙逝。此前对饶宗颐社长的拍摄和采访成为了西泠印社篆刻影像资料库珍贵资料，凸显出抢救性纪录片拍摄的重要意义。

做强西泠传媒 拓展创意空间

2014年起，西泠印社打造以“中国西泠网”、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官方微信与微博网络互动平台、社刊《西泠艺丛》为核心的西泠传媒矩阵，不断加强与新华社、中新社、《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等媒体的深入合作，积极响应西泠印社媒体宣传方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西泠印社的各项活动、展览和赛事的对外宣传工作。

其间，西泠印社迎G20宣传工作成为一大亮点，除西泠传媒外，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浙江日报》等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对系列活动进行了深入翔实的报道，对西泠印社用艺术形式为迎接G20讲好中国故

事、杭州故事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被列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年度精品工程”的大型纪录片《西泠印社》于2016年6月启动，均为展示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文化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泠传媒的核心载体是《西泠艺丛》。2014年6月，经过长期的筹备与申报，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社刊《西泠艺丛》正式获批刊号，由社务委员会作为主办、主管单位。“《西泠艺丛》从季刊转变为月刊，社委会面临着任务重、人员少、资金紧缺等压力和困难，经领导班子慎重考虑，决定依托西泠印社（杭州）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力量，迎难而上，齐心协力完成每年12期的出刊工作。《西泠艺丛》以鲜明的专业学术性作为立刊之本，建立学术主持人和组稿人制度，规范编辑流程和提高采编质量，积极走访文博组织，定期组织召开学术座谈会，坚持专题策划研究，打造‘专题特色’。”目前已成为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成为宣传印社、传播印学、服务社员的重要阵地，受到社内外专家学者好评。

2016年，西泠印社积极实施“互联网+”文化平台战略，在中共杭州市委和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信息港”项目于该年立项。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设计、开发与实施，该项目实现了西泠印社门户网站的全新设计改版，推出了学术研讨会在线论文库与《西泠艺丛》数字社刊等在线学术发布平台，开发了西泠印社展赛在线报名与组织、学术研讨会在线投稿与评审等功能，积极落实网络安全“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工作。项目将于西泠印社115年社庆期间正式启用。

同时，西泠印社在杭州市文创办的指导下，持续推进杭州文博会“网上文博会”项目建设，经过四年积累和运作，与杭州文博会官网、官方微博及多个线上合作平台实现互联网媒体优势资源体系整合，新媒体传播渠道日均点击率均达数千次以上，新增订阅用户数量累计突破25000人次，各大相关网络媒体平台的总访问量累计突破300万人次；多位省市领导亲临杭州文创馆现场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中国印学博物馆不仅每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左右，还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爱之印”支教活动，通过丝绸之路向身处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传递印文化和传统文化，并捐献书籍和相关资料，充分展示了“艺术与爱”交融传播的活动初衷。

龚志南：传承·拓展·再出发

115年之际的西泠印社

自2017年6月起，龚志南开始担任西泠印社党委书记、社务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龚志南感佩于前辈艺术家、专家学者和社内同人对印社的倾力奉献，尽心尽职，积极工作，为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泠印社，弘扬西泠印社精神而不懈努力。

坚守传统品牌 扩大文化辐射

一年多来，西泠印社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推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扩大了西泠印社品牌文化辐射力。

西泠印社春、秋雅集活动继续开展。尤其是2017年秋季雅集时成功举办了“百年西泠·金石弘源”大型系列活动。“其中，篆刻选拔赛暨第九届篆刻艺术评展是本次系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这次大展共计收到900多件作品，200件作品入展，100件作品入选，10位作者获优秀奖。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来稿数量居历史之最，共计收到论文来稿198篇，作者分布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日本、新加坡、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涵盖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研究、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印人研究、印学文献研究、域外印章研究、西泠印社史研究、金石铭刻研究以及书画、鉴藏等众多研究方向，质量较往届有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活动得到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副市长陈红英的批示肯定。”

除此之外，西泠印社还加强了与各地文化单位的合作与交流。龚志南说：“西泠印社原本主要开展高端的、专业的学术活动，现在则在合作、带动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对于推动印学文化，传播和弘扬、提升印社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7年，西泠印社先后与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弄潮杯”钱塘江全国书法大赛；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沙孟海书学院共同主办“沙孟海杯”全国书法篆

刻作品展；与杭州市司法局共同举办“2017杭州市中小学宪法主题书法篆刻作品评展”；与杭州市文联、扬州大学共同主办“布衣曲江客——金农诞辰33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精心策划组织了“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江新语·浙江实践”主题篆刻创作展览。2018年戊戌春节，社务委员会与《杭州日报》、浙江省博物馆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联合举办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西泠名家春联展”活动，并组织在杭外籍人士写春联、过春节；今年上半年，印社还先后与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泰顺县人民政府，《河南法制报》社合作，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弄潮杯”钱塘江全国篆刻大赛、首届“介堪·去疾杯”全国泰顺石篆刻大赛、“两湖清风”国际书画篆刻名家邀请展等活动。

“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合作搞活动这么简单。印学本来是小众的，但通过一系列活动，可以使之成为大众能够广泛关注的文化活动。”龚志南说。

拓宽对外交流 展现文化自信

西泠印社是对外交流的一张文化“金名片”。一年多来，西泠印社牢记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的“加强平台建设，促进文化交流”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下些功夫把香港‘西泠学堂’办好，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稳步推进，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的嘱咐，今年4月，西泠印社在香港举办“西泠学堂”开班仪式暨“阅读书法的文献魅力——陈振濂书法艺术展”，首期培训开设书法等课程，受到香港艺术爱好者的好评；8月，以“触摸人文江南，发现中华艺术之美——西泠印社深度文化游”为主题内容的为期一周的香港“西泠学堂”暑期游学班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举办开学典礼，该活动是杭港两地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交流活动的组成部分，更是推广了中国传统篆刻艺术，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西泠印社还先后在日本与法国举办“古韵同声——西泠印社藏历代印章原拓题跋扇面展”；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百年西泠·中国印”悉尼特展；在匈牙利塞切尼国家图书馆举行“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布达佩斯特开展幕式以及艺术创作交流活动。

龚志南表示：“在‘走出去’的同时，‘请进来’也成为印社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比如去年春节前在孤山社址举办的“韵味杭州·艺术春节——在杭外籍人士与西泠印社社员共书春联”活动；今年7月，联合国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田野调查在孤山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亚太地区培训主任以及“非遗”国际认证培训师等外籍友人参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篆刻艺术”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所取得的成果。“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还邀请日本燕京书道交流协会在杭州举办‘中国杭州书法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专门致信西泠印社表示感谢，称西泠印社为日中友谊和国家外交做出了贡献。今年9月，为庆贺中匈建交40周年，西泠印社还将在匈牙利举办特展。”

这些对外活动，一步步稳稳向前迈出，西泠印社这张“金名片”在展现文化自信中的作用也愈加鲜明。

积极备战社庆 巩固社员基础

对于西泠印社来说，本年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莫过于即将举行的印社115年社庆活动。“为了做好印社115年社庆活动，印社专门成立了社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活动方案。西泠印社115年社庆系列活动贯穿全年，涵盖展览展示、学术研讨交流和印社换届等方面。”

龚志南介绍说，社庆期间将举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西泠印社社员诗书画印展、西泠印社社员专业成果展、西泠印社老照片展等一系列展览活动；举办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国际印社联展暨社长高峰论坛和《西泠艺丛》公开发行五年暨“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编辑研讨会。此外，西泠印社第十四次社员大会和西泠印社理事会与社长会议也将召开，审议《西泠印社章程》修订稿，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印社领导班子。“目前，社庆的筹备情况按计划稳步推进，社庆的信息在各大专业媒体陆续发布，大型艺术展览、学术研讨等项目的作品征集也在有序开展。”

此外，社员作为印社的主体，也是凝聚社团力量，推

动社团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服务为导向，通过规范团议事决策机制，公开社团事务，明确入社标准等措施，社团管理与组织建设有了明显的改善。”按照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推荐入社条件，对近20年来申请人社材料进行整理与完善，在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并产生了入新社社员。同时建立“社员之家”和“社员固定活动日”等社员服务长效机制，获得了社员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提升文保水平 传承推广“非遗”

作为一家百年名社，丰富的社藏是西泠印社的“宝贝”，其保护工作的难度也不小。因此，西泠印社以新理念、新举措，繁荣发展文物保护事业，提升文物保护水平。

“去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向西泠印社捐赠篆刻书法作品事宜作出批示：‘要衷心感谢李岚清同志一直以来对杭州的关心厚爱。要把作品接收好，整理好，展示好。把印文化弘扬好，不辜负李岚清同志对我市文化建设的关怀。’此外，印社还接受了社长饶宗颐先生及海内外社员捐赠书画作品；通过举办社藏印章原拓题跋扇面展，向海内外60位资深社员征集作品，进一步丰富了社藏。”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西泠印社）”的主要传承组织，西泠印社在开展篆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同时，注重向社会各界特别是针对广大学生普及推广印文化知识。

龚志南表示，去年以来，印社与杭职院合作完成了国家项目“传统手工业（非遗）技艺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料库”的“金石篆刻”子项目。此外，社员抢救性艺术纪录片摄制工作按计划开展，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95岁资深社员归之春先生和103岁资深社员顾振乐先生的专辑正在制作中，为西泠印社篆刻影像资料库增添珍贵史料，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西泠印社）”的技法传承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做出应有贡献。

西泠印社 115 年大事记 (1950—2018)

1951年 辛卯

由邵裴子、陈伯衡代转王福庵、吴振平二人信函，要求将西泠印社之房屋、土地及所藏文物书画献给人民政府。9月得政府批准同意，房屋、土地交杭州市建设局园管处管理，文物交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54年 甲午

《西泠印社胜迹留痕》问世。社员韩登安刻，共46印。印文刊印社之胜迹，边款记其始末。

1955年 乙未

第二任社长马衡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1957年 丁酉

筹备恢复印社。8月，由浙江省文化局指示韩登安等着手筹备恢复西泠印社。

在观乐楼内设立“吴昌硕纪念馆”。《西泠印社志稿》印行。该书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编辑，资料翔实，是有关1949年前社史最具权威的图书。

日本著名书道家丰道春海、青山杉雨等一行来印社参观访问。此为1949年后，来印社访问的最早的日本书道团。

1958年 戊戌

成立恢复印社筹备委员会。张宗祥任主任委员，潘天寿、陈伯衡为副主任委员，韩登安、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为委员。韩登安兼秘书。秦康祥等编成《西泠印社志稿》在上海梓行。

1月19日，在山川雨露图书室设门市部。

1959年 己亥

是年夏，印社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杭州市文化局领导。学术、组织、业务、收藏等诸方面，都得到较快发展。

举办国庆10周年金石书画展。展出的文物珍贵精博，获得广泛赞誉。

1960年 庚子

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逝世，享年81岁。



1961年 辛丑

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保管领导部门宣布，印社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2年 壬寅

成立印社6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张宗祥任主任，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等为委员。

张鲁庵家属叶宝琴遵先生遗愿，将珍藏印谱400余部、印章1500余方捐献给印社，印社辟“望云草堂”（张先生斋名）珍藏。



社员高络园将其珍藏的古铜印500方并古砖数百块赠予印社。

社员葛昌楹捐赠明清名家刻印43方给印社。

1963年 癸卯

召开60周年纪念会。除一般纪念活动外，还进行了以“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西泠八家的艺术特点”为题的学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文化界著名人士为大会题诗、题字。

举办庆祝60周年展览会。这是迄今为止印社规模最大的一次金石书画展览会，共分三大展览厅：一为历代金石家书画篆刻；二为捐献品；三为现代金石书画，以社员作品为主。参观者络绎不绝。

选举产生印社首届理事会。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许钦文等为副社长。



1964年 甲辰

《西泠四家印谱》出版。由潘天寿题签，张宗祥题扉。

全面恢复春秋雅集活动。

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遗存的自用印356方以及其他遗物，由其家属赠予印社珍藏。

1965年 乙巳

举办吴昌硕诞生120周年书画篆刻展览。

8月16日，第三任社长张宗祥逝世，享年84岁。

1966年 丙午

“文革”开始，社址中丁敬、邓石如、吴昌硕三座造像及后山石坊

遭毁。其他社藏文物及刻石因积极采取保护措施而未损。

1972年 壬子

1971年冬至1972年春，由杭州市直接拨付城市维护费整修印社全部建筑物。

1973年 癸丑

由日本书道联盟常务理事、日本书道艺术院理事长香川峰云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印社。团员有青山杉雨、饭岛春敬、金子鸥亭、村上三岛等著名书法家。



恢复金石书画出版工作。

1974年 甲寅

1973年底至1974年9月，印社自筹资金，由著名建筑师、社员吴寅设计，修建了宝印山房至仰贤亭一带的建筑。

1976年 丙辰

“文革”结束。社址各刻石剥去保护层，向游客重露真面目。

1977年 丁巳

整修社址。复修宝印山房，辟为孤山外宾门市部。

1978年 戊午

时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印社为出版单位。
吴昌硕铜像，邓石如、丁敬石像重建落成。
印社组织部分社员及省市篆刻家创作出版《革命胜迹印谱》。7月10日，叶剑英同志为该印谱题名。
柏堂前久已填埋的池塘小方壺开挖疏浚，题名莲池。

1979年 己未

《西泠艺丛》创刊。该刊以篆刻为主，兼收书法、绘画作品及论文，古今并蓄，古为今用，是一本研究和繁荣金石书画创作的综合性刊物。
召开纪念印社75周年社员大会（12月8日）。出席社员50人（其中老社员18人，新社员32人）。大会讨论了《章程》修改草案，进行了学术报告会与王个簃捐献颁奖仪式。共收到社员作品150件。
大会选举沙孟海为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王个簃、方介堪、启功、诸乐三、钱君匋、程十发等为副社长。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计理事21人。通过新《西泠印社章程》及制订出印社五年工作规划。



王个簃向印社捐献吴昌硕及明清大家书画30件。
举行吴昌硕诞生135周年画展。

1980年 庚申

11月7日，以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先生为团长，日本

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村上三岛先生等为团员的“吴昌硕铜像赠呈访中团”，专程来杭举行铜像赠呈仪式，与正参加印社理事会的各理事举行座谈交流，并赴超山拜谒吴昌硕墓。

1981年 辛酉

赴日本岐阜举办“西泠印社吴昌硕书画展”。2月14日，郭仲选、吕国璋等五人组成杭州市文化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岐阜市，并在岐阜市举办“西泠印社吴昌硕书画展”，展出吴昌硕作品80件。展出期间还举行了吴昌硕艺术介绍会。青山杉雨先生等前来会见。这次展览在日本引起较大反响。

以日本著名书法家饭岛春敬为团长的日本书法家代表团来印社访问。

以日本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为团长的“江南文化考察友好访中团”来印社访问。

1982年 壬戌

4月，组织在杭社员和书画家去富春江、新安江写生、访问。

10月，召开理事会，研究筹备1983年印社80周年社庆。

为庆祝印社成立80周年，大规模整修社址。

以青山杉雨、上条信山为正副团长的日本谦慎书道会江浙学术考察团来印社访问。

1983年 癸亥

社址整修全面完成，焕然一新。重建后山石坊。

召开印社建社80周年纪念大会，与会社员和来宾以及中国香港、日本的友好人士共有200余人。大会收到论文30余篇，举行了学术讨论和书画篆刻交流会。举办了印社藏品展、社员作品展，社史资料、创始人事迹、印学史资料、印社国际交流等陈列，盛况空前。



1982年初至1983年10月，杭州市政府拨款并印社自筹资金共15万元，请著名古建筑专家、印社社员陈从周设计，对印社景点全面修整，并立省级重点文保单位石牌。

1984年 甲子

举行吴昌硕诞生140周年纪念活动。

1985年 乙丑

6月，《西泠艺报》创刊，社长沙孟海题写报名，各地著名书画家题词祝贺。

11月，吕国璋、丁茂鲁应邀赴日本香川举办展览、讲学，代表印社祭扫长尾甲先生墓，并会见其后人，失去了58年音讯的关系重又恢复。

1986年 丙寅

举办“西泠印社社藏建国后故世社员、书画家作品展”。

日本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接受提议，亲来邀请印社赴日本举办“西泠印社展”。

发起并举办“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

8月11日，“中日友好福井书法作品展”在孤山社址揭幕，展出日本福井县书法家作品99幅。时日本福井县福井市市长大武幸夫率访中团专程来杭出席开幕式。

1987年 丁卯

社员威叔玉向印社捐献陈薰斋（介祺）汇辑的《十钟山房印举》18函182册。

由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和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率领的日本书法访中团，来印社访问与交流。

由印社与日本国日中书法交流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学术交流会”，于8月15日在杭州举行，出席的日本书法界、书法理论界人员有28人。日方主讲者为梅舒适、杉村邦彦、鱼住和晃等。沙孟海社长亲自主持。印社主讲者为沙孟海、刘江、陈振濂。

11月13日，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获奖、入选作品展”在杭州举行开幕式，同时举行授奖仪式。

为纪念印社四位创始人（丁仁、王褊、叶铭、吴隐）而设立的印社创始人遗迹陈列室，11月13日在孤山社址题襟馆正式对外开放。

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的孙女丁如望、丁如留女士，向印社捐献丁仁生前用印73方。

11月20日，“日本篆刻家作品联展”在孤山社址举行。以印社名誉理事小林斗盒为团长的40多位日本篆刻家，专程来杭出席开幕式。

1988年 戊辰

经青山杉雨先生倡议，由日本读卖新闻社和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西泠印社展”，经过两年筹备，于2月26日起，先后在日本东京、大阪、岐阜三地举行。印社应邀分别组织东京、大阪展代表团赴当地出席开幕式，并进行交流访问。日方出席开幕式的有读卖新闻社社长小林与三次、日本艺术学院院长有光次郎和日本艺术学院会员、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以及大阪的村上三岛、杉冈华村、今井凌雪等各界人士。日本书坛泰斗西川宁先生亲来参观。该展展出社史资料及藏品128件，盛况空前，轰动日本。

11月10日至13日，举行建社85周年庆祝活动。79位社员以及海内外来宾共200余人在孤山社址举行纪念大会。大会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并进行了交流，还举办了国际篆刻书画邀请展，展出230件篆刻书画作品。



大会选举沙孟海继任社长。同时，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郭仲选被选举为常务副社长。

社址增添了新的景观：一是沙孟海撰书篆额的“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记”；二是“社员题名”刻石，共刻在世社员134人的签名。刻石为一长方形石柱，上雕狮纽，形如一方大型的石章。



1989年 己巳

根据部分印社的提议，于4月14日至17日，在杭州召开全国部分印社联席会议，倡议举办“全国印社篆刻联展”。

11月8日至16日，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书画作品展”，以纪念吴让之190周年诞辰、赵之谦160周年诞辰、吴昌硕145周年诞辰。

为纪念赵之谦160周年诞辰，与桐乡君匋艺术院等单位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浙江、上海、河北等地的50多位学者和书画篆刻家出席了会议。名誉社员、日本岐阜市市长蒔田浩来印社访问。

为纪念吴昌硕与日本下部鸣鹤结友百年，日本天溪会向印社赠“结友百年铭志碑”。赠碑仪式于11月16日上午在吴昌硕纪念馆举行。日本天溪会主事南鹤溪女士率团出席仪式。

已故社员葛昌楹的夫人冯梦苏女士，将珍藏多年的葛先生生前用印10方（其中吴昌硕刻田黄石章8方，钟以敏、叶露渊各刻青田章1方）及《邓印存真》2册捐献给印社。3月17日，印社在孤山社址举行捐献仪式。

1990年 庚午

2月15日，由西泠印社主办，北京印社、南京印社、终南印社等12家印社协办的“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在杭州开幕，展出全国122家印社的166件印屏。之后该展依次到南京、武汉、西安、郑州、沧州、德州、呼和浩特、沈阳、天津、北京等地巡回展出。

6月5日，由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西泠印社和日本福井日中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浙江福井友好书画交流展”，在印社展厅展出。

9月，刘江、吕国璋、丁茂鲁等赴东京时，代表印社寻访并祭扫日本高芙蓉、河井仙郎墓，同时祭扫日下部鸣鹤先生墓。

1991年 辛未

印社与日本九州祭典运营委员会举办的“中日友好书法花道联展”，于3月22日在杭州展出，共展出书法篆刻作品64件。

5月4日，印社为80岁以上的在杭州老社员沙孟海、吴寅、商向前、吴少淳、陆仰非、陈左夫举行祝寿会。

西泠印社“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开幕式暨授奖仪式，于11月20日在杭州孤山社址举行。

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揭幕仪式，于8月20日在印社孤山社址举行。由杭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西泠印社、日本书人协会合办的“中日友好书画篆刻展”在杭州开幕。

为支援灾区人民抗洪救灾，印社两次组织在杭社员及书画家赈灾书画义卖，并向灾区捐款。

“中日友好书法联展”3月在杭州展出后，于12月7日在日本北九州美术馆开幕，以副社长郭仲选为团长的六人代表团应邀赴日出席开幕式，并进行一周的访问。



1992年 壬申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与日本朝日文化中心联办的“中日友好‘兰亭’色纸、书道、花道、茶道联展”，于3月20日在印社展览厅展出。



为纪念已故社长张宗祥110周年诞辰，浙江省文化厅和西泠印社等单位，在杭州举行多项纪念活动。4月2日，在浙江省博物馆举行“张宗祥先生遗作展览”，展出张宗祥书画作品40余件。

8月20日，与日本山紫社在杭州举行“中日友好篆刻联展”，展出篆刻作品100件。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暨杭州市与福井市缔结友好城市30周年，日本福井市日中友好协会于8月7日至16日在福井市举办“中国友好节”。其间日方与杭州市对外友好协会、西泠印社共同举办“日中书画交流作品展”。

社长沙孟海于10月10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11月17日至19日，西泠印社1992年度理事会在浙江省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召开，研究和讨论了印社90周年社庆筹备工作计划。

1993年 癸酉

河井仙郎《西泠印社记》刻石于8月29日在印社举行揭幕仪式。

西泠印社90周年庆典于10月20日在杭州举行，海内外社员和来宾500余人出席了这一庆典活动。23日闭幕的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当选为第五任社长。



1994年 甲戌

首任社长吴昌硕 150 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于 9 月 14 日在杭州举行。

1995年 乙亥

“西泠印社篆刻展”于 9 月 8 日在香港大会堂开幕。
“西泠印社第三届全国篆刻评展”于 11 月 10 日揭幕。

1997年 丁丑

为迎接香港回归，“西泠印社藏品展”于 3 月 15 日起在深圳、珠海等地揭幕。同时，《西泠印社社员百印图》以及原印也一并展出。社长赵朴初、副社长启功分别为《百印图》题名。

社长张宗祥 115 周年诞辰及副社长潘天寿 100 周年诞辰的系列纪念活动，分别在北京、杭州、海宁等地展开。

为喜迎香港回归，“西泠印社藏品展”在杭揭幕。

“沙孟海社长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及“97 年沙孟海书学研讨会”于 10 月上旬在杭举行，同时还有“纪念沙孟海作品展”在浙江博物馆揭幕。

1998年 戊寅

“西泠印社首届国际篆刻书法作品大展”评选工作结束，共选出“西泠印社奖”10 名，优秀奖 44 名。

西泠印社 95 周年庆典于 10 月 19 日举行，同时举行“西泠印社九十五华诞纪念展”、第十次社员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西泠印社章程》，产生了由 41 位理事组成的第六届理事会。

1999年 己卯

8 月 16 日，“西泠印社第四届全国篆刻评展”举行，共评出优秀奖 50 件、边款奖 7 件、入展作品 201 件。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在西泠印社旁建立，印学博物馆与印社建筑以回廊相连。9 月 26 日，举行了揭幕开馆典礼。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50 周年，“西泠印社社员作品展”于 10 月 10 日开幕，共展出作品 138 幅。其中，一幅由多人合作的长 50 米的画卷《国寿无疆图》，为印社创建以来最大的巨制。

理事杨鲁安将所珍藏的各类文物 200 余件捐赠印社，其中有历代玺印、铜镜、钱币、砖瓦、印谱等。

2000年 庚辰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西泠印社社员百印展”于 4 月 13 日在澳门揭幕。社长赵朴初于 5 月 21 日逝世，享年 93 岁。

中国印学博物馆 9、10 月间举办了“日本篆刻界捐献文物特展”。

2001年 辛巳

印社孤山社址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印社组织百位社员刻成《西湖胜景百印集》，并于西湖博览会期间在西湖美术馆展出。

印社社员为浙江嘉善西塘古镇刻成《西塘景观百印集》。

由印社主办的“首届国际青少年篆刻书画大奖赛”作品展于 11 月 17 日在杭州揭幕。

2002年 壬午

从 1985 年创办的《西泠艺报》，根据国家有关内部报刊管理规定改刊为《西泠通讯》。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印社与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博物馆以及日本日中书法展实行委员会联合举办“吴昌硕、沙孟海、青山杉雨作品展”。

在印社 10 月 13 日的理事会上，启功被选举为社长，陈振濂、王玉明被选举为副社长。



“西泠印社第三届国际篆刻书法大展”于 12 月 28 日在浙江展览馆隆重举行，共展出作品 500 余件。

杭州市政府决定，西泠印社及所属中国印学博物馆从杭州市文化局移归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管理，新组建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为印社日常事务管理机构。

2003年 癸未

11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建社百年华诞盛典，以“百社雅集、精品荟萃、探究印学、继往开来”为主题，举办了“八大展览”“四大盛会”“一个仪式”系列庆祝活动，气魄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西泠印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盛会。



11 月 20 日，在杭州召开第十一次社员大会，通过了《西泠印社章程》（修订版），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随即召开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启功为社长，郭仲选为常务副社长，刘江、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王玉明为副社长，陈振濂兼任秘书长；决定包正彦、黄镇中、金鉴才、童行方任副秘书长；并讨论通过了名誉职务和顾问人选名单。

12 月 3 日，召开秘书长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艺术研究室的工作构架、制度建设、研究员聘任、工作设想等问题。

12 月 26 日，西泠印社艺术研究室工作会议在孤山题襟馆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五个艺术研究室分管社长、主任和秘书人选的建议名单。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研究室、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书法研究室、国画研究室、收藏与鉴定研究室正式成立。

2004年 甲申

1 月 13 日，在杭州召开西泠印社社长（扩大）会议，提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意见，决定社刊定名为《西泠印社》，确定了编辑方案、栏目设置、编辑委员会名单等。

1 月 15 日，甲申迎春团拜会在杭报大楼举行，分篆刻、书法、绘画三大区块进行雅集笔会。

2 月 3 日，纪念吴昌硕 160 周年诞辰“吴昌硕刻田黄石自用印十二方专题鉴赏会”在孤山社址题襟馆举行。

4 月 2 日，甲申春季雅集在孤山社址举行，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清明拜祭印学先贤仪式，并举办“世纪翰墨缘”扇面展、社员藏珍赏鉴观摩会。

8 月 21 日至 9 月 5 日，为配合杭州市北山街改造工程，印社文物库房整体搬迁新址。



10 月 22 日至 25 日，甲申秋季雅集在杭州举行，包括“四展四会”及一个现场测试活动。“全日本篆刻联盟作品西泠印社特展”在中国美

术学院展览馆开幕；纪念吴昌硕 160 周年诞辰“吴昌硕艺术成就特展”在西湖美术馆开幕，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吴昌硕作品专题展；西泠印社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暨西泠印社青年社员篆刻精品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320 件作品入展、144 件作品入选、优秀奖 51 名，特等奖获得者 1 名当场被吸收为印社社员；吴昌硕先生诞辰 160 周年纪念“吴昌硕·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和“吴昌硕绘画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同期还举行了甲申秋季雅集重阳笔会。

10 月 25 日，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会议吸收新社员 10 名、特邀新社员 3 名，吸收海外名誉社员 4 名。

11 月 3 日，纪念晚清金石书画家赵之谦逝世 120 周年专题鉴赏会在印社孤山社址举行。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5 日，与福建省文联、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福建省博物院联合主办的“西泠印社百年华诞特展国内巡回展（福州展）”在福建省博物院开幕。

12 月 26 日，“印证西泠——2004 西泠印社篆刻艺术展·岭南展”在广州开幕。

12 月，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成立。

2005 年 乙酉

1 月 25 日，西泠印社乙酉迎春团拜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

4 月 7 日，乙酉春季雅集先后在杭州孤山、余杭超山举行，包括拜祭印学先贤仪式、西泠印社社员书画小品展、余杭超山“西泠印社创作活动基地”授牌仪式、茶话会、诗词吟诵和书画雅集。



5 月 19 日，西泠印社创始人丁仁之孙丁裕年将四张西泠印社社早期使用的方凳捐予印社。

5 月，根据中共杭州市委决定，原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西泠印社党组书记、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王玉明调任他职，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魏皓奔接任。

6 月，“西泠印社”品牌商标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

6 月 30 日，社长启功于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7 月 3 日，西泠拍卖在杭州浙江世贸中心举办首场艺术品拍卖会，以 1.96 亿元的总成交额、95% 的总成交率创国内艺术品首拍最高纪录。

7 月 23 日至 24 日，与山东潍坊市人民政府、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印社联合主办的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和“陈介祺遗物观展”在山东潍坊举行，并出版论文集。

8 月 14 日至 24 日，由陈振濂、包正彦、余正组成的西泠印社代表团赴日本进行为期 10 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代表印社向小林斗盒、梅舒适颁发了名誉副社长聘书；与全日本篆刻联盟、日本篆刻家协会、读卖新闻社、谨慎书道会等进行深入交流，并召开日籍名誉社员和旅日中国籍社员座谈会。

10 月 15 日至 18 日，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暨乙酉秋季雅集在杭州举行，包括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中国书法、中国画大展（简称“三大展”）、西泠印社乙酉秋季雅集特邀篆刻作品原作展、西泠印社社员作品观摩展、西泠印社历代名家印章印谱展、西泠印社艺术博览会暨中国印石精品展、刘江先生八十寿辰暨从艺 60 周年回顾作品展，以及西泠印社七届三次理事会、西泠印社社长扩大会议、西泠印社乙酉秋季雅集笔会、“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国际印学研讨会和刘江先生八十寿辰祝寿宴会等内容，是印社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国际性艺术节，也是社团活动首次被纳入“西湖博览会”正式项目。

10 月 15 日，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中国书法、中国画大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共评出获奖作品 62 件、入选作品 1408 件，26 位优胜者分获精品奖；李平等五位选手经现场测试，被当场吸收入社。



10 月 16 日，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在杭州开幕，论文集同期出版。

10 月 16 日，西泠印社七届三次理事会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秘书处《工作报告》和《关于新社员发展的程序》，投票表决吸收 20 位新社员。

10 月底，时值印社早期社员韩登安 100 周年诞辰，韩登安弟子俞克华将自藏《登安印稿》（印刷本）、《韩登安印稿》（原拓本）捐予印社。

12 月 17 日至 18 日，西泠拍卖 2005 年秋季拍卖会再度刷新中国长江以南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业绩，确立了在南方拍卖业的领军地位，被誉为“江南第一槌”。

12 月 21 日，印社首次组团赴台湾，举办“金石之韵”西泠印社藏品展。

2006 年 丙戌

2 月 12 日，“金石篆刻”项目荣获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西泠印社为传承保护单位。

2 月 24 日，西泠印社印学图书馆正式开馆。

4 月 7 日，丙戌春季雅集在杭州举行，包括雅集题名和清明祭祀仪式、中国画研究室成员作品展、丙戌春季雅集金石书画鉴赏会三项主题活动。



7 月 14 日至 21 日，应马来西亚吉隆坡学会和文荟堂邀请，印社组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社员作品展，并开展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与访问。这是西泠印社创立百余年来首度访问马来西亚。

7 月 16 日，西泠拍卖 2006 年春季拍卖会圆满落幕，中国艺术品市场“北看嘉德、南看西泠”的局面初步形成。西泠拍卖开始向艺术品综合经营和中国书画的多元展示迈出重要步伐，并组团远赴我国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展开拍品征集活动，拓展海外市场。

8 月 11 日，西泠印社综合改革被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列为全省 28 个文化体制改革典型案例。

8 月，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承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编辑出版工作。

10 月 12 日至 18 日，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艺术节暨丙戌秋季雅集活动在杭州举行，包括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艺术评展，2006 西泠印社社员书画篆刻提名展，西泠印社社员艺术、学术成果（出版物）展，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百年社史图片展，西泠印社大型拍卖会，西泠印社首届印文化博览会，西泠印社首届手卷书法、楹联书法、扇面书法大展等主体活动，以及西泠印社丙戌秋季雅集笔会、八十寿辰老社员祝寿宴会、社长扩大会议、七届四次理事会等相关活动。



10 月 13 日，七届四次理事会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通过投票表决吸收 18 位新社员。当年还通过六届评展吸收 4 位优秀作者入社。

10 月 14 日至 15 日，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暨百年社史图片展在浙江桐乡举行。

中国印学博物馆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协会、日本岐阜书道协会、韩国南道印社等开展文化艺术交流，举办“日中友好书作交流展”“中韩国际书法篆刻展”等。

2007年 丁亥

3月11日,丁亥春季雅集在余杭超山举行,以“纪念吴昌硕先生逝世八十年”为主题,举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片五种并题跋观摩会、社员创作笔会。

4月2日,日本苍文篆会访问西泠印社,举行交流笔会,并向西泠印社印学图书馆捐赠金石书画书刊百余种。

4月3日,《西泠印社志》编纂工作暨早期社员论证会议在杭州召开,追认周承德、张惟楦、童晏、孙锦、底云、叶良本五人为西泠印社社员。会议期间,社员丁利年向西泠印社捐献《西泠印社故赞助诸公故社友题名》1948年刊印本。

5月13日,“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系列活动暨“和家园”海选总选拔赛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正式启动。这是西泠印社首次以分赛区模式举办国际性大型创作选拔活动。

6月12日至18日,印社组团借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西泠印社百年之谜》拍摄组赴日本,寻访早期日籍社员活动史迹,并进行文化考察和交流。



9月2日,“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总选拔赛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落幕。活动由印社与“我们的奥运”大型系列文化组委会联合举办,中国文联担任特别支持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担任艺术指导单位,首次采用“海选”模式,在海内外设立十大分赛区,吸引海内外篆刻创作爱好者上万人参赛,选手分布遍及国内近30个省、市、自治区和日、韩等国。经过分赛区三轮选拔,决出180名优胜者来杭参加总选拔赛,经过现场专业创作测试、文化素质测试,前15名优胜者被当场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

9月7日,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澳门博物馆在澳门举办“与古为徒——吴昌硕逝世八十年书画篆刻特展”。

9月20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暨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116周年,日本天溪会会长南鹤溪率友好访华团112人来访,由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西泠印社、日本天溪会共同举办的“西泠印社·日本天溪会书法交流展”在浙江西湖美术馆开幕。

10月22日,西泠印社丁亥秋季雅集“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系列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包括“百年西泠·中国印”海选优秀作品篆刻书法作品展、西泠印社社员作品晋京展、全国印社篆刻邀请展、“人文奥运”西泠印社社员篆刻百印原石展四部分,同期还举办了“当代人文环境下印章的文化功能”学术研讨会。

10月26日,以“弘扬印学文化、推动艺术休闲、共享品质生活”为主题的西泠印社第二届印文化暨艺术休闲商品博览会在杭州市浙江世贸中心举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印章艺术史》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全国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

2008年 戊子

1月13日至14日,西泠印社赴安徽黄山举办“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30余位社内外专家赴会交流研讨。

1月28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3月28日至4月1日,戊子春季雅集在杭举行,包括祭扫超山吴昌硕墓及观景踏青、王北岳先生暨石玺斋同门书法篆刻展、“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分赛区表彰会、青山庆生赠吴昌硕刻砚及图书捐赠仪式等。

5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西泠印社集团首次携旗下西泠拍卖、西泠出版、西泠艺苑、西泠鉴赏及印文化博览会等支社企业和品牌项目整体参会。

5月24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专题片《西泠印社百年之谜》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正式开拍。

5月26日,西泠印社就汶川地震向社员发出倡议书,在杭举办抗震救灾创作会,通过书画创作、赈灾义卖、捐款捐物等形式,为地震灾区同胞提供激励和援助。

5月29日,西泠印社早期赞助社员张钧衡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5月,西泠印社启动《浙江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编纂工作。馆藏明万历十五年(1587)铃印本《杨氏集古印章四卷》入选国家首批珍贵

古籍名录。

6月22日至7月2日,西泠印社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长青艺术中心,举行“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洛杉矶特展。这是西泠印社创立以来首次组团赴美国展出,也是西泠印社在汉文化圈以外国家的首次大型艺术展览。

10月24日,西泠印社迎来创立105年,以“光大、和谐、创新、发展”为主题,举办了涵括“三展九会”的盛大庆典,即西泠印社建社105周年庆祝大会、西泠印社第十二次社员大会、“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现场主题创作大会、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首届中国艺术品投资与收藏高峰论坛、第三届印文化博览会、西泠印社200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西泠印社社员作品展、“汇融光大”西泠印社书画印三项兼能社员作品邀请展、“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等,呈现了西泠印社五年来艺术、学术发展建设的理念与实绩。

10月24日,西泠印社第十二次社员大会在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西泠印社章程》(修订稿),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八届社领导班子为:常务副社长郭仲选,副社长刘江、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魏皓奔、李刚田、童衍方,陈振濂兼任秘书长;聘任包丕彦为常务副秘书长,黄镇中、金鳌才、孙慰祖为副秘书长;决定了相关机构和名誉副社长、名誉理事、顾问职务聘任人选。



10月25日至26日,西泠印社105年社庆系列活动——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在杭州举行,15位论文作者经评审获得优秀奖,施谢捷、沈慧兴成为有史以来首次通过论文评奖入社的新社员。

12月16日,常务副社长郭仲选逝世,享年89岁。

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整理维护工程自3月开工,历时9个多月,于2008年12月底全部完工。整个工程投资近30万元,涉及园林整治、建筑修缮、基础加固等方面。

2009年 己丑

1月7日至9日,西泠印社青田印学研究基地在“印石之乡”浙江青田揭牌,“浙派篆刻暨青田石文化研讨会”随后在浙江青田石雕博物馆举行。这是西泠印社成立的首个印学研究基地,也是首次围绕浙派篆刻与青田石文化展开的研讨和交流。

4月15日,西泠印社己丑春季雅集在杭州永福禅寺举行,活动包括清明祭祖仪式、小型碑刻现场锤拓交流及拓片展等。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杭州星都宾馆举行。会议审议了本年度社团工作计划,并选举产生18位新社员。



5月,西泠印社原副社长方去疾先生后裔向西泠印社捐献家传手拓《谢嘉明印痕》《去疾治印》两部印谱。

5月,“西泠印社”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

9月18日,西泠印社2009年度“百年西泠·金石缘”大型系列活动的核心项目之一“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的杭州总评审圆满结束。共评出单项奖作品20件、入展作品304件、入展作品88件。5位选手经过层层遴选,获得“多项兼能奖”并被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

9月30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以西泠印社为主要申报单位和传承代表组织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2009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西泠印社继国家级社团、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之后取得的最高规格的称号。

10月16日至20日,西泠印社己丑秋季雅集“百年西泠·金石缘”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活动包括“百年西泠·金石缘”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西泠印社60”后社员作品选拔展”、刘江先生百印捐赠仪式、

“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西泠印社八届三次理事会等内容。



10月18日，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工作报告》，经投票表决，吸收新社员17名，并增补理事1名。

10月19日至20日，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金石学综论、玺印研究、铭文碑帖研究、金石著录研究、金石家研究等专题展开交流研讨，论文集同期出版。

12月1日，“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巴黎特展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是西泠印社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后首次登陆欧洲，受到特别瞩目。展览共展出西泠印社社员创作的百方印章原印以及百余幅书画作品，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同志亲自题写展名并提交作品领衔展出。

2010年 庚寅

2月9日，西泠印社庚寅迎春团拜会在浙江世贸中心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月27日，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入选“杭州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体验点。

3月16日，在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中国印学博物馆新馆选定新址，开始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新馆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位于杭州市地标性建筑奥体博览中心（筹），毗邻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项目建设资金由杭州市财政统一解决。

4月12日，西泠印社庚寅春季雅集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举行。雅集以“纪念沙孟海社长110周年诞辰”为主题，包括山东浙江篆刻作品联展及座谈会、沙孟海社长110周年诞辰纪念笔会等。



4月12日，法国籍名誉社员龙乐恒在孤山四照阁向西泠印社捐献近现代篆刻家印谱、印章、书法、印屏及自刻印共计35件。

5月14日，由西泠印社64位篆刻名家奏刀创作的“万国印谱艺术展”于第41届世界博览会（Expo 2010）揭幕之际在上海开幕，《万国印谱》同时首发，并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展国。

5月18日，西泠印社社务会议在杭州纳德大酒店召开，决定成立西泠印社社友会、组建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

5月，吴门书法篆刻爱好者、收藏家许汭向西泠印社捐献《秦汉玉印十方》印谱一部。

6月18日，西泠印社5部明代印谱《宣和集古印史》（八卷）、《集古印范》（十卷）、《印法参同》（四十二卷）、《苏氏印略》（三卷）、《姓苑印章》（二卷）入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8月5日，“西泠印社社员走进赤峰书画篆刻精品展”在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开幕，展出西泠印社书画篆刻名家百幅精品力作。

9月16日，作为中意建交40周年暨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先声，由西泠印社与意大利文化部、意大利国家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罗马特展在意大利罗马隆重开幕。这是西泠印社首次在意大利举办的高规格艺术展览，也是西泠印社首次由外国官方机构发出邀请并在国家级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交流活动。



10月18日，早期社员钟毓龙之子钟久安向西泠印社捐赠其先父珍

藏的韩登安、高络园印章两方。

11月3日，西泠印社社友会召开首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西泠印社社友会会员资格审核条件》，并吸收首批会员15人。

11月11日至13日，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暨“百年西泠·风雅颂”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活动包括“百年西泠·风雅颂”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研究专题活动（新出秦汉封泥特展、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刘江先生百印捐赠授奖仪式、钱松篆刻书画鉴赏会等。

11月11日，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在杭州图书馆钱江新城新馆开幕。经过层层选拔，413件作品入展，50位作者荣获优秀奖，其中费加龙等5位选手被吸收入社。

11月11日，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工作报告》，并吸收新社员20名、名誉社员1名。

11月12日至13日，“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新出秦汉封泥特展”在杭州举行，论文集和展览图录同期出版。



11月28日，“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系列活动在杭州落幕，包括“杭州工商信托·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大会”“古雅风韵——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浙江人文大讲堂——中国书画鉴赏与收藏系列讲座”“大型艺术品品鉴活动”等项目。

2011年 辛卯

2月25日至3月13日，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的“西泠八家篆刻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展出“西泠八家”篆刻原印128方和印拓、边款等，多为首次亮相的艺术珍品。

4月13日，西泠印社赴东阳横店举办辛卯春季雅集，期间召开社团工作通报会，宣布成立肖形印研究室及主任聘任名单，宣布社友会组织架构及新会员名单，并举办了藏品观摩交流和社员、社友创作交流笔会。

5月21日，西泠印社向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捐献45套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拓片。

6月12日，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发起并参与举办2011华夏阅读论坛：“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文书文化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由拍卖公司发起并联合学术机构主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

6月18日至22日，西泠印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金石篆刻”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篆刻艺术”传承代表单位，组织“西泠篆刻”项目赴上海参加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浙江活动周”。

7月1日，西泠印社邀集海内外篆刻名家，举行“光辉的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百印篆刻创作活动，百方原印钤拓成谱，公开出版面世，原石公开展出后由杭州市政府收藏。

7月23日至27日，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书法篆刻短期培训班在杭州举办。

8月，西泠印社社员陈兆育向中国印学博物馆捐赠十年收藏所得“灵隐归来”主题印109方。

9月7日，西泠印社首次与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开展艺术研究课题立项工作，《近代影印善本碑帖录》等4个课题获得立项和经费资助。

9月15日至10月15日，“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马德里特展在西班牙国立博物馆举行，西泠印社、西班牙文化部共同主办，引起西班牙各界热烈关注，访问交流成果丰硕，达成多项合作交流意向。

10月26日，经西泠印社社长会议讨论，决定授予资深社员张锐、高式熊、江成之“西泠印社功勋社员”称号；授予顾振乐、叶一苇、孙其峰、陈佩秋、王伯敏、刘江“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称号。

10月27日，西泠印社辛卯秋季雅集“百年西泠·盛世风华”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系列活动包括“百年西泠·盛世风华”当代名家书画印作品邀请展，“光辉的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百印展，西泠印社社员题跋小品展，古玺印、封泥及赵之谦长卷鉴赏会，百年辛亥名人札文献展，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以及西泠印社八届五次理事会等。“百年西泠·盛世风华”当代名家书画印作品邀请展由西泠印社与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是西泠印社首次联合国家级重要文化艺术团体共同举办的大型艺术展赛，展出国内篆刻书画领域一流名家的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精品200余件。



10月28日,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在杭州举行。会议邀集海内外学界同人60余人进行研讨交流,部分名家受邀做主题报告,论文集同期出版发行。本次研讨会还通过论文评审、考察既往学术成果的方式,吸收5位优秀论文作者入社。

10月28日,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工作报告》,经投票表决,吸收18位新社员,并决定增补覃志刚、冯远为西泠印社顾问。

12月7日,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受省文物局委托,对西泠印社社藏文物进行鉴定,新定出书画类一级文物28件,二级文物339件,三级文物1610件,其余列为一般文物(原书画类一级文物9件,二级文物244件,三级文物901件)。

12月13日,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选举饶宗颐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刘江先生担任西泠印社执行社长。12月16日,西泠印社在香港潮州商会俱乐部举行饶宗颐先生就任西泠印社社长颁证仪式。95岁高龄的国际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从专程赶赴香港的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翁卫军手中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证书,正式执掌西泠印社。

1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沙孟海全集》荣获第20届浙江树人出版奖,《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五年内881万元出版资助。

2012年 壬辰

3月6日,西泠印社召开2012年度社友会工作会议,吸收新会员101人。

3月28日,西泠印社艺术品交易新平台“西泠艺苑”正式开业,首期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旨在打造集艺术品创作、展览、交易、收藏、论坛等功能为一体的艺术品商业化市场。



4月18日,由西泠印社倡导并发起、全国20余家重要篆刻社团参与的全国印社社长联席会议在杭举行。

4月5日,西泠印社壬辰春季雅集暨诗岛清韵系列活动在浙江温州举行,主要包括“诗岛清韵”篆刻主题创作会、书画鉴赏讲座、封泥印鉴赏讲座、文艺创作表演鉴赏会、江心岛及楠溪江考察采风等内容。

5月25日至27日,西泠印社首次社友雅集在清代金石大家陈介祺先生的故乡——山东省潍坊市举行,与会社友切磋金石、赏鉴珍藏,展笔铺毫、翰墨酬唱,并进行了书法篆刻创作交流。



5月,经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6月28日,西泠印社参与主办的“海上因缘——饶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在上海美术馆隆重举行,展出饶宗颐社长书画艺术精品70多件,较全面地呈现了饶宗颐先生数十年来潜心书画的丰厚成果和艺术理念。

6月28日至29日,社长饶宗颐先生访问杭城,踏访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品茗、会友、赏景、挥毫,受到各界媒体热切关注。

7月,西泠印社与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少工委共同举办首届“中国西泠网发现未来艺术家”活动。

7月14日至8月31日,由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西泠八家书画印精品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举行,共展出西泠八家书画印精品105件,其中近半数文物藏品为西泠印社提供。

6月13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122”工程首批重点助推上市文化企业。

9月7日,西泠印社、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联展”在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展出以西泠印社社藏为主的16世纪以来历代珍稀印谱80部,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图录。

9月20日,“百年西泠·中国印”安卡拉特展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西泠印社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土耳其Ibrahim Cecen基金会联合主办。本次展览是“2012土耳其中国文化年”57项正式活动项目之一,也是唯一一项以中国传统书画篆刻艺术为主题的展览。

9月26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0月21日,西泠印社集团直属艺术机构西泠艺廊正式揭幕,举办展览和艺术沙龙活动。

11月3日,西泠印社壬辰秋季雅集“百年西泠·翰墨春秋”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开幕。活动由西泠印社、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浙江省文化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担任支持单位,包括创作选拔、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交流论坛等内容。“百年西泠·翰墨春秋”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共评出获奖作品33件、入展作品345件,参加三个以上单项、成绩优异的4名优胜者被吸收为西泠印社2012年度新社员。



11月3日,西泠印社壬辰秋季雅集“百年西泠·翰墨春秋”大型系列活动项目——“艺聚西泠:饶宗颐社长书画艺术特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出饶宗颐先生历年创作的巨制书画作品数十件,基本涵盖了饶公书画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形式。这是饶宗颐先生首次在杭州举办书画艺术特展,成为社会各界和媒体瞩目的一大亮点。

11月4日,西泠印社壬辰秋季雅集“百年西泠·翰墨春秋”大型系列活动项目——“2012(国际)印社社长高峰论坛”在杭州隆重举行。百余位海内外印学社团组织负责人齐聚杭州,围绕当代篆刻艺术传承和社团发展现状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11月4日,西泠印社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工作报告》,并经投票表决,吸收15位新社员。

11月6日至8日,西泠印社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昆山举行。这是围绕明清篆刻史举行的首次专题学术研讨。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和研讨。作为本次研讨会的配套活动,与会专家还于8日转赴苏州,参加“当代吴门篆刻名家作品邀请展暨苏州中青年篆刻家作品展”开幕式并座谈交流。

12月,西泠印社启动“西泠印社篆刻影像资料库·艺术家影像库”工程,这是西泠印社“篆刻艺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

2013年 癸巳

1月1日,由西泠印社、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西泠网发现未来艺术家”主题活动在杭州浙江世贸中心落幕,共选出金奖作者8名,银奖作者25名,铜奖作者37名,优秀作者109名。

4月11日至14日,“百年西泠·金石华章”西泠印社国际篆刻大型选拔活动暨第八届篆刻艺术评展”赛前培训班在杭州落下帷幕。这是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成立以来举办的针对社团大型艺术选拔活动的专题培训。

4月12日,由西泠印社、日本关西大学等联合举办的中日癸丑兰亭会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日本大阪举行。活动包括“兰亭会百周年纪念特别展”“兰亭会百周年纪念书画展”及相关创作、研讨、交流活动,印社八位造诣精深的书法名家以兰亭修禊为主题各出墨宝参展。

4月17日至18日,西泠印社癸巳春季雅集暨《公望遗韵:西泠百

印谱》首发系列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与会社员、社友参观黄公望隐居地和纪念馆，并与当地艺术界友人书画雅集。

4月20日，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正式开展招生教学，首期举办童衍方、张耕源、余正三位名家工作室。

4月，西泠印社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举办“百年西泠·金石华章”西泠印社国际篆刻大型选拔活动，8月24日在杭州举行总决赛，6名佼佼者吸收入社。

10月22日至24日，“百年西泠·金石华章”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召开西泠印社建社110年庆祝大会暨第十三次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成员共73名；经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社领导班子：社长饶宗颐，执行社长刘江，副社长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魏皓奔、李刚田、童衍方，陈振濂兼任秘书长。

10月23日至24日，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行，来自中、日、美、法的112位专家学者论文入选参加研讨，5位社外优秀论文作者吸收入社。



12月9日至11日，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等联合主办的“饶宗颐专题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饶宗颐先生学术、艺术成就展开深入研讨。

12月中下旬，应境外文化艺术机构邀请，赴荷兰海牙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海牙特展，并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2014年 甲午

进一步深化事企体制改革，通过机构改制和调整，建立“1+3”管理体制，即：在中共西泠印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指导协调西泠印社社团、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三大主体统筹发展。

5月14日至15日，赴宁海举行甲午春季雅集，举办“潘天寿作品展”、“潘天寿诗词书法作品邀请展”、宁海书画笔会、“童衍方艺术馆开馆仪式暨艺术作品展”等活动。

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准，社刊《西泠艺丛》获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3-1393/J，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为主办、主管单位。

7月至8月，在浙江美术馆举办“西泠峰骨——纪念吴昌硕诞辰170周年暨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作品展”，共展出吴昌硕书画印作品230件，其他六位社长作品130余件。

10月25日至11月26日，西泠印社甲午秋季雅集“百年西泠·雅韵流芳”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包括“百年西泠·雅韵流芳”当代国际书画篆刻名家精品博览、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当代金石学全形拓系列艺术活动等子项目，涵盖创作选拔、艺术展览、学术研讨、鉴赏交流等内容。



10月25日，在杭州召开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吸纳新社员26名（含名誉社员2名），其中推荐入社新社员19名、论文评奖入社4名、社友会推荐入社2名、特邀入社1名。

西泠印社社友会通过申请、推荐、专家审核评选等程序，吸纳2014年度新会员43名。

12月13日至15日，西泠拍卖10周年庆典秋拍，总成交额83.33%，稳居全国首位；成交额达18.33亿元，创10年拍卖最高点，年度成交总额25.35亿，位居全国第三。

12月10日，西泠印社出版社获教育部批准，成为教育部指定许可书法教材出版单位。

西泠印社集团及下属产业实体拓展海外市场，先后赴日本东京、保加利亚索非亚、美国芝加哥举办“播芳六合·西泠印社知名社员海外系列展”“艺术的纬度——中国保加利亚油画交流展”“中国当代优秀水彩艺术家美国联展”等，并配套举办学术讲座、艺术家采风活动。

2015年 乙未

4月10日，西泠印社乙未春季雅集在孤山社址和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篆刻创作展及座谈会、小型鉴赏观摩会、社员创作笔会、雅集题名等内容。



举办“百年西泠·乐石吉金”大型系列活动，包括国际篆刻创作艺术选拔赛、展览、出版、学术研讨、社员雅集、理事会议等多项内容。国际篆刻创作艺术选拔赛集聚海内外12大分赛区专业资源，遴选出208件作品入选、113件作品入选，5位优秀作者吸收入社。举办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100多位入选论文作者及篆刻爱好者参加研讨。

8月18日至30日，与浙江图书馆、浙江美术馆、海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崇文载学·铁如意——张宗祥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展出张宗祥书画作品70余件、文稿书简40余种及大量生平文献资料。



应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以该院建“非遗传承基地”为契机，开办“西泠学堂”，探索“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非遗”传人。

9月1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总部由西湖文化广场搬迁至市民中心C座，标志着集团产业从“运河时代”走向“钱江时代”，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跨越。

9月至11月，与澳门艺术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君旬艺术院联合主办的“吴赵风流——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代表作品及其他名家作品200多件（套）”，并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及高等院校书画研习交流。

11月，在杭州召开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发展新社员7名，其中大型国际篆刻选拔展评奖入社5名，论文评奖入社2名。



11月13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赴厦门参加首届海峡书画艺术产业博览会与“2015海峡书画艺术产业博览会·两岸书画艺术产业发展”对话论坛，并举办书画展览、鉴定评估、产品展示、篆刻体验等活动。

12月2日至7日，与香港民政事务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共同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系列活动在香港举行。

2016年 丙申

全年以“喜迎G20峰会”为主题，举办系列艺术活动，主要有：“当好东道主，展示西湖美”迎峰会笔会、“喜迎G20·丙申春季雅集”、“喜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迎G20峰会书法篆刻主题创作”、“喜迎G20·点赞杭州”杭州市中小學生主题篆刻创作大赛、“二十国

国名、二十国元首姓名与肖像篆刻作品创作”、“西泠摄影·杭城情愫”喜迎G20西泠印社历史摄影文献征集、摄影与征文市民文化互动活动等。

4月13日，西泠印社丙申春季雅集在杭州西溪湿地举行，包括座谈、创作笔会、社员雅集题名及合影等内容，并举行拜祭印学先贤仪式。



5月，赴日本东京、大阪举办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西泠印社·中国金石篆刻艺术海外推广”系列活动，包括“西泠印社社长（现任）作品展”“西泠印社知名社员（部分）篆刻书法作品联展”“西泠印社社员海外雅集”“西泠印社名家海外演讲会”“李刚田书法篆刻展”。

10月底，举办“百年西泠·湖山流韵”丙申秋季雅集，包括诗书画印大型选拔活动和展览、“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九届四次理事会等子项目。其中，“百年西泠·雅韵流芳”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共计收到来稿3600余件，经现场艺术创作和文化素质综合测试，前5名优秀选手吸收入社。“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来稿100余篇、230余万字，作者来自中、日、法、新加坡等国，50篇论文入选，3名优秀论文作者吸收入社。

10月31日，西泠印社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杭州举行，审议并通过了秘书处《工作报告》，并通报了推荐入社新社员标准等事宜。



11月18日，“百年西泠·中国印”科伦坡特展在斯里兰卡开幕，展出“人文奥运”近百方印章原石和社员书画精品100幅。



全年完成可移动类文物普查6686件、古籍普查150部，接受鲍复兴等七位中外社员捐赠书法、印章、印谱、信札等总计近200件；举办四场大型公益性文物藏品展览，包括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西泠四君子”展，在浙江博物馆举办“吴赵风流——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特展”“金彝野逸——徐三庚篆刻精品展”，赴成都永陵博物馆举办“金石留韵——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拓片展”等。

2017年 丁酉

4月23日，丁酉春季雅集在孤山社址举行，包括书画笔会、艺术鉴赏讲座、艺术展事等内容。



4月8日，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香港集古斋、中华文化院等共同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展”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同日，香港“西泠学堂”正式揭牌。

4月，《西泠艺丛》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第二批认定学术期刊”。

5月3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西泠创社四君子——丁仁、王昶、叶铭、吴隐书画篆刻作品展暨古韵今声——西泠印社藏历代印章原拓题跋扇面展”在日本兵库县美术馆开幕，被中国驻日使馆列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重要文化活动。

6月28日，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浙江大学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西泠印社》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启动拍摄。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向印社捐赠篆刻、书法作品、图册和有关资料。

10月27日，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西泠艺事·含章继志”2017届名家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出名家工作室师生作品近百件。

10月28日至31日，“百年西泠·金石弘源”大型系列活动暨丁酉秋雅活动在浙江展览馆举行，包括“百年西泠·金石弘源”大型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九届篆刻艺术评展、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西泠艺事·含章继志”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2017届名家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西泠印社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西泠艺丛》编辑座谈会等子项目。



11月2日，赴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悉尼特展，展出西泠印社社员创作精品150多件。

2017年，西泠印社吸收新社员36名，其中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推荐入社27名，第九届篆刻艺术评展获奖入社5名，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评奖入社3名、吸收外籍名誉社员1名。

中国印学博物馆全年举办“锦溪杯”全国甲骨文书法篆刻大赛获奖作品展、戎壹轩藏三晋古玺专题展等10场专题展览以及2场外事书画展览交流活动。

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办首届“弄潮杯”钱塘江全国书法大赛、第二届“沙孟海杯”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布衣曲江客——金农诞辰330周年大型学术研讨会”、“杭州市中小学宪法主题书法篆刻作品评展”等活动。

2018年 戊戌

西泠印社迎来创社115年华诞。

林乾良、黄镇中、张钰霖 整理